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经济学 管理学

论防范国际资本投机性冲击的政策选择	李 翀	5
利率平价理论对我国汇率决定的适用性探讨	杜金珉 郑凌云	10
继续扩大内需, 根治通货紧缩	郭祥焰 郭永隼	14
刍议经济环境变化与“机会”开发	王 彤	17
流通产业的改革与发展: 一个理论前瞻	何文君 马顺福	19
特许经营的实质及其“克隆”意义	刘凤军	22
新经济与区域经济合作		
——中华经济协作系统第六届国际研讨会述评	周运源 王文娟 林志锴	25
中国农民的有组织开放体系与农村信息经济选择		
——读《经济组织的制度逻辑》的启示	郑英隆	27

哲 学

《共产党宣言》与全球化	王锦侠	30
略论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的思想	韩安贵	34
论现代哲学本体论范式的转换		
——兼谈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理论价值	刘卓红	40
论意识的自觉	胡 潇	44
情商 —— 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	郭景萍	49

新世纪中国发展与执政党的建设

论江泽民关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维	肖继文	55
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现代化理论的新贡献	刘 琳	62

主办单位: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地 址: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邮 编: 510050 电话: 020- 83846163

排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刊

印: 广州市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号: ISSN1000- 7326
CN44- 1070

月刊 2001 年第 3 期(总第 196 期)

出版日期: 3 月 20 日

历史学

- | | | |
|-------------------------------------|-----|----|
| 南京政府十年的政企关系考察 | 涂华奇 | 67 |
| 明清广东的社学 | 李绪柏 | 75 |
| 明清广东笔记漫谈 | 李龙潜 | 82 |
| 求真存实 开拓创新 | | |
| ——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 | 陈金龙 | 86 |

文学 语言学

- | | | |
|----------------------------|---------|-----|
| 唐代文学史的编撰: 历史与现状 | 董乃斌 | 89 |
| 论城市文学研究的方向 | 蒋述卓 王 斌 | 97 |
| 论《醉翁谈录》的性质与旨趣 | 董上德 | 102 |
| 从书坊到书斋: 乾嘉时期通俗小说的人文化及其文化内涵 | 李明军 | 108 |
| 记明黄君蕡刻本《水浒牌》 | 王贵忱 | 113 |
| 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 | | |
| ——评李文初教授《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 徐国荣 | 116 |
| 字族层面的方言本字考 | 钟 奇 | 120 |

书评

- | | | |
|-----------------|-----|-----|
| 以哲理的眼光分析和观察世界 | | |
| ——喜读《邪教〈法轮功〉百问》 | 温宪元 | 123 |

学术动态

- | | | |
|------------------------|---------|-----|
| 广东省党校系统第四次邓小平理论研讨会观点综述 | 戴燕艳 | 124 |
| 公民教育课程化 | | |
| ——粤港第一届公民教育研讨会述评 | 姚冬琳 黄甫全 | 126 |

〔期刊基本参数〕CN44-1070/C* 1958* m* 16* 128* zh* P* ¥4.00* 2650* 27* 2001- 3

发 行 范 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内总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邮 发 代 号: 46- 64

国 外 代 号: M268(北京 399 信箱)

The Selection of Policies on how to Guard against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Speculative Capital	Li Chong(5)
The Theory of Moderate Prices on Interest Rate and Its Applicability in the Decisions of Chinese Exchange Rate	Du Jinmin and Zheng Lingyun(10)
Continuing the Expansion of Domestic Demand and Resolving Inflation	Guo Xiangyan and Guo Yongjuan(14)
Changes of Economic Circumstances and Exploitation of Opportunity	Wang Tong(17)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urrent Industry	He Wenjun and Ma Shunfu(19)
The Essence of Chartered Management and Its Significance of“Cloning”	Liu Fengjun(22)
New Economy and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Zhou Yunyuan, Wang Wenjuan and Lin Zhikai(25)
A Book Review on‘ The Systematic Logic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	Zheng Yinglong(27)
‘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Globalization	Wang Jinxia(30)
A Brief Discussion on Marx’s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 of Value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an Angui(34)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Normal Form of the Philosophy Ontology	Liu Zhuohong(40)
The Self– Consciousness of Consciousness	Hu Xiao(44)
Emotional Quotient: A New Vision of Sociological Studies	Guo Jingping(49)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 Jiang Zemin upon Basically Achieving Modernization	Xiao Jiwen(55)
The New Contributions of the Third Leadership to the Theor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Liu Lin(62)
Reviews of the 10– Y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for the Nanjing Government	Tu Huaqi(67)
Rural Schools in Guangdo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 Xubo(75)
Notes in Guangdo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 Longqian(82)
A Book Review on‘ Between Religion and Secularity’	Chen Jinlong(86)
Compilation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Dong Naibin(89)
The Direction of Studies on Urban Literature	Jiang Shuzhuo and Wang Bin(97)
The Nature and Purport of‘ Drunk Old Man’s Talks’	Dong Shangde(102)
Humanism of Popular Novels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Qianlong and Jiaqing	Li Mingjun(108)
The Block– Printed Edition of‘ Shuihu Pai’ by Huang Junqia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Wang Guichen(113)
A Book Review on‘ The Studies of the Literature of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Xu Guorong(116)
A Study on the Original Dialectal Word on the Level of Word Family	Zhong Qi(120)
A Book Review on‘ One Hundred questions Rebutting Falungong heresy’	Wen Xianyuan(123)
Views from a Symposium on Deng Xiaoping Theory in the Party School System of Guangdong Province	Dai Yanyan(124)
Views on the First Symposium on Civil Education in Guangdong and Hongkong	Yao Donglin and Huang Fuquan(126)

• 经济学 管理学 •

论防范国际资本投机性冲击的政策选择

李 翀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875)

[摘 要] 20 世纪 90 年代, 多个国家遭受到国际资本投机性冲击, 冲击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既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本流动所带来的利益, 又要减少国际资本投机性冲击所带来的风险, 已成为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性问题。本文从国际资本流动的收益和风险组合的分析出发, 探讨了在不影响国际资本正常流动的条件下防范国际资本投机性冲击的政策选择。

[关键词] 国际资本流动 防范风险模式 防范风险政策

[中图分类号] F8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 (2001) 03- 0005- 05

一、国际资本流动收益与风险组合的分析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取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 开放本国的金融市场可以给本国带来收益 (资本净流出国的收益是外国投资收益率与本国投资收益率之差, 资本净流入国的收益是资本的流入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金融也使本国面临外国机构投资者的投机性冲击所带来的风险。如果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幅度越大, 潜在的风险就越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这就是说, 国际资本投机性冲击的风险随着国际资本流动收益的增加而增加。因此, 假定其他条件相同, 发展中国家具体选择什么样的收益和风险的组合取决于它的对外开放程度。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资本流动得到的收益较少 (多), 但它所面临的风险也较小 (大)。

然而, 国际资本流动的收益和风险呈正相关关系并不意味着国际资本流动的收益和风险的组合是

一成不变的。发展中国家在获得一定的国际资本流入的利益的同时面临着多大的风险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包括国际货币制度、外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则等。内部因素包括金融管理当局对金融市场监管的有效程度、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全程度、国内金融市场规则的完善程度等。

由于国际货币制度等外部因素是一个国家无法左右的, 根据国际资本流动的收益和风险组合分析, 针对一个国家的内部因素可有多种政策选择:

第一, 一个国家应该在不断完善金融体制的过程中逐步推进对外开放。如果一个国家金融体系不健全, 如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不高, 不良资产较多, 经营缺乏效率等; 或者交易规则不健全, 如金融市场的买卖、交割等规则存在较多的漏洞等; 或者政策监管不健全, 如没有建立完整的法规体系, 对已建立的法规执行不严, 管理当局不能有效地对突发

事件进行控制等，那么这个国家推进对外开放所形成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收益和风险组合是收益较低而风险较高的组合。

如果在完善金融体制的过程中逐步对外开放，那么有可能出现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金融体制改善的程度小于对外开放推进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收益和风险都会增加，但收益增加的幅度小于风险增加的幅度。第二种情形是金融体制改善的程度接近对外开放推进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风险不变但收益增加，不过，收益增加的速度慢于第一种情形。第三种情形是金融体制改善的程度大于对外开放推进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收益增加同时使风险减少，但收益增加的速度慢于第一、二种情形。这三种情形都是可以选择的，第一种情况较激进，第三种情形较稳健，对它们的选择取决于政府的发展战略。但这三种情形都优于只推进对外开放而不注重完善金融体制的做法。

第二，一个国家在遭受国际资本投机性冲击时，可以采取两种类型的政策：第一种是对市场进行干预并且严格市场交易规则，正如后面将要分析的，我称之为香港模式。这种模式的意义是在不影响国际资本流动收益的情况下抑制金融投机和减少国际资本流动风险，但它必须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作为前提。第二种是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限制，正如后面将要分析的，我称之为智利模式或巴西模式。这种模式以减少收益为代价，降低国际资本流动风险，但它可以在任何条件下实行。根据国际资本流动收益和风险组合的分析，这两种选择都可以产生减少国际资本投机性冲击风险的效果。

二、防范国际资本投机性冲击的各种模式

长期以来，各国曾经或正在实行各种控制短期资本流动的措施，如缴交无息储备、对短期资本交易征税或收费、限制短期外汇信贷或持有外汇头寸的规模、经过中央银行批准才能进行某种类型的外汇交易或金融资产交易、对某些类型的金融资产交

易提出最低持有期限的要求等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再次掀起对国际资本流动管制有效性的讨论。部分经济学家提出，应该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车轮下撒点沙子”以限制波动不安的短期资本流动。他们认为，以短期证券投资和银行贷款方式形成的资本流入是造成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外部根源。因此，与早年主要讨论如何防止资本外逃不同，近年的讨论重点是如何控制资本流入的数量和结构。智利和巴西对资本流入的控制被认为是可以选择的一种管制方式。

第一种模式是智利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智利发生的大规模资本流入浪潮，给智利经济造成了冲击。1991年，智利中央银行为了减少短期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对外国贷款实行一年期的没有补偿的储备要求方案（unremunerated reserve requirement，简称URR），希望在不影响外国长期投资的条件下限制短期信贷。按照这个方案，智利的厂商和居民取得外国的贷款后，每年须把一定比例的贷款作为储备存入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对这部分储备不支付利息。从1991年到1997年，要求的储备率提高了若干次，需要缴交储备的范围覆盖了除外国直接投资以外的大多数国际资本流动的形式。目前，不仅对短期银行信贷和持有美国存单要求缴交储备，而且对1万美元以上（除外国直接投资以外）的各种形式的资本流入也要缴交储备。没有补偿的储备要求方案所规定的缴交储备的比率在1992年5月为30%，到1998年6月降到10%。

对于智利式的缴交无息储备的管制手段，经济学家们广泛讨论了其有效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人员奎厄克（P.Quirk）和埃文斯（O.Evans）发现，智利在实行对短期资本控制以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私人短期资本流入量减少了，但错误和遗漏项以及估计的贸易误差的数字则明显增加。对此可以作出的解释是，错误和遗漏项数字的扩大代表了为逃避政府管制而发生的没有记录的短期资本流入量

的增加。^①美国经济学家爱华德 (S. Edwards) 致力于检验智利对短期资本流动管制的有效性。如果要直接衡量对短期资本流动管制的有效性, 应该分析离岸利率和在岸利率的差别, 并观察这种差别是否违背利率平价条件。由于智利缺乏离岸利率和远期利率的数据, 爱华德主要研究实际汇率和利率差额怎样受到资本管制的影响。假如管制是有效的, 那么管制将对国内利率和外国利率的关系以及实际汇率的时间系列产生明显的影响。但经验数据表明, 管制对实际汇率的影响是有限和短暂的, 国内利率和国外利率的差异程度在管制以后并没有扩大。^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人员杜雷 (M. Dooley) 的结论则是, 智利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只能暂时地使国内资本收益率和国际资本收益率分离, 但投资者总会找到新的办法摆脱这种限制, 管制最终还是无效的。^③经济学家们强调, 智利式的对短期资本流入要求缴交无息储备的措施效果有限。

第二种模式是巴西模式。与智利不同, 巴西采用征税的方法限制国际资本流动。巴西 1994 年 1 月对外国投资本国股票征收 1% 的税, 后于 1995 年 1 月取消; 对巴西企业在国外发行债券征收的发行税从 3% 提高到 7%, 后于 1995 年 3 月取消; 对外国人在巴西投资固定收益证券征收的收入税从 5% 提高到 9%, 后于 1995 年 3 月降回 5%。对于巴西式的对资本流动征税的管制手段, 经济学家们有不同看法。美国经济学家艾琛格林 (B. Eichengreen)、托宾 (J. Tobin) 和威普罗茨 (C. Wyplosz) 主张对外汇交易和跨境短期银行贷款征税, 他们认为对短期资本流动征税可以减少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货币政策的影响, 增强政府实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权; 也可以增加冲击固定汇率制度的投机成本, 降低发生投机性冲击的可能性; 还可以使投资者更加重视长期的投资而不是短期的投机。^④但是, 也有不少经济学家不同意对短期资本流动征税。美国经济学家加伯 (P. Gaber) 和泰勒 (M. Taylor) 认为对短期资本流动征税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 如果部分国家征税而别的国家不征

税, 资本会流向别的国家; 其次, 随着金融衍生品种市场的发展, 各种交易混合在一起, 要对外汇交易征税不是容易的事情; 再次, 对外汇交易征税可能使外汇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失去流动性。^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人员马斯森 (D. Mathieson) 和累加西-斯瓦列茨 (L. Rojas-Suares) 指出, 对短期资本流动征税并不能限制短期资本流动, 短期资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流动, 如在进口时多开或少开发票额等。经验表明, 当投资者找到逃避管制的办法时, 管制就失去了作用。^⑥以福克兹-兰道 (D. Folkerts-Landau) 等人领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小组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他们的结论是: 经验表明, 限制短期资本流动的政策对在短期内减少资本流入量和改变资本流入的构成能够发挥作用。因此, 如果资本流入是暂时性的, 这类政策是有效的。但是, 资本流入持续时间越长, 或者限制政策实施时间越长, 这类政策不但无效, 而且对国内金融体系起着越来越大的破坏作用。^⑦

第三种模式是香港模式。在一个国家或地区遭受机构投资者大规模的投机性冲击时如何保持本国或本地区金融市场的稳定, 至今还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香港在 1997 年和 1998 年两度反投机中取得有益的经验, 形成了香港模式。香港模式的基本特点是进行逆向的反投机和严格市场规则。所谓逆向反投机是指逆投机者的做法而行之。当机构投资者在外汇市场上大规模地抛售港元以压低港元的汇率时, 香港特区政府在外汇市场上大规模地购买港元以维持港元的汇率稳定; 当机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抛售股票、卖出恒生指数期货合同和恒生指数期权时, 香港特区政府同样在股票市场上买进股票、买进恒生指数期货合同和恒生指数期权。所谓严格市场规则是香港特区政府严格金融市场交易规则以抑制过度的金融投机。在 1998 年反投机斗争中, 香港期货交易所实行 3 项新的措施以抑制过度的期货投机, 香港金融管理局也宣布实施 7 项维持港元联系汇率制度的新措施。香港特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受

到香港工商界的欢迎，但也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美国经济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违背了自由市场的原则，这样会对金融市场产生不利影响。

三、防范国际资本投机性冲击的政策选择

我认为，对短期资本流动实行限制主要存在三个问题：第一，限制措施的实施存在困难。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项目中的长期资本流动和短期资本流动是明确的。但在现实的经济中，长期资本流动和短期资本流动是混合在一起的。某一种类的资本流动究竟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经常是难以明确区分的。这就给限制措施的实施带来困难。第二，限制措施较容易被逃避。由于资本流动的结构比较复杂，流动的途径也比较多，在一个国家对某种类型的资本流动实行限制时，这种类型的资本会混杂在国际贸易或别的类型的资本之中一起流动。因此，对资本流动实行限制将是限制→逃避限制→堵塞漏洞→再找漏洞的循环过程。第三，限制措施的实施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政府在实施限制短期资本流动措施时，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甄别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然后按照规定对特别种类的资本流动实行限制，另外还要对各种逃避限制的行为进行监督，因而需要花费大量的社会资源，支付较高的社会成本。任何一项经济决策都存在成本和收益的问题，对短期资本流动实行限制同样要考虑代价和效果。

尽管对短期资本流动实行限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它仍然是减少国际资本投机性冲击风险的一种可选择的方案。对短期资本流动的限制措施一般可在两种情况下实施：一种是在渐进的对外开放过程中实施对短期资本流动的限制。这就是在推进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自由化过程中，首先推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然后推进长期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最后是推进短期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因此，必须在一定的时期保持对短期资本流动的限制。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短期资本流动的限制

是十分必要的。一个国家在推进国际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取消对资本项目的汇兑限制和对外开放全部金融市场，否则这个国家将面临着极大的风险。既然国际金融的自由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一定的时间里实行对短期资本流动的限制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推进国际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原先已设有外汇管理机构，在推进国际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保留对短期资本流动的限制不会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因此，这些国家需要解决的主要是限制短期资本流动措施的有效性问题。

再一种是在遭受国际资本投机性冲击的时候实施对短期资本流动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对短期资本流动的限制则要付出较大的代价。首先是对资本流动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一个国家突然宣布对短期资本流动实行限制，会被认为是政策不连续和不稳定的表现。外国投资者因无法预料该国在什么情况下会采取什么措施而不愿意扩大对该国的投资，这样对短期资本流动的限制会演变为对全部资本流动的限制，从而对该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其次是要付出较大的社会成本。对短期资本流动实行限制要求设立专门的机构和增加专门的人员来进行监督管理，从而需付出较高的社会成本。

我认为，在遭受国际资本投机性冲击的情况下，不到不得已的时候不宜采用限制短期资本流动的措施。另外，即使要实行这种措施，也应该事先宣布而不应突然实行。所谓事先宣布是指在没有遭受国际资本投机性冲击以前，该国明确表示本国在发生金融动荡、有关指标的变化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将对短期资本流动实行限制。这样投资者就会认识到这是在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而不是随心所欲的政策决定，从而保持对该国政策的信心。

就各项限制短期资本流动的措施来说，各国可以根据本国的实际进行选择。但是，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前述实行限制措施所遇到的问题。我认为对短期资本流动进行征税的方法较为可取。首先，对短期资本流动进行征税易于实行。尽管在现实经济

里长期资本流动和短期资本流动难以区分，但是采用尽量简单的方式明确对什么类型的资本流动进行征税，可以避免区分长期资本流动和短期资本流动的困难。例如，政府可以规定除外国投资者在本国设厂生产、投资本国的债券和股票并且实际持有期限超过一年、对本国发放贷款并且实际发放期限超过一年可以免征资本流动税外，其余全部资本流动按流动额征收一定比例的资本流动税。其次，对逃税行为进行监管比较有效，征税和反逃税是一个国家的政府自从建立时起就一直从事的工作，因而具有丰富的经验。政府可以比较有效地实行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征税和堵塞各种逃税的漏洞，发挥限制短期资本流动措施的作用。再次，对短期资本流动进行征税社会成本较低。在各个国家里都建立有较健全的税务部门，通过税务部门对短期资本流动征税所付出的社会成本较低。最后，对短期资本流动进行征税比较灵活，不但可以直接增加政府的收入，而且政府还可以通过调整税率调节限制短期资本流动的强度。

另外，按照香港模式利用市场手段进行反投机是在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它的目的在于抑制垄断促进竞争，因此必须注意政府干预的频度和程度，以免干扰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从现实情况来看，大规模的金融投机是间歇性的，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做到既能进入金融市场，也能退出金融市场。第一是掌握好干预的频度。政府应该建立金融市场监控系统，监控金融市场的运转。对小规模的金融投机不予干预，对有助于恢复金融市场均衡的金融投机也不予干预。只有在发生了对金融市场具有重大破坏作用的大规模的金融投机的情况下政府才加以干预。第二是掌握好干预的程度。政府的干预应

该以抑制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为宗旨，它不应该人为地提高本应下跌的金融资产价格，也不应该人为压低本应上升的金融资产价格，所以干预的程度要合适。政府进入金融市场进行干预后，必须作出时间表，分步有序地退出金融市场，切不可停留在金融市场，以免妨碍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转。

总之，我认为，在遭受国际资本投机性冲击时，香港模式应是首选模式，它可以在不影响国际资本流动所带来的利益的前提下抑制国际资本流动的风险。但是，采用香港模式必须有强大的金融实力为基础。对于中小发展中国家来说，智利模式或巴西模式是一种可以考虑的选择。

①P. Quirk and O. Evans, Capital Account Convertibility, IMF Occasional Paper No. 131, 1995, Washington DC.

②S. Edwards, Capital Flows, Real Exchange Rates, and Capital Controls,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on Capital flows to Emerging Market, Feb. 1998. Massachusetts.

③M. Dooley,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on Controls over International Capital Transaction, IMF Staff Papers, Vol. 43, Dec. 1996, Washington DC.

④B. Eichengreen, J. Tobin and C. Wyplosz, Two Cases for Sand in the Wheel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Economic Journal, Vol. 105, Jan. 1995, P. 162- 172.

⑤Gaber and M. Taylor, Sand in the Wheels of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05, 1995, P. 173- 180.

⑥D. Mathieson and L. Rojas-Suares, Liberalization of the Capital Account, Experiences and Issues, IMF Occasional Paper, no. 103, 1993, Washington DC.

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和政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页。

责任编辑：韦 前

利率平价理论对我国汇率决定的适用性探讨

杜金珉¹ 郑凌云²

(1. 暨南大学金融系教授、博士, 广东 广州 510632
2.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广东 广州 510120)

[摘 要] 利率平价理论是 20 世纪前半期汇率理论发展的重大成果。本文通过对中美两国利率差异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关系的检验与分析, 指出现阶段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很难直接而有效地适用于利率平价理论。在此基础上, 文章从利率平价理论本身的局限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两个层面, 进一步分析和探讨了人民币汇率偏离利率平价的原因。

[关键词] 利率平价理论 人民币汇率 适用性检验

[中图分类号] F8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 (2001) 03- 0010- 04

一、利率平价理论述评

1. 在开放型经济中, 如果资本具有充分的国际流动性, 投资者的套利行为将使国际金融市场上以不同货币计价的相似资产的收益率趋于一致, 也就是说, 套利资本的跨国流动保证了一价定律适用于国际金融市场。

用 i_d 表示以本币计价的资产的平均收益率, i_f 表示以外币计价的相似资产的平均收益率, E 表示即期汇率 (直接标价), E^e 表示预期将来某个时点上的即期汇率。假设投资者是风险中性 (risk neutral), 根据一价定律可得

$$1 + i_d = (1 + i_f) \times E^e / E \quad (1)$$

对等式 (1) 做适当的变化可得到:

$$i_d - i_f = \Delta E^e \quad (\text{其中: } \Delta E^e = E^e / E - 1) \quad (2)$$

等式 (2) 是无抛补的利率平价表达式。它表明: 当本国利率高 (低) 于外国利率时, 本国货币预期贬 (升) 值, 贬 (升) 值的幅度等于国内与国际利率水平之差。 ΔE^e 代表本币的预期贬 (升) 值率。

投资者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对以不同币值计价的资产进行充分的套利是无抛补利率平价得以成立的关键。为了避开有关风险的争论, 无抛补利率平价中假设投资者是风险中性的, 投资者的收入效用曲线是线性的。投资者的效用由预期收入的期望值决定, 预期收入的期望值越高, 投资者所获得的效用就越大。如果两种资产组合的预期收入的期望值相等, 而风险不同, 投资者对两种资产组合的偏好相同, 这类投资者就是风险中性的。

2. 与无抛补利率平价相比, 抛补的利率平价并未对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做出假定, 因为远期外汇市场的出现使套利者可以免于承担由于汇率波动而产生的汇率风险。套利者在套利的时候, 可以在期汇市场上签订与套利方向相反的远期外汇合同 (掉期交易), 确定在到期日交割时所使用的汇率水平。由于套利者利用远期外汇市场固定了未来交易时的汇率, 避免了汇率风险的影响, 整个套利过程得以顺利实现。抛补的利率平价表达式是

$$i_d - i_f = f \quad (\text{其中: } f = F/E - 1) \quad (3)$$

F 表示远期汇率, f 是本国货币的远期贴 (升) 水, 是本币的远期汇率高 (低) 于即期汇率的比率。

抛补的利率平价表明本国利率高 (低) 于外国利率的差额等于本国货币的远期贴 (升) 水。高利率国的货币在期汇市场上必定贴水, 低利率国的货币在期汇市场上必定升水。如果国内利率高于国际利率水平, 资金将流入国内牟取利润。但套利者在比较金融资产的收益率时, 不仅考虑两种资产的利率水平, 而且考虑两种资产由于汇率变动所产生的收益变动。套利者往往将套利与掉期业务结合进行, 以避免汇率风险。在本币利率高于外币利率的情况下, 大量掉期外汇交易的结果是外汇的现汇汇率下浮, 期汇汇率上浮, 而本币的现汇汇率上浮, 期汇汇率下浮。随着抛补套利不断进行, 期汇汇率与现汇汇率的差额会不断增大, 直至两种资产所提供的收益率完全相等。此时抛补套利活动就会停止, 本币远期贴水恰好等于国内利率高于国际利率的幅度。

3. 利率平价理论坚持了汇率与利率间的必然联系, 在对长期的远期外汇市场实践作出较完整的理论总结的同时, 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已有的汇率决定理论的偏颇, 即把影响汇率的重要因素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它是 20 世纪前半期汇率理论的重大进展之一, 它不仅很好地解释了远期汇率变动与利率变动的关系, 即本币利率的提高将使本币汇率呈上涨之势, 本币利率的降低将牵引本币汇率向下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与 80 年代初期美国的高利率、高赤字、高汇率的实际情况, 以及 1995 年日本将官方利率降到 0.5% 的历史最低位后, 日元升而复跌的实践相吻合。

在发达国家现实的经济中, 商品的流动和资本的流动相比已经微不足道, 表达商品流动规律的购买力平价理论, 只能为汇率变动提供一个长期基准, 而中期走势和短期波动, 基本上由国际资本流动所左右。在利率市场化和资本国际化两大条件下, 国际资本流动受到各国利率的影响最大, 利率水平的

差距必将产生汇率的升水和贴水预期, 整个国际资本市场, 实际上是在套利和套汇中维持均衡。基于此, 利率平价被公认为是解释和预测汇率与利率关系的优秀模型, 它能够较好地解释发达国家间汇率变化的规律。但是,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其利率市场与资本国际化的情况与发达国家有着巨大的差别, 因此, 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 探讨利率平价理论对于我国汇率决定的适用性, 不仅有理论探索的价值, 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利率平价理论对我国汇率决定的适用性检验

1. 由于我国尚不存在完整的远期外汇市场, 无法获得人民币的远期汇率水平, 因此只能检验无抛补利率平价是否成立 (姜波克, 1999)。

如果采用合理预期假设, 则可利用下式来检验利率平价是否成立:

$$1 + i_t = \alpha + \beta [(1 + i_t^*) E_{t+1}/E_t] + \varepsilon \quad (4)$$

其中, i_t 和 i_t^* 分别表示中美两国 t 时期的利率水平。考虑到国内的利率管制, 采用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率与国内外利率差关系的方法应该更为合理, 因此采用下面的双对数检验模型:

$$\ln E_{t+1} - \ln E_t = \alpha + \beta [\ln (1 + i_t) - \ln (1 + i_t^*)] + \varepsilon \quad (5)$$

令 $\Delta e = \ln E_{t+1} - \ln E_t$, 则:

$$\Delta e = \alpha + \beta [\ln (1 + i_t) - \ln (1 + i_t^*)] + \varepsilon \quad (6)$$

在利率平价条件下, 须满足 $\alpha = 0$, $\beta = 1$, 且 ε 必须序列不相关。

姜波克 (1999) 选用了 1990-1997 年初中国的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利率、美国一年期 CD 利率和人民币汇率的月度数据进行检验, 结果如下:

$$\Delta e = (-0.01324) + 0.87305I \quad (7)$$

$$t \quad (0.40) \quad (1.13)$$

$$R^2 = 0.047 \quad F = 1.28 \quad DW = 2.27$$

上式中的 I 即为 $\ln (1 + i_t) - \ln (1 + i_t^*)$ 。可以看出, 这一回归结果很不理想。考虑到 1994 年我国才

真正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将样本期改为 1994—1999 年，结果如下：

$$\Delta e = 0.00367 - 0.16851 \quad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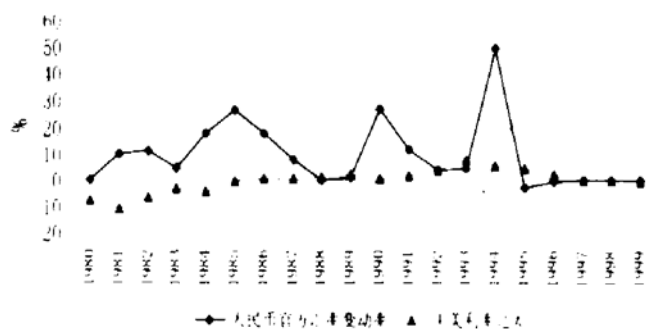
$$t \quad (0.68) \quad (-1.51)$$

$$R^2 = 0.19 \quad F = 2.28 \quad DW = 2.02$$

与前者相比，这一结果有所改善，且 $\alpha = 0$ 和 ε 序列不相关都能成立，只是总体检验的可靠性较差。

2. 为了进一步直观地反映中美两国利率差异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率的关系，图 1 绘出了 1980—1999 年间中美两国一年期存款利率差异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率的走势。显然，无论是美国利率高于中国利率（如 1986 年前），还是中国利率高于美国利率（如 1987—1993 年，人民币贬值的趋势都很明显，而且人民币变动的幅度远远大于利率的差异，所以，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利用利率平价理论解释中国汇率的变动仍然存在很大的困难，与利率平价的预测基本上不相符合。但是，不排除随着人民币朝完全可兑换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市场化方向迈进，利率平价的预测力会有所提高。

图 1 人民币汇率变动率与中美利差走势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国际统计年鉴》相关各期。

3.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利率平价关系的检验几乎完全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开放性，由于我国利率尚未市场化，且存在资本项目下的严格管制，套利成本一般远大于风险报酬，从而导致套利资本的流动很不完全，在现实中的流动规模也比较有限，不应夸大其对汇率的作用，因此，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决定模型很难借鉴利率平价理论。此为结论一。

进一步说，尽管短期资本确实可以通过种种渠

道规避管制达到套利的目的，但不论以哪种渠道实现本外币之间的兑换，都不可避免地在我国外汇市场和国际收支表中体现出来，并引起外汇供求和国际收支相关项目的变动。因此，我们认为，国际收支对汇率的决定实际上已包含了利率对汇率的影响，研究外汇供求和国际收支对汇率的决定作用也就显得更有意义，而且更直接。此为结论二。

三、人民币汇率偏离利率平价的原因分析

1. 应当指出，利率平价论虽在理论上近乎完美，但通过对实际情况的观测，利率差与汇率差的关系往往与该理论模式下的预测不相符，或离差值过大。其原因首先在利率平价理论本身的局限：

第一，利率平价论假设交易成本足够小，基本上可以忽略，而实际上交易成本是影响汇价的很重要的因素。如果各种交易成本过高，不仅影响利率与汇率的关系，而且影响市场参与者的决策，使理论与实际出现某种背离。

第二，该理论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外汇市场必须高度发达完善，汇率的变化具有充分的灵活性，且市场的信息流通非常有效，可使交易者能够迅速消除可能出现的机会利润，实现外汇市场的瞬时出清；但实际上完善的远期外汇市场也只是在少数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才存在。此外，如金融当局干预资金的转移，将构成外汇市场上套汇套利的障碍。

第三，利率平价成立的前提是必须有充足的套利资金和充分的资本国际流动性，套利者可以充分利用资金以驱使相应的比率达到均衡。然而，套汇套利资金的供给弹性并不是无限大的，即使国内外利率差距相当大，也不会因此而引起无限度的外汇套汇套利活动，因为套汇套利也有机会成本，用于套汇套利资金的金额越大，保留为预防和安全之需的现金就越少，这是使利率平价理论与实际市场行情相脱离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在外汇市场上，除了汇率风险外，政治因素也往往是投资、投机者所特别重视和考虑的因素。

最后,利率平价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市场参与者全是套汇套利者。但事实上,市场上除套汇套利者外,还有许多投机者,极难加以严格区分。一般情况下,若套汇套利者占多数,利率平价论实现的机会较大,反之,如投机者占支配地位,则利率平价论实现的机会较小。

2. 其次,结合中国的国情不难发现,中国的现实情况与利率平价理论理想假设的差距非常之大,从而导致了现实与理论的脱节。差距主要表现:

(1) 短期资本的有限流动性。虽然我国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后,短期资本可以通过种种渠道规避管制,实现本外币之间的兑换,达到套利的目的。但由于资本项目下的严格管制,导致这种套利资本的流动性却是不完全的,在政策上受到严格限制,在现实中的流动规模也比较有限(景学成,1996),这一点与利率平价所要求的资本具有充分流动性的假设是不符的。

(2) 汇率的形成缺乏效率。在现行的银行结售汇制度下,国内外汇市场上形成的人民币汇率实际上仅仅反映了央行对汇率合理水平的看法(孙明春,1994),汇率的变化缺乏灵活性,市场信息匮乏且缺乏意义(唯一有效的信息是央行对汇率水平的意愿)。当国内外汇供给持续大于需求时,央行必须收购超额的外汇供给,弥补需求缺口,否则银行结售汇业务将难以持续开展,市场无法实现平衡。央行被动地介入外汇市场平衡供需,人为增大了市场需求,使其在未有充分升值的非均衡的汇率水平上结清,市场参与者会因此得到错误的信息,外汇供需的最终主体(企业)也就难以准确地调整其经济行为,外汇供给会被维持在大于真实需求的水平上。这样一来,汇率变动与外汇市场中的实际供需之间的联系与反馈机制被切断了,外汇市场的出清蜕化为央行干预下的人为平衡。央行作为外汇市场中的价格领袖,其在外汇市场上的价格策略显然将影响汇率的调整速度。在国内利率高于国外利率时,套利资本的流入会增加外汇市场中的外汇供给。若央

行以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为政策目标,就需在其目标汇率水平上收购超额的外汇供给。这就会导致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对资本流动极不敏感,人民币不可能在瞬间完成升值,本币升值过程延长,市场外汇的真正出清难以实现。这与利率平价所要求的瞬时结清的外汇市场是不同的。

(3) 汇率预期的简单化。根据前述分析可以看出,任何可能影响央行汇率政策决定的因素都会改变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升贬值率的预期。若央行的汇率目标是要维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稳定,汇率预期的变化率则趋近于零。显然,市场预期已简单化为对央行汇率政策取舍的判断,而不是对供需形势的深入分析。

(4) 利率市场化滞后阻碍远期汇率形成。中国没有人民币与外汇之间的远期买卖,人民币只有即期汇率,没有远期汇率。因为货币的远期汇率等于即期汇率加上两国之间的利率差,所以人民币利率如果不能市场化,远期汇率就无法产生。利率市场化滞后阻碍人民币远期汇率形成,是妨碍利率平价在中国发挥作用的操作性原因。

主要参考文献:

1. 姜波克,《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管制》[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陈学彬,“近期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走势分析”[J],《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3. 杨帆,“人民币实际汇率研究”[J],《管理世界》1999年第5期。
4. 孙明春、张萍,“人民币汇率、利率与套利资本流动”[J],《金融研究》1997年第8期。
5. 张萍,“利率平价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J],《经济研究》1996年第10期。
6. 景学成,“论国际短期资本在我国的实际流动”[J],《经济研究》1996年第3期。
7. 卢民锋,“论汇率决定的利率平价理论及其短期、动态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1996年第2期。
8. 孙明春,“外汇体制改革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J],《经济研究》1994年第8期。

责任编辑:韦 前

继续扩大内需，根治通货紧缩

郭祥焰¹ 郭永隽²

- (1.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教授, 广东 深圳 518000)
2. 上海浦发银行深圳分行,

[摘 要] 去年以来, 在中央政府扩大内需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持续作用下, 刺激消费政策有所见效, 居民消费心态有所改变, 信心指数有所回升,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略升 0.1%, 下半年消费市场继续转旺。但是, 通货紧缩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改观, 企业效益并不理想。文章认为, 当前我国经济调整仍需以继续扩大内需为动点, 推进各项工作, 根治通货紧缩问题。本文主要就我国通货紧缩的表现、成因与如何继续扩大内需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通货紧缩 成因 扩大内需

〔中图分类号〕F822.5; 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326 (2001) 03- 0014- 03

一、近几年来出现的通货紧缩及其成因

通货紧缩是指物价持续下降, 导致现金货币实际升值。通货紧缩是供给过大、需求不足造成的, 它和通货膨胀一样也是由于宏观经济结构不平衡造成的非良性经济现象。

通货紧缩的基本表现是物价水平在较长时间呈下降趋势。从 1997 年 10 月起, 我国零售物价指数开始出现负增长, 6 个月后, 物价消费指数也开始负增长。这一持续的现象表明国民经济运行开始出现了通货紧缩。1998 年 6 月以后, 我国的通货紧缩情况趋于严重, 直至 1999 年 7 月才有所缓解, 但减缓的程度轻微。这次我国通货紧缩有以下特点:

1. 物价持续走低。从综合价格指数看, 社会消费品零售价格总指数 1998 年下降 2.6%, 1999 年下降 2.9%;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998 年下降 0.8%, 1999 年下降 1.4%。

2. 社会总需求不足, 消费倾向下降。社会总需求分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国外净需求三部分, 目前我国出现的需求不足同时表现在这三方面。1997 年我国已出现了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的趋势, 但是由于当时出口仍在高增长, 大量顺差弥补了国内需求不足。1998 年以后, 受周边国家、地区金融危机的影响, 出口大幅下降, 使需求不足的矛盾完全暴露出来。2000 年上半年出口状况有较明显的回升, 但是社会需求不足的情况仍然严重。

首先, 社会投资需求尤其是集体和个体投资呈下降趋势。1997 年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率分别为 5.5% 和 6.8%, 比 1996 年分别降低了 5.8 个和 18.6 个百分点; 1998 年个体投资增长 6.1%, 集体投资出现 3.5% 的负增长, 低于国有单位和全社会投资增长速度; 1999 年以来, 社会投资包括个体和集体投资, 仍然没有出现明显回升的迹象。受政府对国有投资

政策倾斜的影响，尽管国有单位投资 1999 年前两个月有增长，但从 3 月份开始也出现了大幅的下滑。其次，居民消费需求偏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呈回落之势，1999 年已大大低于前两年的增幅。2000 年上半年同比增长 10%，消费市场状况有所改善。再次，出口需求乏力，境外净需求一度大幅度下降。1999 年上半年负增长 11.4%，进口增长逐步加快，全年累计顺差 79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65% 左右。去年一季度出口开始较大幅度回升。最后，消费倾向下降。1998 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上年的 0.81 下降为 0.79，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长 3.5%，低于收入增长 1.6%，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反而下降了 1.7%。1999 年消费倾向继续降低，去年以来受全球经济转好和中央政府宏观政策的作用，消费市场形势趋好。

3. 市场销售疲软，商品供大于求。1998 年我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增长率为 6.8%，1999 年也是这个水平，比 1995—1997 年期间平均 17.7% 的增长水平低 10 个百分点。统计表明，物价的下降并未带来商品销售量的增长，1999 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 1.4%，多数商品价格低于上年水平。去年上半年家用彩电产量和销售量均比 1999 年上半年下降。

4. 企业开工不足，生产能力大量闲置。近几年来，市场疲软造成企业产品积压增加。1996 年、1997 年全国企业产品库存增加量连续两年在 3000 亿元以上。目前，全国有半数以上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 60%，基础产业也出现了过剩的迹象，全社会开工率下降，下岗职工 1000 多万人，今后每年还会增加百万人以上，产能大量闲置。

5. 货币供应量增速明显降低。以 M1 为例，1990—1997 年的平均增长速度高达 25.9%，1998 年则降为 11.9%，不到平均水平的 1/2，1999 年同比回升至 17%，去年 1—7 月份同比增长 22%，但是仍低于几年来的平均水平。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已出现的通货

紧缩尚未根本扭转，要塑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还要继续作出巨大的努力。但是由于 GDP 总量、社会商品消费量、货币供应量仍保持增长态势，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通货紧缩属于轻度型，是经济长期上升趋势中出现的调整，有别于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经济大危机及日本近年的“双紧缩”状况。

我国经济通货紧缩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原因，社会及民间购买力的萎缩只是果而不是因，主因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结构性混乱，以至生产要素（资金、资源）配置不当、重复建设、管理层的无序经营、国有企业经营恶化、金融体系的呆坏帐增多，再加上外部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冲击等。因此，通货紧缩的出现有其经济、社会、金融、消费及储蓄观念等多方面的深层次原因。

经济层面的原因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1995 年以后，我国社会总供求平衡状况发生了逆转，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逐渐凸现。首先，收入两极分化降低了整体消费倾向。据调查，1997 年，最低收入户的人均年收入仅为 2430 元，消费倾向为 0.96；最高收入户人均年收入为 10251 元，消费倾向为 0.71。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成反比。近年，高收入者收入增长速度高于低收入者，收入两极分化扩大，即总收入中消费倾向较低的那部分收入占的权重上升，导致整体消费倾向下降。其次，居民收入偏低，限制了消费增长。1998 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5454 元，农民人均收入 2150 元，收入水平相当于美国 1897 年左右的水平。还有，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减少了国外需求。此外是需求不足的结构性原因，长期以来的重复建设形成了大量无效供给，在社会和民间需求开始升级的时候，许多企业仍在进行低水平的扩大再生产和重复建设。

二、针对通货紧缩的成因，继续扩大内需

通货紧缩是经济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必须针对通货紧缩的成因，对症下药。

1. 继续采取措施刺激消费。其一，通过增

加低收入阶层收入和提高社会消费倾向两方面入手刺激消费。即以税收和政策调节,降低高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及其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适当增加中下阶层的收入,培育一个相对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提高社会收入的消费倾向,从而稳定消费增长。其二,鼓励城乡居民进行大件升级或普及消费,以汽车、住房、教育消费为切入点,树立新的消费龙头。同时,农村消费市场蕴藏着无限潜力。我国9亿人口在农村,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在生存消费基本条件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对质量的要求正构成新的购买力。对尚未普及家电的农村,应该采取加大资金投入,进行农村电网、用水管道的改造,促进农村家电的普及,缓解产能过剩的问题。其三,重视和珍惜正在兴起的新的消费热点——假日消费。“五·一”、“十·一”气候比新年春节更胜一筹,引导和把握得好,其消费热潮不会比新年春节逊色。只要有合适的环境,消费潜力就会爆发出来,因此适当扩大消费时间和空间有利于激活疲软的消费市场。

2. 鼓励民间资本创业,将巨额储蓄转化为投资。消费包括生活、生产消费两个方面。在推动生活消费的同时,应创造大环境,把部分生活消费转化为生产投资消费。应该看到,与其由政府举债来拉动经济,不如激励人民自发参与投资,只要能挤出6.2万亿存款余额的1/6,就足以创造一个经济高峰,其作用远甚于国家财政扩张所拉动的经济成果。因此,可以通过减免个人投资企业所得税,解决重复纳税问题,推出鼓励社会投资的机制;对符合产业政策的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有企业技术改造项目,提供政策性资助或贷款贴息支持;

稳步发展资本市场,募集资金支持经济发展,建立多渠道全方位的融资体系。

3. 逐步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树立新的消费观念。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有机整体,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社会再生产就不能顺畅运行。城乡居民消费趋淡状态不改观,产品价值不能实现,就很难有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要转变传统的消费观念,树立全新的消费观。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树立全新的消费观念,从根本上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以促进经济的协调增长。

4. 建立新的金融信用体系。1994年治理整顿后,我国大量金融机构因地产、三角债、盲目投资而套牢大量资金,金融体制暴露出不少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为解决结构性问题,政府已拨出巨资,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协助国有银行消化不良债权。当前应积极推动大金融机构合并与改组,将资质差的中小金融机构淘汰出局,实现金融体制重建。以新的社会信用体系,彻底解决金融市场的低效和资本市场运转缺血的问题。

5. 协调好改革与经济健康发展的关系。在结构性问题与周期性并存的情况下,要不失时机地推行经济结构调整。结构调整是长远目标,但解决结构性问题需要一定的经济体力做保证,如果在体力尚未恢复的情况下过急地推行结构改革,可能会加重通货紧缩的程度。因此,要考虑各个层面的承受能力,循序渐进,减轻通货紧缩对社会的冲击。

责任编辑: 韦 前

刍议经济环境变化与“机会”开发

王 彤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98 级硕士研究生,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 大多数公司经营所面临的经济环境比以前变动更快且更不可预测。为此我们要重新认识风险, 要看到当代企业经营风险存在及其重要性在增加的趋势。关键在于有效地开发“机会”。机会是一种预期有利于企业的变化状态, 获得它要作出初始投资, 这包括等待、干中学。规避风险需要在等待中学习。

[关键词] 经济环境 不确定性 机会 学习

[中图分类号] F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1) 03-0017-02

一、经营风险存在及其重要性趋势

大多数公司经营所面临的经济环境比以前变动更快且更不可预测。这部分是因为市场全球化趋势不断加深, 部分是因为技术革新诱发的市场剧烈变化。但无论是什么原因, 不确定性需要管理者在接近和对付风险上变得越来越老练和圆滑。为此, 我们要重新认识风险, 要看到当代企业经营风险存在及其重要性在增加的趋势。

1. 不确定性的存在和决策者的有限理性使得对企业来说事前一定成功的道路不存在。这两点思想最早分别由 Knight (1921) 和 Simon (1947) 提出。不确定性存在于宏观环境以及行业特征的各个方面, 事前难以预测, 它可能给企业带来利润, 也可能带来损失。管理者决策的有限理性使其不可能去穷尽所有的可能分布。而在中国, 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 市场主体和市场组织的成长发育受阻, 市场机制发生扭曲, 市场秩序比较混乱, 这种不确定性就更大。

2. 市场不成熟以及技术发展的快速使得 X—低

效率更加严重。Leibenstein (1966) 认为由于不能正确地采用最优的工作方法导致低效率, 从而导致企业遭受风险。我们没有理由判断中国企业的经理在智商或情商上低于发达国家的经理或企业家, 或者相反。但由于中国缺乏一个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及公正的监督机制 (用来评价和选择经理), 寻找高素质的经理的成本将非常高, 这使得由于经理的“无能”造成 X—低效率更加严重。

3. 科技和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越来越明显。企业创新的前期投入成几何倍数的增长。投资失误产生的沉淀成本并不是一般企业所能承受的。在 19 世纪 60 年代, 开发一个电机开关需要 2 亿美元, 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开发一个全新的数字式开关就需 10 个亿; 在 90 年代末, 开发新一代开关则需 20 个亿 (都为 1993 年价格)。中国幅员辽阔, 市场开拓的成本也是相当高的。其战略决策已不能再带有传统“三拍” (即决策之前拍胸脯, 决策之中拍脑袋, 决策之后拍屁股) 的特征, 企业需要比以前花更多的时间去获得更多的信息以消除不确

定性，因为市场让你失败再爬起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二、关键在于有效地开发“机会”

1. 机会是一种预期有利于企业的变化状态。机会往往有一种偶然性，所以常常被赋予神秘的色彩。而实际上机会是一种预期有利于企业的变化状态，它在总体上是可以识别和思考的。中国《易经》有“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企业往往缺乏的不是机会，而是控制机会的能力。如何有效地开发机会是成功关键。所以许多情况下，必须学会耽搁，直到机会属于自己。否则，就会或因未掌握足够的运作信息，或因缺乏关键资源，而使为机会所做的巨额投资成为沉淀成本。

2. 分析投资的不可逆性及其影响因素。投资是不可逆的。有这样一种观点：投资是可逆转的。企业认为它可以在任何时候决定是否退出，而通过变现来收回投资，或者将投资用于其他方面达到覆盖成本的目的。时间真有这种弹性吗？在大多数情况下，投资是不可逆转的，也就是说决策失误后，投资残值很低。因为未考虑经济规模等因素，广州 40 万吨乙烯工程建成投产之日就为亏损之时。由于不能整体迁移，而且生产流程构造已经定型难以变更，不可能被同业以建造成本为依据来收购，损失很大。这主要由资产的专用性和不可分性决定的。同时，不可逆转性还要受到政府管制、制度安排和不同公司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3. 在知与未知间作出有价值的战略选择。在投资之前，首先要系统地描绘出所有知道的信息和所需要了解但还未知的信息，得出有价值的战略选择。知道我们现在处于什么位置，前景大致有几条什么样的道路。尽管不能考虑全部情况，也应发展多种

战略决策，包含清晰的行业结构、行为和绩效以及内部资源丰富情况和分配使用方案。重要的是找出每一种战略选择中的成功者所需的关键因素。然后，根据未来收入的可能性范围而勾画出几种前景，尽管不能把将来所有可能的收益都数量化，但应深入了解决策判断所需考虑的问题，如还应具备什么样的信息和资源，对企业组织结构有何要求，员工整体协同效果的影响程度如何等。

4. 初始投资中的等待与学习内涵。我认为，等待、干中学是企业初始投资的重要内涵，也是规避投资风险的必要付出。分析判断的过程是等待的前奏。等待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干中学。很多情况下这包括作出一种初始投资。这种投资可能在于获得进一步信息，处理消费者和供应者的关系，或者获得生产的经验。在这种投资学习过程中，它可以使公司在不确定性减少情况下去判断是否进一步投资，机会是否属于自己，这样既可以避免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全身投资的风险，又可以尽量不为竞争对手所超越。联想尽管看见了中国个人电脑的潜在巨大市场，最初却未投资开发生产。它先做 IBM 等著名品牌的代理商，建立自己的营销能力，跟随并掌握技术发展和制造工艺。在等待之后，推出自己的品牌机，一举进入了亚洲个人电脑生产商五强。

实践中，在判断、等待学习与进入投资之间，往往很难把握严格意义上的分界点。在判断上，一个可能的标准是等待预期可增加的收益可以覆盖等待的机会成本。我们强调通过等待和学习去了解顾客需求、专有技术的稳定性、变化的价格或政府政策等。通过实践，推进式地认清时机，这比自以为抓住别人尚未发现的时机要好得多。

责任编辑：韦 前

流通产业的改革与发展：一个理论前瞻

何文君 马顺福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博士生,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 本文给出了一个描述商品流通企业生存发展条件的简单模型。通过模型分析指出商品流通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中心, 是降低进货价和经营成本, 同时设法提高商品的效用与附加值。文章最后以此为理论依据, 对我国商品流通产业的组织、业态、区域分布等方面的改革发展趋势进行了初步预测。

[关键词] 商品流通产业 分析模型 理论前瞻

[中图分类号] F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 (2001) 03- 0019- 03

一、引言

要分析商品流通产业在新世纪的改革与发展, 最好是从批发零售业的改革与发展入手。本文首先对批发零售业 (为方便行文, 以下统称为流通业) 的生存与发展条件给出一个基本假定, 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个简单模型, 然后再根据这一模型对流通业在新世纪的改革与发展趋势进行理论分析。

国内迄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主要有两种倾向: 一是看重经济转轨中流通产业面临的问题, 论述流通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作用及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改革发展方向; 二是以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流通产业的现状与动态为蓝本, 分析我国流通产业的改革发展方向。本文试图突破这两种研究范式, 从流通产业的内在规定性出发, 从理论上对我国流通产业的改革与发展方向作出前瞻性分析。

对流通产业性质的确认, 是本文构建模型及理论分析的前提。本文认为, (1) 相对于生产和消费而言, 流通是派生、从属的, 没有生产与消费, 就没有流通产业。生产和消费发展到一定阶段, 才有专门从事商品流通的企业 (或个人) 出现; (2) 流

通业是以利润为其经营目标的。利润是其发展的原因, 也是其存在的条件, 从经济发展来看, 原始社会条件下人们自给自足, 不存在流通产业。后来,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交易的产生, 才有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易的中介性居间商, 后来又有了专门批发商和零售商。专业商人的出现与存在, 降低了生产者自销其剩余产品的交易费用, 从而也促进了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所以,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流通产业具有先导性作用。但不论如何, 其中介盈利性的本质并没有变。

二、流通企业生存发展的条件——一个简单分析模型

1. 分析模型

如上指出, 商品从生产者向消费者的转移为流通企业提供了生存空间, 而流通企业的盈利性是其存在的条件。流通企业的盈利水平是由其经营商品的进销差价及经营成本决定的。对一个流通企业来说, 设其进货价格水平为 P_1 , 销售价格水平为 P_2 , 经营成本为 C , 则其盈利水平 R 为:

$$R = P_2 - P_1 - C$$

显然, 该流通企业长期生存发展的条件为:

$$R \geq 0 \text{ 或 } P_2 \geq P_1 + C$$

从此可以看出, P_2 越大, P_1 、 C 越小, 则 R 越大, 表明该流通企业的盈利水平越高, 其生存发展的能力就越强。

2. 影响流通企业盈利水平的诸因素分析

从分析模型知道, 影响流通企业盈利水平的因素有 P_2 、 P_1 、 C 三个变量, 现实中每个流通企业要长期生存发展, 就必须设法降低 P_1 和 C , 同时尽可能提高 P_2 。如下是影响 P_2 、 P_1 和 C 的因素。

(1) 同行竞争是影响 P_2 的因素。从追求高利润的动机讲, 每个企业都会尽可能地提高 P_2 。假如一个城市只有一家零售商店进行垄断经营, 那它完全可以将 P_2 提高到消费者刚好可以承受的上限, 完全占有消费者剩余。但在现实中, 由于众多零售商之间的竞争, 甚至还有厂家直销的竞争, 因而 P_2 不可能确定在对零售商最有利的水平。可见, 同行竞争是影响 P_2 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 即使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 个别企业仍然可以通过对购物者提供相关服务, 从而增加其效用的方式保持其较其他竞争者更高的 P_2 。比如一个企业具有较高的声誉、服务体系完善、购物环境优雅, 以及能给购物者提供休闲娱乐的良好条件, 则即使该企业的 P_2 较其他竞争者高一些, 消费者仍愿意到该企业购物。这说明, 服务质量、商业信誉等无形资产也是影响 P_2 的一个重要因素。

(2) 影响 P_1 的因素。 P_1 首先取决于流通企业与供货者之间讨价还价的能力, 而这种能力又取决于:
a. 双方之间合作关系的紧密程度。
b. 进货的数量。一般而言, 进货数量越大, 企业压价的筹码就越重, 而对方开低价的积极性也会越高。
c. 从财务上考虑, 现款进货与延期付款相比, 供货方更愿意对前者以价格优惠。以上是一般而言, 对零售企业来说, 如果它是从批发商处进货, 则 P_1 必然包含批发商的利润, 因而较高。所以如果政策允许, 他会倾向于

绕开批发商, 直接从生产厂商进货, 这样, 商品流通环节减少了, P_1 就能够降低。

(3) 影响 C 的因素。影响 C 的最明显因素可以说是流通企业的雇员人数, 雇员人数越小, C 越小。所以企业会积极寻求减少雇员的经营方式, 并积极采用先进的营销管理设备。营销场所的租金是影响 C 的另一重要因素, 所以流通企业会在场所租金和客流量之间进行权衡, 以选择最佳的经营场所。商品流通速度或库存量也是经营成本中的一个影响因素。零库存是各企业追求的目标。

三、我国流通业发展的现状

从上述各因素对流通企业的现实影响, 可以揭示出其目前的状况。首先, 目前我国已全面放开商品市场, 新增流通企业急剧增加, 使得流通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加上生产企业为增加其盈利水平而大力发展直销业务, 各流通企业只好以降低售价来吸引顾客; 部分企业则以提高信誉、优质服务和购物环境来招揽顾客, 但需要大量投资。其次, 为了尽可能压低进货价格, 流通企业出现规模化经营的倾向, 同时许多零售企业绕开批发环节, 直接从生产厂家进货。第三, 企业在制度和技术上的革新为其采用先进技术装备、减少雇员人数和商品库存创造了条件, 如采用计算机系统管理的超市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另外, 城市繁华地段的地价升高, 迫使企业向中心外围甚至城郊迁移或布点。第四,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网络的发展, 电子商务这种新的流通形式已经出现。这固然有技术上可行的原因, 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为顾客提供的便捷性及丰富的信息量。第五, 流通企业合并、重组及其组织形式已发生重大变化, 而这些变化的原动力均在于设法提高 P_2 , 降低 P_1 和 C 。如连锁超市在近年得到很快的发展。

四、流通产业近中期发展与改革前瞻

依据上述分析, 可以对我国流通产业近期、中期的发展改革方向作如下的预测:

第一, 连锁经营等扩大经营规模的方式将进一

步发展，呈现从中心城市向县镇扩张的趋势。其目的在于降低 P_1 和 C ，同时扩大企业的市场份额，获取规模报酬。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农村收入水平的提高及农村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农村的流通业将向县镇集中，分散于乡村的小型卖点将逐渐萎缩。

第二，购物环境优雅、服务质量高的大型商场将长期存在，高档次的专卖店亦有较大发展空间。这些业态的存在以城市高收入人群为指向，其经营方向也会朝进一步适合高消费者的需求而不断调整，以达到尽量提高 P_2 的目的。

第三，电子商务将日益完善，盈利能力随之提高。当前影响电子商务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家庭上网数量较少、货物配送不及时，网上支付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较差。但网上购物的便捷和相对较低的价格对顾客的吸引力很大，这会促使电子商务服务商逐步消除其业务发展的阻力，凭借其网络覆盖面广的优势开拓市场。在这个过程中，“电子商店”也可能通过兼并合营等形式来改造并利用现有业态，以便低成本构建其配送渠道。总之，电子商务的改革和发展将围绕降低 P_1 和 C 这个中心来进行。

第四，城郊仓储式超市将会有长足发展。这种业态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企业降低 C 和提高规模报酬的愿望。同时，城市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私人汽车拥有量的增加也为这种业态的发展提供条件。

第五，批发业将由于零售商降低 P_1 的努力而出现较大的调整和转型。其中，大型批发企业将可能转向从事国际贸易，中小型批发企业的生存空间将变小。经营不善者将很快被淘汰出局。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市场监管的加强和市场秩序的优化，城市

大型批发市场也将出现收缩态势。

第六，流通企业采用新技术装备的积极性会进一步提高，其目的在于降低人工成本；同时以先进的管理方法降低成本，提高服务的规范化水平。

第七，买断经营会有较大的发展，代销也将长期存在，商业代理制将进一步完善。这一切势必促使新世纪丰富多样、日益和谐的工商关系的出现，工商一体化企业将有大的发展。但中心仍然是零售商努力降低 P_1 ，以吸引更多的顾客。

第八，生产企业直销的比例有增大趋势，同时实力雄厚的大型流通企业通过纵向一体化控制生产企业的倾向会有所加强。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企业提高利润，另一方面是流通企业有降低 P_1 及进行多元化经营的倾向。

第九，业内竞争将进一步加剧，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会更为频繁。兼并重组将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同一城市的企业兼并重组；二是不同城市的企业兼并重组。前者是为了扩大规模，提高在当地竞争力。后者则主要是为了形成市场网络 and 整体规模，用统一进货、统一销价的方式降低 P_1 ，同时塑造品牌优势，争取更多的流动性顾客。不同城市的企业兼并重组，采取的方式主要有连锁和特许经营。

第十，流通领域的民营化比例将迅速增大，企业的产权进一步明晰，企业经营效率会大幅度上升。尤其重要的是，外资企业的大范围进入及由其所产生的竞争压力将促使国内企业进行制度创新和经营方式的转变。

责任编辑：韦 前

特许经营的实质及其“克隆”意义

刘凤军

(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北京 100872)

[摘 要] 特许经营与连锁经营是两种关联性较强而又不完全等同的企业发展模式。前者是后者的特殊形式。特许经营实质上是一种以品牌为核心、以契约为约束, 严格运作的高级营销形式, 也是当今企业乐于运用的品牌扩展与市场扩展方式。

[关键词] 特许经营 连锁经营 品牌扩展

[中图分类号] F7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1) 03-0022-03

美国的胜家缝纫机公司是特许经营的鼻祖。据统计, 目前美国的社会零售总额中有近半数是通过特许经营方式实现的; 平均每 8 分钟就有一个特许加盟店开业, 现有 55.8 万个特许经营店, 4800 家公司。在英国, 目前共有 2.5 万家特许权公司, 通过特许经营投资扩充的直接资本多达 25 亿英镑。^①在我国, 特许经营还处在起步阶段, 但近年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特许经营越来越成为企业乐于选用的品牌扩展与市场扩展的有效方式。

一、特许经营的实质是品牌连锁

特许经营是一种以契约方式构筑的, 特许人与受许人共同借助同一品牌在同一管理制度 (体系) 的约束下实现品牌扩展、市场扩展, 进而实现双赢或多赢的营销方式。在契约关系下, 特许人为受许人提供包括产品、分销和促销在内的一套模式化的营销方法, 受许人因此而向特许人支付一定的费用。特许经营有众多不同的类型, 最常见的是在制造商与中间商、服务企业与中间商、中间商之间开展此项活动。但不论特许权交易双方是何种行业、什么性质的企业 (制造商、中间商抑或服务类企业), 特

许经营都应遵循特许经营的基本原则, 同时呈现出以运营同一品牌为核心这一特征。

1. 特许经营有别于连锁经营

连锁经营与特许经营是两种关联性较强而又不完全等同的企业发展模式。可以认为, 特许经营是连锁经营的继承与发展, 是连锁经营的特殊形式。这决定了特许经营与一般意义的连锁经营不同。

首先是投资主体不同。特许经营方式下新开设的每一家特许经营分店 (加盟店) 都不需要特许人投资而是由受许人 (加盟者) 出资。这表明, 特许经营方式下的投资主体是多元化的, 主要投资者不是特许人, 而是各加盟者 (受许人)。显然, 连锁经营作为同一资本所有、经营同类商品和服务、由同一总部集中管理领导、共同进行经营活动的零售组织形式 (欧美一般要求连锁店的数目在 11 个以上), 其投资主体是总部, 具有单一性。这是特许经营与连锁经营的根本性区别。

其次是决策权不同。投资主体不同, 其所有权不同, 决策权也势必不同。特许经营业务开展的基础是品牌或一整套经营模式和专有技术等, 特许人

把这些以特许权组合的形式转让给受许人，受许人据此独立开展业务。也就是说，各加盟店的人事和财务都是独立的，受许人独立决策日常经营活动，总部或盟主不直接干预各加盟店的日常经营活动。而连锁经营实际上只需足够的资金和合适的业务类型就可以进行，连锁总部对各分店拥有所有权，对分店经营中的各项具体事物均有决策权。

再次是经营范围不同。特许经营有制造商与中间商、服务企业与中间商、中间商之间的特许业务等众多不同的类型。而连锁经营的范围一般限于流通业和服务业，很少或基本不涉及制造业。

最后是约束机制不同。特许经营的核心是特许权的转让，特许人（总部）是转让方，受许人（加盟店）是接受方。受许人需要对特许人授予的特许权和提供的服务以某种形式支付报酬。双方的约束依据是契约关系或合同协议，是法律。而连锁经营中总部和分店之间则不属于合同关系，也不应受合同来约束双方。连锁经营方式下的总部与分店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依靠公司或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来调整。

2. 特许经营以品牌为核心

特许经营作为知识产权的总体转让，实质上一种以品牌为核心、以契约为约束的严格运作的高级营销形式。

(1) 品牌是特许经营存在的基础。据上涵义，特许经营是以特许人与受许人双赢为必要条件的一种合作方式，而双赢的基础是品牌。因为，理智的受许人不会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未来发展寄托在不具有市场影响力的品牌上。只有存在具有市场发展潜力的品牌，品牌所有者和使用者才可能借助该品牌实现双赢或多赢，也才存在特许人和受许人。

(2) 品牌的增值是特许人与受许人的共同目标。具有市场影响力的品牌是特许经营成立的客观基础，特许双方的利益也系在了品牌在市场的表现上，若特许双方共用的品牌具有较强的市场占有率和发展潜力，那么特许双方从中获得的收益就多；相反，

双方的收益则少。

总之，在特许经营中，很大一部分权利涉及品牌特许。在很大程度上，品牌已成为特许系统的代号或成为不可分离、融为一体的主要部分。

二、特许经营不只是 Copy，而是 Clone

“Clone”（克隆）和“Copy”（拷贝）虽都有“复制”的意思，但前者比后者更具有“活”性，“Clone”是有生命的物质的生命延续。特许经营作为以品牌连锁为核心的品牌扩展方式，欲使特许人与受许人共享的品牌能够得到发展（这是双方的共同心愿），使品牌在特许经营这种品牌扩展方式下得到增值（这是特许者的品牌运营目标或特许的目的），不仅需要塑造统一的外部形象，而且还需要有维系品牌内在质量和外在形象的专有技术、独特配方和有效的经营方式、管理控制手段等的继承与发扬。这是品牌的灵魂所在。之所以把特许经营比作“Clone”，是因为在特许经营的过程中，特许方是通过“遗传”良性基因（支撑品牌的“活”性物质），才使受许方获得繁衍生存与发展。如在特许经营方式下，一旦某个企业与加盟者通过签定特许协议进入特许系统就获得了在某一地区按特许方规定的模式经营被指定商品或服务权利，特许方向被特许方或受许方输入经营思想，提供整套的经营战略、计划及实施方案，并负责业务指导与培训，同时还要对供货、广告、促销等实行统一管理。

特许经营的“克隆”意义还表现在，特许经营过程中，在规范共性的同时还要考虑保持个性。虽然追求一致性是特许经营方式的最基本的原则，但这并不否定各加盟店存有个性的合理性。因为，受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各加盟店所面对的目标市场不尽相同。在保持一致性的同时，适应市场的需要，各地的加盟店存有一定比例的个性是保障品牌在异地做“活”的客观要求。如，“全聚德”这个拥有135年运营历史的老字号，在各加盟店必须按统一标准经营其特色烤鸭及22种标志性的菜品以外，允许各加盟店适应市场经营其它，将全聚德的共性与各

加盟店的个性有机结合起来，使消费者既有目标性又有选择性。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个性化程度不宜过高。否则，就失去了品牌连锁的含义，也就不是特许经营了，甚至可能会出现品牌降誉。

三、特许经营是品牌扩展的重要方式

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其成功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都是特许专卖权所有者，都成功地应用了特许经营方式。可以说，没有特许经营，麦当劳和肯德基快餐店就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在全世界繁衍，也难以成为全球性品牌。

对于特许方来说，特许经营可谓是一种低风险、低成本的品牌扩展或市场扩张模式。一方面，在特许经营方式下，特许人可借助他人的财务资源实现品牌扩展和市场扩张；新开设的每一家特许经营分店（加盟店）都不需要特许人投资而是由受许人（加盟者）出资，受许人对该分店拥有所有权。这就使得特许人能以更快的速度扩展业务、拓展市场而不受资金限制，由此使得特许经营成为迅速扩大品牌影响力、提高市场占有率的较佳方式。此外，各种金融机构基于特许经营风险小而更愿意提供贷款。另一方面，特许经营可使特许人节省人力资源，降低运营成本。企业扩大经营业务、拓展市场需要大量人才，而特许经营方式的人员管理、日常经营管理均由受许人承担。这使特许者节约了经营管理成本，而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新产品开发和品牌声誉扩大上。

对受许人（加盟者）来说，特许经营意味着他必须放弃自有品牌（如果有的话）。受许人冒此风险而乐于加盟，是因为特许经营能给受许人带来许多益处：其一是借助特许人的品牌优势，可迅速获得良好的市场效益；其二，成为加盟者的企业，借助

特许人的品牌强势，增强了抗风险的能力，易获得条件优惠的贷款。其三是通过引进特许人成功的经营管理模式，能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等等。正是基于上述比较，特许经营对特许人和受许人均有很多益处，才使得双方乐于采用这种方式合作，特许经营也由此而风行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有意扩展自己品牌的特许者，必须考虑特许经营对于品牌、市场声誉等无形资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对构建特许加盟体系有预先的理性而深入的调查分析，这是确保特许经营健康发展、实现双赢的必要前提。此外，还要做到这样几点：一要选择合适的加盟者，一般认为，那些具有成熟的经营理念、经营者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有较丰富的经商经验的企业是比较理想的合作伙伴；二要建立统一的经营管理制度，将经营程序、规范和作业标准等制成通俗易懂的手册，并通过培训使加盟店的从业人员能够熟练地掌握，这是确保各加盟店与盟主从形式到内容达到真正统一、双方共同塑造特许的品牌统一形象的重要条件；三要有严格的检查监督制度，监控加盟者的经营活动，对于那些不能按照协议要求从事经营活动的加盟者应及时终止特许关系，以免损害整个特许系统声誉；四要注意专有技术等保密工作。保密并不是保守，搞技术封闭。现实经济生活中，技术保守或技术封锁是不可能使品牌在特许中获益、增值的。如向加盟者提供用秘方或技术制成的配料袋而不提供秘方或配方本身，是特许者常用的比较有效的做法。

①张祺：美英特许经营一览，《名牌时报》1999年8月25日第2版。

责任编辑：韦 前

新经济与区域经济合作

——中华经济协作系统第六届国际研讨会述评

周运源 王文娟 林志锴

(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所教授, 广东 广州 510275)

〔中图分类号〕F062.3; 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1)03-0025-02

2000 年 11 月 25 日至 28 日由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香港岭南大学商学研究所、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澳门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举办的中华经济协作系统第六届国际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来自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澳门、日本和新加坡等 100 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主要围绕新经济与两岸四地的交流合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综合评述如下:

一、关于传统理论与新经济

有的学者认为, 美国经济近十年来所表现出的高增长、低通胀和低失业状态, 与传统经济所表现出的经济周期、经济增长中收益递减规律以及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失业率与通胀率彼此消长的交替关系等特征相比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 因此是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另一些学者则对“新经济”提出了质疑, 认为 9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仍然可以用传统的经济学加以解释, “新经济”只不过是传统经济学的现代版本。大部分学者则认为, 如何看待世纪之交美国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新的现象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正视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增长方式、经济活动的组织与制度、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际

关系的深刻影响, 及其对港澳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二、关于新经济与两岸四地的交流合作

1. 两岸四地交流合作的必要性。有的教授认为, 世界经济已进入新经济时代, 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里, 要取得更大的进步, 必须与国际接轨, 这就需要两岸四地的经济界互相合作, 共求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 地处亚太经济社会中心的粤港澳台四地, 在亚太新格局的整体发展中承担更为突出的特殊作用。由此产生全新的经济联系和合作关系。粤港澳台经济日益向区域化发展, 将促进亚太新格局的持续发展。可见, 加强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是迎接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挑战的必然选择, 也是四地经济融合程度日益加强的客观需要。同时, 两岸四地只有加强合作, 才能增强与其它一些区域集团抗衡的能力, 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 两岸四地交流合作中的契机。有的学者认为, 在发展新经济方面, 两岸四地各有特点和优势, 也各有缺陷和不足, 只有加强协作, 才能取长补短, 在协作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广东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 基础设施日趋健全, 劳动力成本较低, 有许多优秀人才, 并有庞大的内销市场; 台湾则具有资金和技术等优势;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外

贸、货运、信息中心，起着非常重要的沟通桥梁作用；澳门经济也很有特色，其未来的发展将更加有赖于如何加强与内地交流合作。

两岸四地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即将加入WTO，对两岸四地来说，这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将使两岸四地经济在专业上的分工与合作机会越来越多，领域会更加广阔。两岸应该抓住入世这一契机，融入国际范围的经济联系与合作中。

3. 新经济下两岸四地交流合作的新领域。来自内地的一些学者认为，可以借鉴旧金山湾区的经验建立香港——珠江三角洲湾区。以香港为融资营运中心，以港深穗为高科技孵化中心，以珠江三角洲为生产基地，并与京沪等城市建立策略性联盟，形成南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地区。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可以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与深圳区域金融中心的优势结合起来，建立以民营资本为主的风险投资机制和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二板市场，使高科技企业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来自台湾的一些学者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对抗不再是国与国之间的抗衡，而是经济圈对经济圈的竞争，两岸四地要同心协力建构一个大中华经济圈。在此经济圈内，对两岸的科技交流、人才交流应持开放态度，要加强教育体系的合作，并促成两岸科研的新的分工与整合。有的学者建议两岸应集资成立“研究智能库”和“创业投资基金”，鼓励科技人员创新；继续推动资讯通信基础建设，建立与新经济体系相关的法律制度，改善投资环境，提供新知识经济体系所需的知识、技术及能力。

来自港澳的学者认为，如果海峡两岸能通过新理念、新智慧顺利实现“一国两制”原则下的和平统一，那么，内地、港澳台共同组成的大中华经济体将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实体之一。包括港澳和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即大珠江三角洲应进一步提升对内与对外的合作层次和水平，使之成为亚太地区的一个主要的增长源。

来自日本的一些学者认为，新经济、新产业的兴起，不仅改变了传统的产业结构，也引起了对外投资形态的变化，而IT行业对外投资已有趋向水平分工及寻求配套厂商群聚规模的要求，而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最大的区位优势是群聚，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吸引IT产业的外资，发展新经济。

三、两岸四地新经济的发展态势与前景

来自台湾的一些学者提出，未来中华经济区域应加强区域整合，建立协调的分工体系，善用知识及智慧，谋求区域与民族的整体发展，继续推动经济体系国际化及资讯化，加强国际合作经验的交流。也有学者认为，两岸必须加强在高科技产业方面的合作，从趋势看来合作前景非常广阔。以资讯科技为主的“新经济”潮流能够带动两岸四地在经济上的整合，形成较具体的中华经济协作系统的运作，逐步成为东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有学者认为，加入WTO，中国的信息产业发展势必纳入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轨道。纳入全球一体化体系的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要提高国际竞争力，首先是区域信息产业的特色与竞争力。加入WTO后，民族型经济体系将成为这个地区发展的主流。

另有这样一种观点，加强两岸四地经济合作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完全的经济一体化。香港和澳门已回归祖国，台湾也必定会与祖国内地实现统一，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和完全统一的实现，两岸四地最终要形成一个经济体。但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按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一蹴而就。一些学者认为，内地与台湾之间的经济关系是目前最为薄弱的环节，但也最具发展潜力，要改变两岸经贸关系中存在的单向性、不平衡性、间接性的缺点，进一步加强两岸经济联系与合作无疑成为日益凸现的重要问题。

因此，把握港澳回归后的机遇，利用加入WTO等有利条件，加强经济联系合作，有利于实现两岸四地经济的互补，共生共荣。

责任编辑：韦 前

中国农民的有组织开放体系 与农村信息经济选择 ——读《经济组织的制度逻辑》的启示

郑英隆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员, 广东 广州 510050)

[关键词] 全球经济一体化 有组织的农民经济开放模式 农村信息经济选择

[中图分类号] F32; F30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 (2001) 03- 0027- 03

《经济组织的制度逻辑》是华南农业大学罗必良教授的新作, 也是山西经济出版社最近推出的“中国农业经济学博士论丛”的一种。该书以经济组织为研究对象, 在运用制度经济学原理构建出一个关于经济组织的分析框架基础上, 对中国农民经济组织问题进行了应用分析。全书除导论外分三篇, 第一篇包括第 1- 2 章, 主要是提出问题和设定问题解析的逻辑起点; 第二篇包括第 3- 7 章, 主要是根据经济组织性质与组织制度演进逻辑来分析经济组织的结构多样性、功能差异、效率边界与规模极限, 并遵循经济组织的内在机制来推导经济组织的集体行动逻辑, 从而揭示出经济组织制度变迁的线索、方式及其绩效依据; 第三篇包括第 8- 13 章, 重点是根据第二篇中建立的理论构架和分析思路对中国农民经济组织问题进行应用研究, 同时是对第二篇的理论框架作检验与深化。读后深受启发。

1. 启发我们思考的首先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我国农业开放与农民经济组织问题。中国即将加入 WTO, 国内农产品市场也因之而面临国际农产品

大量进入的挑战与压力, 这与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农业大国的国情 (第一产业产值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7%, 农业劳动人口更是占全国总劳动人口的 50% 多) 联系起来, 我们也就不能不注意两个重大而相关的问题: 一是在不可逆转的中国经济融入全球一体化潮流中, 国内不具优势的农产品生产将首当其冲地受到世界农产品市场进入的强烈冲击, 如果这种不具优势的生产的范围过大, 受到强烈冲击的将不仅仅是既定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思路, 而且是全国整体的稳定发展问题; 一是对农民经济的影响将因开放程度不同而在不同地区、不同经营组织表现出不同的含义与特征。农业开放度问题始终是我国复关与入世谈判中一个焦点, 其缘由恐怕也主要在于此。今年 1 月中国谈判代表团与各世贸组织成员为达成结束中国入世的一揽子协议的谈判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分歧点, 主要集中在中国是否可以在入世后对农产品出口实施出口补贴及其相关问题上。中国的态度是: “通过开放农产品市场, 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并参与国际竞争”, 同时中国又必须“保

留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定范围内提高农产品补贴权利及其它农业支持手段”。因为占全国 3/4 人口的 9 亿农民的利益和农业的稳定发展不能不是中国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更主要的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农业封闭性与弱质性，不论是抗自然风险的能力还是抗市场竞争风险的能力都很低。问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农民经济单位分散，农业组织化程度低。换句话说，中国农业要自立自强于世界农业市场体系，首先得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在农业市场化改造过程中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

2. 有组织的农民经济开放模式选择问题。如何有效地提高农民经济的组织化程度是我国不容回避而急需解决的一个大问题，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农民经济要增强其在国际农业市场中的主动地位，目前仍困难重重，归纳作者的观点有：（1）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农民的自主性、市场谈判能力与自我保护能力仍十分弱小，而又不得不承受来自其它市场主体或非市场主体的挤压以至掠夺；（2）农民经济分散，组织化程度低，处在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上，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日显突出；（3）受进入空间约束与进入壁垒限制，以及缺乏适宜的生存环境，业已存在的农民经济组织极不稳定；（4）组织内部激励机制不足，也导致农民经济运作成本高昂。为此，对在准备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中国农民来说，最迫切需要的或许是一个能代理他们权益的明智的领导者群体，引导他们走在竞争中合作之路，跨越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并从根本上实现和保护自己权益；引导他们走出跨国经营之门，在国际农业经贸市场的“摸爬滚打”中逐步增强自主选择与自强于世界的能力，形成“有组织的农民经济开放体系”。有组织的农民经济开放，或称管理式开放要比市场式开放更适合中国国情，更符合中国农村农民的自主意识实际。“有组织”并非与“市场”水火不相容，而是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其基本内涵：一是市场组织，如一大批农业企业，企业内设有有计划、有适应国内与

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发展要求的职能部门，或由若干中小型农民企业合并重组成一批有规模经济性的大农业公司，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上用组织代替市场，有效地实施发展计划；一是一批农业企业借助市场合约联结成若干有效的企业集团与组织联盟，以公司合力有目的、有秩序地实施跨国发展战略目标，比如以“同心型”农业企业集团使那些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一是各经济组织共同遵守的市场规则与运行秩序。

3. 农民经济开放系统与农村信息经济发展问题。开放系统的本质是通过不断地对外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流来达到平衡，全球一体化条件下的中国农民经济开放系统同样需要在不断地对外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和信息交流中取得其发展的依据及其在全球开放型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在世界信息经济迅速进步的今天，中国有组织的农民经济开放系统使符合农民实际需要的农村信息经济发展，包括农业信息化、农民信息产业化、农村社区管理信息化、农民家庭信息化问题等，变得日显突出，也因中国特色而比其他国家存在更多的根本性差异。国际开放条件下的农民经营活动特别是农业企业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信息。按信息经济学的观点来解析，农民要获得信息、要管理好使用好信息、要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农业企业是要付出成本的，而至于通过市场交易方式获取，还是由组织管理配给，那种安排的成本较低，更可行，则是可选择的。根据后发国家信息产业的现实发展往往处在信息产业的历史纵向演进与国际横向比较的交点的判断，我国农村信息产业的培育、发展将是既有市场交易行为又有组织管理安排的一种并举线路，这也是中国有组织的农民经济开放模式所决定的。我赞同作者对中国农民经济组织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因为其中也有一个农村信息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与选择问题。农业生产受气候、生态环境或不可抗力影响较大的特点，使经营农产品要比经营其他产品带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 and 风险，把农产品经

营的这种不稳定性与风险进一步推广到范围更大、竞争更加激烈、形式更加多样的世界农产品市场上,经营风险与复杂性更是倍数加大,这是农村信息产业发展的最基本依据。而运用书中有关产权尤其是农村产权制度安排的理论(P.173-174)分析中国农村信息经济的发展问题将更有意义。比如说,一项有关粮食出口的信息分析报告,可适于粮食种植者、粮油加工企业、对外运输企业、粮油进出口公司,还有其他利益相关者使用,也因之而可有若干种安排;这样,如果把这项信息分析报告仅仅交由一个农业企业占有使用,就不可能是最有效率的信息产权安排。为此,基于信息的信息经济性分析,该项信息分析报告的最有效做法是将其所有权按权责利对等原则分别安排给如上几种有关粮食进出口的不同类型企业中。而当这些企业的信息利害关系或利益关系不是完全一致时,信息的组织管理就成为一种更有效率的选择与安排。从组织规模与信息成本的关系分析,作者认为,随着组织越来越庞大,变得复杂,信息搜集和生产协作的成本将会上升,如果大组织被分成若干个自主权单位,往往会降低这些成本。

4. 中国农民的自主选择(决策)权与信息机制问题。维系一个“有组织的农民经济开放系统”需要有不断的对外交流与交换,而首先是信息的交流与交换,要形成农村信息经济体系。如果说形成农村信息经济体系的最重要动力是农民的信息需求,那么这一体系形成的关键是创建农民决策——信息机制。因为信息在需求意义上是决策的函数,决策对象的范围越大对信息的需求越大,决策的复杂性程度越高,对信息的需求也越大。历史上形成的农村产权不明,农民缺乏自主性与主动选择权是中国农民组织开放型经济体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一个最大制约因素(P.134),因而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农民自主选择权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作者在书中专就“决策(选择)——信息机制”展开了分析(P.31-36)。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

有两种基本的形式,即U型结构与M型结构,前者为集权决策模式,后者为分权决策模式。不同的决策机制有不同的信息机制与之相联接,在一个集权决策的经济组织中,决策权集中于单一的中央指挥机构,它向低层单位发布指令,同时又向低层单位收集信息,以调整它的指令。可见,与集权决策机制相对应的信息机制是:分散收集、集中管理、集中整理、纵向传输。之所以要分散收集,是因为信息是分散生成的。“由于每一层的决策者需要向上级汇报信息,向下级提供或传导信息,信息传输的节点是决策者,因而信息的整理必然是集中的(对每一层级而言)。纵向传输指信息沟通在向上与向下两个方面的垂直传输。”而“在一个分权决策的经济组织中,全部决策权分散于权力中心及相对独立于权力中心的各个层次中,同时也意味着其决策者不拥有全部信息”。分权决策形成的是一种“信息分散系统”——低层隶属单位可以自主地产生、处理和利用信息,而且不需要与组织内高层交换信息;有些信息(如价格)则只需在低层单位之间进行交换。可见,与分权决策相对应的信息机制是:信息收集、横向传输、分散整理。(P.155-156)

作者还运用有关案例进行分析,农民经济组织的发育受环境信息的影响极大,而适当的信息环境很容易诱致农民以行之有效的方式组织起来。作为政府的职能之一,政府有责任从降低农民的交易成本的角度出发为农民提供公共设施和“信息导航类”公共服务。(P.456)的确,如果不存在资源稀缺、不确定性以及信息不完全,就不会有决策与信息问题。(P.153)为此,我以为,增强农民的自主选择意识和决策行为,激发农民对信息的需求,从而现实地创建农村信息经济体系,这一切都须放到农村资源稀缺结构与使用水平,农民进行国际化经营的不确定性程度、经营信息不完全的环境等较为宏观的背景上进行系统的整体性研究,否则,难以达到农村信息经济战略选择与策略实施的统一。

责任编辑:振 荣

• 哲 学 •

《共产党宣言》与全球化

王锦侠

(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 广东 深圳 518000)

[摘 要] 《共产党宣言》准确地预见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指出了全球化的特点并分析了全球化造成的世界格局; 从全球化的视野阐发了“世界历史”的重要思想。《共产党宣言》为我们把握当前全球化发展趋势提供了理解的钥匙: 全球化按其发展趋势和社会要求来说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 人类实践将最终证明共产主义理想的真理性。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 全球化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图分类号〕A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326 (2001) 03- 0030- 04

在人类历史跨入 21 世纪的时候,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任何一个理论观点都没有像《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这样震撼和改变着世界。而当我们用《共产党宣言》的视野来观察与分析全球化问题时, 所得到的不仅仅是对科学预言准确性的感叹, 而且是给人深刻启示、指引航向的路标。

—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 1848 年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托所作, 1920 年传入中国, 直接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并影响了党的三代领导人和千百万党员。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宣言》用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原则, 因而成为世界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 成为恩格斯所说“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

在世界上,《宣言》首次准确地预见了全球化特

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宣言》指出:“资产阶级,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 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 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 这些工业所加工的, 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 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 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 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 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实际上, 全球化已经历了 3 个发展阶段: 一是从 18 世纪到 19 世纪, 以蒸汽机的使用为代表, 主要表现为西方的工业革命和由此而来世界各国联系的形成, 人类社会第一次打破了各国相互隔绝、不相往来的局面, 是全球化的初级阶段。二是从 20 世纪

初到 80 年代末，随着以电力、内燃机、化工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大飞跃，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产生了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而经过因瓜分世界而产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又产生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两种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互相竞争、互相利用、互相补充，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空前加强，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在人类社会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全球化的中级阶段。三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出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因特网将各国的信息通讯变成了一瞬，紧密的国际金融联系使各国休戚相关，交通的便利使地球成为一个“村落”；而欧洲同盟的形成使国家部分主权和职能让渡于一体化组织成为活生生的现实；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勃兴，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运动挫折宣告了一种模式的失败的同时，又点燃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特别是东方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名义赶上发达国家从而实现全球发展均衡的信念火焰，而这样可能最终会带来真正社会主义在全球的实现。应该说，这是全球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这个阶段属于“现在进行时”，将包括整个 21 世纪。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预见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而且指出了全球化的特点在于由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所主导：“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具体分析了由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所主导的全球化造成的世界格局，即资产阶级“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

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同时精辟地阐述了全球化由经济到政治的发展：“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国家了。”

二

如何看待全球化这一历史现象呢？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提供了一个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并必将为未来历史进一步确证的宏观认识框架，这就是人类历史经由全球化，实现从国别历史、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必经阶段和关键时期。

虽然马克思在其生活的年代还没有遇到像今天这样的全球化问题，也没有形成系统的全球化理论，但他确实从全球的视野阐发了“世界历史”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首次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并在《宣言》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宣言》对于世界历史的分析，独到之处在于不是仅仅停留于某些方面、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而是更注意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研究，从历史观上予以说明：一是从纵向上研究了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将历史发展揭示为从低到高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过程；二是从横向上研究了近代以来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历史的发展概括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终将必然冲破私人资本垄断的狭隘桎梏，导致共产主义，与此相应，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全球化对世界历史形成的作用表现为：在经济上，由分工和交往的扩大而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是民族的、地域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所造成

的世界统一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基本方式。在政治上，由于一系列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得各国不得不联合起来共同治理，“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公共权力日益失去政治性质。在文化上，“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在发展道路上，世界历史的形成不仅不排斥各民族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而且是以后者为前提的，呈现出一元化与多样性的统一。在形成过程上，既表现为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过程，又表现为社会主义逐渐成长壮大并与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既有资本主义世界的多次经济危机，也有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与挫折，它从一开始到整个过程的终结注定是充满矛盾、充满斗争的发展过程，世界历史的形成并不太平。

马克思、恩格斯注重于从整体上把握全球化问题，力求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研究世界历史。他们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从而促使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是生产力自身运动的必然结果，是由生产力发展规律所引出的规律。当生产力发展导致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时，必然形成世界市场，而世界市场则使各个国家和民族连为一体，形成世界历史。在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宣言》对人类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一些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使千百万劳动大众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使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变；而在社会主义力量没有掌权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也迫使资产阶级政权作出重大让步，推行福利国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主义因素在这些国家的生长，为这些国家最终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条件。

三

如何把握当前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呢？如何把握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力量兴衰的规律呢？《宣言》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的钥匙。

《宣言》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解说。《宣言》后的152年间，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走过的弯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可以看到，作为人类科技进步和世界交往扩大和深化的必然产物，全球化在促进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展，自然资源、资金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内的统一配置等方面，都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它将为人类最终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创造条件，全球化正是《宣言》所说的世界性生产和交往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和劳动分工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也是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追逐利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向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在世界范围内新的展开和集中表现。进入全球化时期的资本主义虽然在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实现方式上有所调整和改革，但其根本性质始终不曾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经济交往和文化渗透的手段来维护其在发展中国家侵占的各种利益，巩固“中心—边缘”式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今日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它力图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扩展到全球，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弊端扩散到全球，从而造成种种社会冲突和危机。因此全球化导致双重后果，一方面是全球生产力的大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全球贫富分化的加剧。经济全球化最终也会导致政治文化的全球化，这一方面使得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迅速向全世界传播，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口全球化，竭力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向全球倾销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推行新殖民主义战略。因此，《宣言》的革命结论没有过时，全球化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在某种

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前夜”，它所造成的世界性生产体系、金融体系、知识体系和管理体制，为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社会主义按其制度特征和形成基础、发展的要求和条件来说，与全球化是一致的，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前提下，全球化能够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提供实际的发展条件。全球化按其发展的趋势和社会要求来说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已经开始的全球化进程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不适应全球化的，它的发展最终将打破这种制度，而提出社会主义的制度要求。可以说，全球化尽管目前还是由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所主导的，但是按其本质来说却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它首先产生的是其掘墓人，“反资本主义”是全球化运动的内在逻辑。社会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社会主义已现实地成为全球化的推动力量。全球化对社会主义不只是机遇，而且最后将是资本主义的终结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通过全球化的发展，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将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吸取必要的营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高度的精神文明，从而经过一段时间，成为真正够格的社会主义；而那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的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强大起来，使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全体人民的选择。不可否认，苏东剧变对《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则造成了巨大冲击，这些原则是否仍然有效成为一个亟需回答的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但是实践检验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动态的过程，社会主义一种模式的失败不能证明《宣言》基本原则是错误的。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成功的经验表明，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推行一系列措施，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实现；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暂时繁荣并未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战争的

阴影始终笼罩在人类的头顶，资本主义内部两极分化不断扩大，富国与穷国两极分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全球性的生态环境破坏有可能导致文明灭亡等等，这些问题的尖锐性某些时候可以缓和，但根本解决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人类的实践将最终证明共产主义理想的真理性。

实事求是地说，在全球化趋势中，《共产党宣言》的有关论述也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显得不够充分，必须加以发展；关于共产主义实现途径的论述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是，这丝毫也没有降低《宣言》的理论价值。对于历史发展而言，这种历史局限性本身就极具历史价值。长期以来，由于人们过于强调《宣言》的实践性甚至是实证性，以至把《宣言》视为革命战略的文本。其实，历史发展从来就不是简单的线性进步所能涵盖的，《宣言》的科学性始终是历史的科学性。在《宣言》提供的革命的政治修辞学中，社会公正和平等是核心，社会主义就植根于人类对社会正义和平等的追求。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文献，《宣言》所蕴含的意义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写作时贯彻的主观意图，不仅仅是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所赋予的客观可能，而且是一个有待于立足当下不断进行解读的文献，其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充实、调整和发展。

恩格斯在1894年为在日内瓦出版的周刊《新纪元》题词时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的社会发展前景，正是《宣言》吸引我们不断研究其精髓的地方，也正是我们谈论《宣言》与全球化这个课题的原因所在。

注：全篇所有引文均出自《共产党宣言》

责任编辑：叶金宝

略论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的思想

韩安贵

(中山大学哲学研究所博士、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 在马克思那里, 作为实体的“自然”主要包括自在的自然、感性的自然和人化自然, 其中对感性自然和人化自然的强调是马克思自然观的特质, 因此, 马克思主要是把“自然”放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中进行考察和研究的。我们这里主要从价值的角度研究马克思关于自然与人之间通过实践活动、科学活动和审美活动而表现出来的关系。

[关键词] 马克思 人 自然 价值

[中图分类号] B0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 (2001) 03- 0034- 06

一

在马克思那里, “自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自然”指的是整个物质世界, 它包括人的自然和人以外的自然。狭义的“自然”即是指人以外的自然界。我们在这里主要考察马克思关于狭义“自然”的思想。

首先, 对“自然”的先在性的确认。作为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 他必然确认自然对于人的先在性, 也就是说, 在人出现之前, 在人具有意识之前, 在人把自然当作自己认识和实践的对象之前, 自然就已经自在地存在了。人只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人也只是广袤大自然的一小部分。这一点是一切唯物主义者的理论基石, 当然也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石。

其次, 关于“感性的世界”、“现实的自然”。对先于人而存在的自然或与人的关系过于遥远的自然

(如太阳系甚至银河系以外的宇宙大自然) 进行论证不是马克思的工作重点, 实际上马克思也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论证。马克思关注的焦点是“感性的世界”、“现实的自然”, 这个自然是与人对立的自然界, 是人所面对的并力图用自己的活动加以改造的自然界。因此, 在马克思那里, 自然主要是与人有关的、与人发生关系的自然 (这还不是指人化自然), 也就是说, 马克思着力强调了自然与人的相关性。

自然界在两个意义上为人而存在: 一是在狭隘的意义上, 为人提供“肉体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 一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一以贯之的思想。在《手稿》中, 马克思指出, 一方面, 人把自然界“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 另一方面, 人把自然界“作为人的生命活动

的材料、对象和工具”。^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资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马克思还指出：这两类自然资源在历史上对人的意义各不相同，“在文化初期，这一类自然资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资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②当然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一定的自然资源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上，也就是在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利用的不同水平上，它对人的意义也就不同。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及人类活动能力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自然资源越来越以第二类资源的形式与人、人类活动发生关系。

从这里可以发现，马克思是在人的生存环境、生存条件的意义上研究“自然”的，也就是说只是在人活动的场所、空间的意义上规定“自然”的，那主要就是地球、地表，他分析了作为地球上的自然条件的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的条件，例如空气、水、土壤、阳光以及瀑布、河流、森林、煤炭等等。这种理解当然与马克思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研究不无关系，但更主要的是马克思的理论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绝不会否认太阳系以外、银河系以外宇宙的客观实在性，但要他把自己的研究视野从生活在大地上现实的人转移到那些与人的关系过于遥远的自然界，是绝不可能的。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责备马克思轻视人、不研究人的人是在多大程度上误解了马克思，不了解马克思。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任何时候都没有离开过“人”这个主题，研究现实的人，研究现实的人与现实的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现实的人的活动规律，研究现实的人的命运和前途，可以说是马克思毕生的事业。

再次，关于人化自然。“人化自然”和“与人有

关的自然”不是同一个概念，尽管在现实世界中，与人有关的自然大多都已经是人化了的自然。“与人有关的自然”比“人化自然”的外延更广大，它是指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既包括人化了的自然，也包括那些未经人化，但已经进入人的生活范围，成为人们依赖、认识、审美的对象的自然。“人化自然”则专指那些经过人的对象化活动改造过的自然，是打上了人的活动的烙印的自然。

马克思关于“人化自然”的思想是丰富的。在马克思看来，人们所面对的自然界，主要是人通过劳动创造、占有和再生产的自然界，也就是说是人化了的自然界。“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在抽象直观的意义上谈论自然进行了批评，他写道：“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④

即使在被学者们经常援引来论证马克思关于自然界的先在性的那段话中，联系上下文，可以看出，马克思强调的重点并不是外部的先在性，而是着意于自然的历史性。我们还是把整段文字引在下面：

“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而整个这一点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但是，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此外，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

界。”^⑤这最后一句话中的“不再存在”、“不存在”当然不是指自然界消失了，而是说自然界原有的纯粹自然性消失了，因为它已经过人类活动的改造。

马克思强调人化自然的目的在于强调自然的社会历史性，但却丝毫没有否弃其作为人以外的客观存在的实在性地位。在客观性上，人化自然与原始自然并无区别，它们仍服从于自然规律。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对劳动的规定中看出。马克思写道：“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⑥他还讲，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劳动（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⑦显然，既然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而这种物质变换过程并不因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消失，那就是说，在劳动过程中，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人始终把自然（包括人化自然，而且越来越是人化自然）当作自己的客体对象来看待的。在劳动活动中，自然（人化自然）永远不可能内化为主体或者它永远不可能成为目的本身，它只能是手段，是对象，服从于人的目的。

马克思不仅从劳动过程的进一步发展论述了人化自然的客观性，而且还从劳动的结果的角度说明了这一问题。劳动产品作为人化自然的主要部分，它一定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因素的结合”。在任何产品中除去劳动因素之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⑧进一步讲，凝结在产品中的人类特殊的具体的有用劳动，它实现了自然物质的结构重组，这是人化自然中的积极部分。之所以是积极的，是因为它们是人们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改造、创造出来的，其中融合了人的目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打比方说，费尔巴哈在曼彻斯特只看见一些工厂和机器，而一百年以前在那里只能看见脚踏纺车和织布机；或者，他在罗马的坎帕尼亚只发现一些牧场和沼泽，而在奥古斯都时代在那里只能发现罗马资本家的葡萄园和别

墅。这里的工厂、机器、脚踏纺车、织布机等都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结晶体，是社会生产力的表现。这些物化的生产力相对于新一代人来说，是决定他们的性质的东西，是客观的东西。

总之，人化自然仍然是自然，仍然是客观力量，它是人们价值创造的结果，但对后人来说，其客观性与未经改造的原始自然的客观性毫无二致。所以我们探讨唯物史观的价值向度不能用价值向度取代客观向度，这是我们所一再强调的。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的这一基本观点：人们“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⑨“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⑩

二

前面我们说自然界在两种意义上为人而存在，即在狭隘意义上，它为人的肉体生存提供生活资料，在广泛意义上，它为人的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实际上，人作为人而存在的时候，他从自然直接获得生活资料的量是微小的，甚至可以说，人依靠从自然界直接取得的生活资料从来都没有完全满足过人自身的需要。这是由于无论从需要的量还是就需要的质来说，人的需要都完全不同于动物的需要，人以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动物。这也正是人之所以能够超越于动物，对自然采取积极的对象性活动的内在根源。

人的能动性、超越性和价值性又是何以得到实现的呢？马克思的回答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不是上帝，不是本能，而是积极的创造性活动）。谈论人，就必须谈及人的实践活动，谈及生产劳动。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明确，人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正是这样，马克思就找到了人与自然之间沟通、连结的渠道和纽带。

自然界不是上帝安排来为人而存在的，自然界之为人的存在完全是人通过自己积极的活动争取来的。事实上，在直接的意义上讲自然界与人是对立的，人与自然界也是对立的。“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

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⑪“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完全一样的关系，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⑫这种直接对立实际上也是直接同一，就是说，在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上，人还没有完全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人更主要地以自然存在物的面目出现，人的实践能力还极其微弱，人完全从属于自然力量的支配。

不知经过多少磨难，不知有过多少牺牲，人类的实践能力逐步获得了提高。在生产实践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人开始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他通过劳动而占有自然界，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人开始以积极的姿态傲视自然，把自然界整个地纳入他的活动过程，作为劳动的要素。从这个时候开始，“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多次讲到工业、现代商业等，实际上，在马克思看来，只是到了近代工业阶段，人对自然界的支配作用才突现出来。后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就更加明确了。他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包括人对自然力的控制、利用、占有或驯服等。^⑭他指出，资本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它造成社会成员对自然界的普遍占有，改变了以往人类对自然的崇拜状态，从而把自然的威风打下去了。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⑮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我们可以从两个相反的角度看问题。一是人的生存和活动离不开自然。

自然界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所，自然界是人的活动的舞台，没有自然界，人就只能像幽灵一样在空虚中游荡。自然界还为人的生存和活动提供对象、材料和工具，“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土地是人的“原始的食物仓”，“原始的劳动资料库”。^⑰二是“现实的自然界”同样离不开人和人的活动。离开了人和人的活动，现实的自然界就退回到了原始的自然状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到，没有活劳动，铁会生锈，木会腐烂，不织不编的纱会变成废棉。只有工人的对象性活动，才能够将潜在的可能的使用价值转变为现实的使用价值，把它们从死的变成“活”的。所以马克思赞成威廉·配第的观点，“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⑱

无论从人对自然的关系还是从自然对人的关系来看，在现实中，两者已经难解难分地统一在一起了。这正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的统一。那么，这种统一的基础是什么？通过劳动和在劳动中。也就是人正是通过自身积极的对象化活动使自然界不断地从自为的存在转变为属人的存在。在此，我们必须有必要重申：自然的属人性的确立并没有也不可能否弃自然本身的客观实在性。我们必须在动态中把握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既对立又统一的思想。我说过，马克思所关注的自然或者说进入马克思理论视野中的自然不再是旧唯物主义在主体论意义上所讲的自然，也不是纯粹的原始自然，而是为人的自然，是作为人的生存和生活环境的自然，而且更重要的是作为“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的自然，也就是说，自然本身已经是社会历史性的，它内涵了人类的劳动。这就是说，自然一方面是人类活动的前提、基础，而另一方面又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和产物。客体客观向度和主体价值向度在人类实践活动过程中矛盾地统一起来了。

三

前引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段话提到了“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问题，因此，我们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探讨一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说生产实践是人对自然的实际物质性占有的话，那么，科学就是人对自然的精神性占有。事实上，这两种对自然的占有方式并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因为科学本身也是在生产中产生出来的，科学也是生产的特殊的方式。人要在对自身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界，就要认识自然界，了解自然界以及自然界与人的活动之间的关系。

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对自然界与人的活动之间关系的认识有一个从混沌自发到自觉自为的发展过程。起初，科学与生产是直接混为一体的，人们有效地改造了自然界，但并没有明白其中的机理。只有到了资本主义阶段，作为与“直接劳动相分离”的科学才脱离了个别工人的知识、经验、技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也才开始了人们自觉发展科学、应用科学的阶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势必引起科学和劳动的分离，同时使科学本身被应用到物质生产上去。”^⑮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写道：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又第一次使科学在生产中的大规模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而且，实际上，资本主义已经在生产中大规模地应用自然力、科学和机器了。他还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 and 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⑯

当然，马克思同时也指出，科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之所以得到如此巨大的发展和大规模的应用，完全是从属于资本的欲望和利益的，科学是资本用作致富的手段。而对于广大工人来说则是异己的力量，是排挤工人的力量。所以马克思憧憬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科学活动属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

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 社会的潜力”的活动。^⑰但是，不管怎么说，科学作为人对自然的认识，它必然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作用，并成为生产力取得巨大发展的条件之一，也正是因为科学的发展和应用能实际地成为一种改造自然的力量，因此它也就始终被人用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

即使在马克思所憧憬的共产主义条件下，科学不再服从于直接实践的目的，它也是满足人的“个性和能力发展”的需要。所以当我们追问人们服从自然规律、追求科学的目的是什么时，我们就进入了价值世界，这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

四

最后，我们来考察一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审美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论述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的区别时写道：人还能够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从而“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⑱

在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中，人们的审美需要产生了，人们也就创造了美的对象。当我们说劳动创造了美的时候，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同样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美也是人们的一种对象化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但是，这种对象化活动如同生产实践活动一样也是具体的、历史的，是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的。当人类面对着大自然的淫威而战战兢兢、匍匐膜拜的时候，人与自然之间的审美关系是非常有限的；当人类的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有保障的满足，追求“有用性”还是主要的价值取向的时候，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是不完善的；当人类内部划分为对立的阶级，一部分人的发展是以另一部分人的不发展为代价的时候，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在总体上是畸形的。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

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①

马克思设想，只有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②真正具有了人的眼、人的耳的人的感觉已经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丰富性相适应”，人们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中肯定自己”，也就是说形成了“完整的主体”。这种完整的主体（全面的人）是“从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中产生的创造性的生活表现”。^③这时候，人与自然之间的审美关系才能够完全地确立起来。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

②《资本论》第1卷，第56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页。

⑥《资本论》第1卷，第201—20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⑦⑧《资本论》第1卷，第56、56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2页。

⑪《资本论》第1卷，第20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1—82页。

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131页。

⑭《资本论》第1卷，第56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90页。

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2页。

⑰《资本论》第1卷，第20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⑱《资本论》第1卷，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第489页。

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0—572页。

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14页。

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

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3页。

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125页。

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责任编辑：何蔚荣

论现代哲学本体论范式的转换

——兼谈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理论价值

刘卓红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 本文扼要论述了由于哲学的整体性特征, 现代哲学不是本体论的消解而是本体论范式的转换。关注社会和人并确定实践概念的重要地位, 决定了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具有本体的意义。在当代, 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具有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推进现代哲学本体论研究的重要理论价值。

[关键词] 卢卡奇 本体论 实践 社会存在本体论

〔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326 (2001) 03- 0040- 04

哲学总是把自然、思维、社会的全部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哲学与对象世界的关系上, 哲学不仅以一种整体性的方式认识和研究对象, 而且以一种整体性的形式认识自身。

对象的整体性决定了哲学是问题的体系。它在对问题的认识 and 把握中, 总是通过对部分的认识, 达到哲学总体的理解和回答。哲学的理论体系在不断地发展, 对象与问题的更新又提出了哲学的理解和认识的新形式。哲学的变化历史揭示了哲学的发展就是不断地对新问题的揭示和理解, 以及新哲学

形式对旧哲学形式继承和发展的历程。在人类思想发展的每个阶段, 哲学虽然会出现研究主题的变换和形式的更新, 但却总是在不断地、周而复始地旋转着, 以不失去哲学理论体系的整体性作为依托和基础。

本体论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哲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的最初和基本形态。随着哲学视野中对象的变更和中心的转移, 本体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即出现了本体论消沉而认识论崛起的状况, 这种状况带出了近代哲学观的转变, 认识论

成为近代哲学的研究中心。但这种转变并不等于消解了本体论，在哲学的整个体系中，本体论只是相应地变换着自己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发挥着自身的功能。在现代，本体论从众多的诘难和挑战中重新崛起，无论是科学主义哲学在语言逻辑的框架中重新关注本体存在的表述，还是人本主义哲学以变形的方式承接人类理性对本体论的意向性追求，都进一步地说明了：在当代提出构建科学的哲学体系的设想中，不可回避地又提出了从本体论的角度理解哲学主题的问题。显然，当本体论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哲学界的重点关注时，就意味着哲学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得到展示，哲学思想体系经过自身调整和变革，哲学家对于哲学的性质、特点和功能的又一次反省和确认。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也正是在当代对本体论的重新认识和哲学观念的变革中，对本体论研究的一种新尝试。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唯物主义，首先具有唯物主义的基本属性，但是作为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主题却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它把现实的人类社会作为研究的中心，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实现了对旧唯物主义的突破。这种突破集中表现在对存在概念的理解和认识的转换上。从根本上说，旧哲学确定世界目标是以关于超验存在之本性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为基础的，力图通过研究一种“终极存在”、“初始本原”的世界本体，去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性以及人的本质和行为的依据。然而，它们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变得敌视人了”，^①“抽象的物质”、“抽象的本体”成了一切变化的主体，构成了万物本性和存在的起因。一方面，旧唯物主义认为，世界只是一个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转，而同人的实践没有关系的体系；另一方面，唯心主义从亚里士多德把“存在的存在”规定为“第一哲学的主体”到黑格尔“绝对理性”权威的确定，完成了一次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历史大循环。

马克思眼中的“世界”是“现存世界”、“自己

时代的现实世界”、“人类世界”，他“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②“现存世界”包括自然界，但它不是原生态的自然界，而是“人类学的自然界”。除了自然界以外，现存世界还包括人及有意识的、活生生的人的活动。只有通过人的活动，自然才有可能获得对人而言的现实性，自然界才能构成人们生活中的感性世界，才具有其存在的意义。通过实践，人们不仅改造自然存在，而且自身也进入到自然存在之中，赋予自然存在以新的内涵及其新的尺度——社会性。自然界包括社会的主体性因素，它使人们的眼光在投入现存世界时，看到了人的活动的作用。只要有人的存在，有人的感性劳动的存在，自然界和人类才能彼此相互制约。在人类社会中，自然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才有可能导致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社会的自然和自然的社会，或者说是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马克思把哲学的聚焦点从整个世界转向现存世界，揭示现存世界的存在意义，奠定了研究新唯物主义主题的现实基础。

在人类世界的现实基础之上，马克思揭示了现实的人与人的活动。一方面，现实的人是“有生命的个体”，在社会中，他们彼此之间发生社会关系，由此决定了现实的人是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人的现实性”又决定人总是个性的存在与社会的存在的统一、能动的存在与受动的存在的统一和有生命的存在与无生命的存在的统一的结合体。现实的人首先体现了人的客体性质。另一方面，人与外部世界之间表现的价值关系又强烈地表现着“为我性”，即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这就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和最高表现。

无论是现实的人还是人的现实性，都是通过人的现实活动表现出来。人的现实活动就是实践。实践犹如一个联结器，将自然界与人紧密地结为一体，互为作用；实践还是一个转换器，它将自然转向社会，转化为社会中的恒定因素，使社会成为自然的社会；实践还使现存世界成为一个整体。实践的地

位还揭示了人类世界既不能归结为人的意识，也不能还原为原生态的自然，人类世界只能以实践活动为基础，以具体的人作为出发点，由此构成一个规模巨大、多种层次并存的开放性社会体系。

马克思对实践概念的阐述，揭示了实践是构成社会并使其不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联系人与自然的中介环节，是阐述社会一切问题的源点。马克思对实践的确认，无疑意识到实践内含着社会本体的意义。马克思扬弃了旧唯物主义的宇宙本体的思想，致使唯物主义的本体论从宇宙本体向人类世界本体转化，实现了哲学本体论范式的根本转换。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自身发展的挑战。这集中表现为：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和作用的诘难，忽视从全面、整体的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的学说，忽视实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在教条主义的眼中，主体不见了，客体重新脱离主体，成为历史的唯一巨人，人的主体变得消极、被动，失去了对客体的强烈影响和作用。划去主体、冷落主体性的机械唯物主义倾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题发生偏差，重客体、轻主体，强调客体性、冷落主体性，放弃了坚持以实践的观点分析现实世界，分析人与世界的关系。

卢卡奇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与教条主义的长期斗争中，重新转向马克思的思想，努力恢复马克思以社会实践范畴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的理论传统。然而，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讨经历了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早期他对实践的探索具有明显的向主观唯心主义方面的倾斜和倚重的倾向，显现出理论的两重性；晚期，对早期思想两重性展开自我批评，力图追求与历史唯物主义主题的一致性。试图从存在着手阐述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从本体论上回归并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卢卡奇的鲜明态度和为之奋斗的目标。很明显，卢卡奇建构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原则，是在努力探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过程中结出的理论硕果，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第一，以马克思赋予实践的革命本质为基本线索，重申并确定劳动范畴在实践理论中的基础地位，通过完整揭示劳动的因果性和目的性统一的特征，再现历史唯物主义中富有深刻哲学内涵和意义的实践概念。卢卡奇提出劳动——实践理论，从根本上确定了自然与人的关系，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以一种早期所缺少的唯物主义态度，完成对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的还原。

第二，致力于纠正斯大林哲学忽视主体研究的片面性倾向，着力恢复主体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位置，这是卢卡奇的一贯态度。在展开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研究中，他着重阐述劳动这一主体能动活动的目的性、选择性，并把马克思哲学中的价值思想运用到对劳动的研究之中，劳动具有价值性。卢卡奇自始至终都强调必须在社会历史的研究中加大对主体的关注力度，重视主体，弘扬主体性。

第三，立足唯物主义的立场，运用整体和历史的方法，从寻找社会存在的一般本体论出发，阐述了社会存在的三大类型及其关系。他纠正早期把自然仅仅当作一个社会范畴的错误，不再把自然与社会置于完全对立的地位。他指出，社会存在不仅不能排斥自然存在，而且应当以自然存在为源头和基础，在承认自然存在的基础地位的前提下，论证了三大存在彼此联系、并存和发展的过程，揭示了社会存在的整体特征。

第四，自称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和立场，对马克思的思想作出本体论的阐明。我们知道，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马克思从未做出刻意建立哲学体系的姿态，但马克思把历史、社会和人定为研究的主题，利用经济学探讨了社会的经济关系和各种经济力量的相互联系，并最终将其纳入哲学的范围，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对包含客体性、历史性、主体性、总体性在内的社会存在作了本体的回答。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关于“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结论，

就是本体论的结论。卢卡奇以为，马克思这一结论既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成分，也有辩证唯物主义的内涵，因为，马克思既承认了社会存在的基础地位，同时更承认人的自然与生物的客观性作为低层次的存在形式对社会存在产生的重大影响，从整体的视野确定了社会存在本体论基础，获得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认识。

第五，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和确定一种研究历史、社会与人的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坚持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的基础上，研究主体和客体统一关系的辩证方法。在构建社会存在本体论体系中，卢卡奇克服了早期完全脱离唯物主义，只讲主体性的缺陷，回到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认为只有“在一种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才获得了它的内在必然性，才获得了它的坚实的科学根据”，才能掌握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最终实现了自我的理论超越。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以重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为线索，成为当今调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向，形成新的理论视界整合的突破口。这种发展是建立在把握马克思哲学精神实质上的发展。卢卡奇构建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正是立足于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以坚持其中的基本

主题为立足点，在重新思考和确定理论研究的起点、重点和生长点后，力图结合西方世界的实践特点，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建立在对自我早期仅从主体主义的角度认识社会历史以及对旧唯物主义机械、简单、片面的自然本体论错误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体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统一，体现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上的主客体统一，体现了自然的优先地位，并在此上提倡的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统一的现代本体论。由此可见，一方面，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是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另一方面，以社会存在作为本体展开研究，体现了现代哲学本体论的发展趋势。因此，无论是从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当代形态还是从发展现代哲学本体论的需要来看，探析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原则，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这是当今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现代哲学本体论研究的新的理论生长点。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16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162页。

责任编辑：何蔚荣

论意识的自觉

胡 潇

(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湖南 长沙 410006)

[摘 要] 本文就意识自觉的问题, 从心理机制方面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 论述了意识之自主与自觉的相互联系与有机统一; 说明了意识的自觉能动性不止于认识中的“两个飞跃”, 其最内在的方面应是由意识的自我觉知、自我反思、自我调控、自我设计、自我创造、自我超越所构成的那样一种精神自由; 同时, 还分析了认识活动中意识自觉得以具体表现的在知之知与所知之知及其相互转换的机理, 力求把意识现象的研究推到一个新的深度。

[关键词] 意识自觉 在知之知 所知之知

〔中图分类号〕B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326 (2001) 03- 0044- 05

一

在思想活动中, 意识的自我觉知、自我控制和自我推动, 是人的也是意识的最为内在的自觉能动性。并且, 首先是意识有其自觉即自我觉知, 或对意识自身的自我意识, 而后才有其能动。了解意识的自觉, 是揭示其内在能动性的关键, 也是了解整个思想意识活动内在机理的关键。

荣格在把意识现象作为无意识现象的另一极加以说明时, 有三个值得注意的交待: 一是“直接意识”, 二是“完全个人的”意识, 三是“唯一的经验精神”。这表明了荣格对意识问题的基本观点。在他看来, 意识的活动在内容上是对外在的直接体验。意识活动只存在于脑脊髓系统中, “脑脊髓系统把任何事物都作为一种外在来体验。”^①因而, 意识活动

既具有完全个人的性质, 又是一种纯经验的精神。荣格的这种理解, 表明他无意中流露出了一种由科学研究形成的唯物主义态度, 不回避意识分析中面对的客观事实。但不止如此, 他所言的“直接意识”与“完全个人的性质”, 还内含着意识的自觉与自主的意义, 认为意识活动是一种为主体直接觉知并受个人直接控制的心理活动。当然, 这种“个体意识或自我意识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是很晚的产物, 它的原始形式是纯粹的集体意识。”^②而这种原始的集体意识, 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 是对于 ……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③个体意识之所以成为人类成熟期的现象, 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集体意识的个体化, 而它的前题又是个体在原始

群体中的觉醒，是人我相分过程中而出现的自我意识。荣格以“个体意识或自我意识”的用语形式，暗示了个体意识的发生是伴随自我意识的出现而进行的，离开了自我意识，无论是对主体存在的自我意识或是对意识自身的自我意识，严格意义上的个体意识是无法出现和存在的。而自我意识，则既是意识或思想主体对意识着的主体的自我觉知，又是对主体的意识的自我觉知；既是对在知的自我觉知，又是对所知——思想认识成果的自我觉知。因而包含着自我意识的个体意识，应当是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的统一，是知其在知与知其所知的统一，是意识内容的自在与意识活动的自觉的统一。意识之所以不同于无意识，不在于它们是否反映对象，而在于对这种反映是否意识。意识对于对象的反映和被反映的对象都是意识到了的，是觉态的，因而是精神自我觉知的。无意识对于对象的反映和被反映的对象都是未意识到的，是非觉态的，因而是精神自我无觉知的。所以，意识相对于无意识而言的最显著特征，便是一个大写的“自觉”。意识是思想主体的精神自我对自身与对象的“自觉”与“觉他”。

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念中，意识的自觉总是与“能动”联系在一起，名之曰“意识的自觉能动性”。而这种“能动性”实则为意识的主动性、自主性。意识的自觉，必然导致意识的自主，而意识的自主，一定以意识的自觉为条件。意识的能动性，按照以往的认识论说，主要表现在：一是实现由感性向理性认识的飞跃，意识对感性材料进行思维加工与信息文化编码，从而造成理性具体的思想观念；二是实现由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意识依据对主体自身的需要，及其实现的诸种条件和诸种可能性的掌握，同时依据对客观对象发展趋势及其必然性的预测，对实践活动、过程、方式与结局因而也对实践的改造对象进行观念的创造与设计，形成实践的意识或理想化的对象世界的草图，以指导和推动实践，把认识、理想变成现实。这两种能动性中存在着差异。第二个方面的能动性较之第一个方面更强

烈，它要使意识在思想中超越自我，变成现实的力量。但在第一个方面能动性中，思维的活动多于想象，而在第二个方面的能动性中，想象尤其是创造性表象的想象活动又多于第一个方面的能动性。这是因为意识在第一个能动的飞跃中是要造成思想理念，必须把感性材料抽象化、理性化，变有形的感知为无形的观念。在第二个能动的飞跃中，意识是要造成具体的实践蓝图和客观的实践结局，必须把认识具象化、目标化、理想化、变无形的观念为有形的图式、意象和境界。意识的这种自觉能动性，是无意识活动根本无法实现的。

我们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意识的自主性作为与无意识相比较的一大优势，既含包了上述能动性，又不止于这些能动性，它的内容还有更广泛、更深刻的方面。所谓意识的自主性，顾名思义，就是意识能够主宰自己、控制自己、调动自己、改变自己、超越自己，表现出思想活动的一种极大的精神自由。意识的这种自主性，如前所说的，是建立在意识之自我意识的基础上。意识必须自己觉知自己，自己思想自己，能在自相主客的过程中实现一种自我对话、自我沟通、自我谋划和自我设计，才有意识的自主或自由。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把人的自我意识发展分为欲望、主奴关系和自由等三个环节，这是有道理的。欲望，是意识对主体之自然需要、欲念的觉知；主奴关系，是意识对主体社会关系、社会境况的觉知；自由，则是意识对自身活动的自知。意识只有实现对自身的意识掌握，意识的主体因而意识本身才有了自己的自由。弗洛伊德在他的意识论中，曾把心理结构划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其中，本我是原始的、无意识的结构，由遗传的本能和自然欲望组成，同肉体相联系。自我则是后天形成的前意识结构，随同人体变化而变化，根据外界需要调节外部世界与本我的关系。实际上，这大体相当于意识的“外务”活动及其形成的感性的对象意识，因而弗氏称此为“前意识”，即没有被意识到的意识或没有进入意识的“意识”。超我则是

由后天教育所形成的意识结构，它与有意识的良心、理想等自觉意识相聚类，用来管束自我。总之，在弗氏那里，自我是为本我所激动，为超我所控制的。从中，似乎透出这样一种信息，即只有实现意识的自我意识、自我控制，人的精神自我才能超越自身而进到一种“超我”的自由境界。同时，从另一方面说，意识只有超越了自我，成为超我，才能实现对意识自我的意识与控制。以上表明，我们从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可以找到一种相差无几的共同理念，那就是意识的自觉与自主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意识的自觉既是自主的前提，本身又依赖着意识的自主、内含着自主；而意识的自主，本身也依赖着意识的自觉、内含着自觉。哲学上，总是讲意识的“自觉能动性”，其中暗含着意识的自觉与自主的有机统一。

二

对此，我们如果再深入一步分析，便能更清晰地发现意识之自觉与自主的具体统一。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的“导论”中告诉我们：“意识一方面是关于对象的知识，另一方面是关于自己的知识，它是关于对它而言是真理的那种东西的知识，又是关于它对这种真理的知识的知识”。这表明，意识从来是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对于对象的“在知”意识与“所知”意识的有机统一。在思想认识过程中，意识的自我意识，向意识提供的内部报告，是意识自我的状态，意识之我在进行什么活动，在怎样进行这种活动，如此进行的这些活动达到了何种境界或水平，其困惑与出路何在，等等。总之，是对思想意识活动的“在知”与“所知”之知，包括了马克思所指出的，对“意识如何存在的方式以及某种东西对意识如何存在的方式”的觉知。^④前者主要为对意识的在知之知，后者主要为对意识的所知之知。

思想主体为要实现对意识的在知之知，自然需要运用意识、意志的力量，把全副精力调动到意识当下所进行的思想认识活动中来，并且实现注意力在主、副意识活动之心理位置上的转换。它使思想

认识活动的展开，既不致于因为意识活动的自我意识而放松对外界对象的知识，处于散漫游移状态；也不致于因为集中精力认识对象事物而全然丧失了对这一思想认识活动本身的调控能力。为了实现对意识自我与意识的外间对象的双重意识，主体必须凭借自我意识的方式与力量，调动并适当转移意识的注意力。当主要精力投放在对外间对象事物的思想认识中时，那么，对象的知识——在知意识，则是主意识；而知识的自我意识——在知之知的知识，则是副意识。反过来，原来的副意识内容也可以成为主意识内容。当思想认识过程中“意识如何存在的方式”需要调整和改进时，主体则必须把主意识从外间对象上撤回，而投放到对于知识自身的知识上。这样，原来从属于对对象“在知”的知亦即知识的知我在知，便直接上升为主意识，成为对知识自我的“在知”知识。而原来对外间对象的“在知”知识，则弥散为知识之自我意识的精神参照或知识背景，成为非主要知识“在知”的内容。进而，自我意识的内容结构也就由原来的知我在知演变为知我在知。与此相应，整个意识活动的重心也由原来的我在知物变为我在知我。这中间所实现的知识自觉，进行的思想转移，无疑绝对不能离开知识的自主性。否则，不仅知识无法实现对自身活动的觉知，而且，知识对外间对象事物的在知之注意力也无由集中，无法自我改进在知意识的状态，无法使知识在思想方式、认识方法、心力持久等方面有效地适应主体认识客体时的精神需要。所以，在思想认识的主客体关系中，知识活动之自我意识，它在主体对客体的“在知”与对这一“在知”之知之间的重心迁移和改善，作为思想运演的有效保障，只能是知识之自觉与自主的有机统一。

再说思想意识的所知之知，同样是知识之自觉与自主彼此融汇的产物。知识的所知，就是对对象事物所达到的认知水平与状态。事物处在多种联系中，因而对客体对象的所知也就成为一种须经过多

向度比较才能确定的相对性境界。其中，既有对以往经验、知识的借鉴，又有对对象事物本身的状态、内外联系、诸种属性的观照和比较，还有对对象事物之周围环境、境况逻辑的参验，最后还有关于对象事物的未来趋势和终极结局的可能性追问和价值预估。思想主体必须充分考虑这诸多的参数，才能形成对象事物的某种意识反映或理性识知。关于对象之意识“所知”的这种复杂情况，决定了意识在自我意识中形成“所知”之知，必须发挥意识的高度自觉和高度自主才能实现。“所知”之知，也就是意识自身的知其所知与思其所思，它对自己关于某些事物的了解、掌握和识知，有了清晰的自知。思辨地说，这也就是意识在自我意识中所实现的“了解”的了解，“掌握”的掌握，“认知”的识知，“思想”的思想。意识把关于对象的“所知”在自我意识中作为“在知”的对象，加以反思或再认识，进而形成对“所知”的基本确认或基本理解与基本评价。

思想活动的这种思其所思的进行与完成，首先必须明确自我意识中的主、客体关系，解决谁在知谁的问题。作为对“所知”进行反思再认的自我意识主体，既不能完全是“所知”本身，也不能是与“所知”毫无关涉的局外意识，应是既相关又相异的某种意识。对“所知”进行再认识的意识主体，大致由三种意识综合构成。一是与“所知”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意识，二是涉及“所知”内容各项参数的表象意识，包括记忆表象意识和创造性表象意识；三是形成“所知”之过程的情境意识、当时“在知”活动的意识以及“在知”之知的意识。一句话，它是形成某种认识之过程的全息意识。只有调动这三个方面的意识，思想主体才能从关于对象事物的识知意识中解脱出来，立在与这种意识相对的客位立场上，对对象意识进行旁观反思，达到对它的真正理解与掌握，实现有知的有知，或所知的有知。关于这个问题，不是物理学家而是医生但创立了能量守恒思想的梅耶有一个很好的注释。他在反思这一

思想的形成过程时，这样写道：我不是在写字台上构思这个理论的，而是在1840至1841年随船当医生时，被物理学课题吸引住了。“有些思想火花是当我走在苏腊巴西的路上在我的脑中出现。我立即小心地盯住它们，转而它们又导致新的题目。那段时间已过去……有待考察的是这个真理竟能为我这样一个在物理上如此不精通的人所发现。”^⑤梅耶对于自己所知之知的探求，是由在知意识、在知之知的意识再进到所知的意识及其反思状态的，并且，也正是凭借这些意识内容作为精神自我去进行这一反思的。而意识自我的这种知其所知的反思活动，又总是通过意识的自我“在知”去实现。当意识把关于对象意识转换为意识的对象时，意识便由原来对对象的“在知”变为对对象意识即“所知”的“在知”了。为了实现“所知”之知的深度展开，意识自我还必须走一段像梅耶所陈述的那样一种逆向运行的思路。这就是精神自我要由“所知”这种关于客体对象的结论意识，转换为自思其所知的意识发动者，进入对“所知”实行再认识的“在知”意识位置，追溯以往关于认识客体之活动的“在知”意识，以及对这个认识活动给予自我观察的“在知之知”的意识，即回思认识活动的意识状态以及对这一状态的意识掌握情况，最终才成为“知其所知”或“所知之知”的自知意识。有了这种认识过程的多级反思，主体对思想中的客体意识，才能有深度掌握、深度理解和深度判断，才得以进入思维具体的境界。以上这多次的意识迁移，漫长的反思之路，艰深的自我超越，必然只能在意识高度自觉和自主的条件下完成。所以，意识的活跃与精进，也只能是意识之自觉性与自主性的充分表达。

其次，思想主体必须解决评判对象意识的标准问题，即解决证明思想内容的手段、尺度问题。意识自身的知其所知或所知之知，不仅是思想主体对自己认识活动内容的掌握，更重要的，是要对这种意识内容之是非对错、高下优劣作出一个基本的确证，以决疑惑，定取舍，知其所以，奉其真谛。去

伪存真，确信伏惑的标准，大致有客体相形的参验标准，知识相鉴的史征标准，理性相析的逻辑标准，行为相较的实践标准。自然，实践标准是最为根本的。这些标准的运用，需要意识的高度自觉和自主。因为运用这些标准确证思想认识，一是要求主体能够保持一种努力进取的精神，防止认识的定势心理所造成的思想懈怠。二是要求主体具备明确的目标预期，特别是实践标准的运用更需要有对目标的确认、维持和服从，通过兴趣的激发，情绪的鼓舞，智慧的运作，意志的驱策，排斥外骛，专注如一，去实践预设的目的，达到对思想认识的深度确证。三是要求主体形成合理而娴熟的反思技能，可以游刃有余地运用各种标准对认识作多层次、多角度的检验，并恰当地得出综合的结论；可以心无所累地出入不同的参照系统，对自己的所知进行不同观点的自省与再认识，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还可以虚怀若谷地面对和接纳认识确证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经验，勇于冲破思想的牢笼，敏于捕捉新思想的火花，以“新故相资新其故”的态度刷新自我，超越自我，创造识知过程的新自我，等等。所有这些，无一不是意识自觉性、自主性的生动体现。

当我们就思想意识活动本身的性状，说明意识

的自觉与自主特质之后，还应当不要忘记，意识活动借以展开的各种主观条件，像各类思想工具、语言符号的学习与掌握，各种社会、文化规范的习成与创新，各种理性方法的学习和逻辑操作的进行，各种思想障碍的认识与跨越，各种意识形式的理解与完善，各类信息的吸收与加工，还有各种情商与智商矛盾的体验与解决，等等，都是依赖意识的自觉与自主的力量，才得以实现的。所以，我们不能不在特定意义上说，所谓意识，也就是主体内部世界中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自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与怎样去做什么，同时还能自己决定自己是什么，自己决定自己做什么与怎样去做什么这样一种心理结构、精神体系和主观能力。意识及其活动，永远是精神的自决与自思所构成的心理权谋。

①②《荣格文集》第58、129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③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35、12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⑤转引自梁翠玉主编《智者的路》第17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责任编辑：何蔚荣

情商——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

郭景萍

(广东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320)

[摘 要] 社会学研究情商与心理学研究情商有着不同的视野。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来, 情商是人们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情感能力, 是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情感素质和情感水平。情商包括认知性情商, 道德性情商和审美性情商。情商不仅是情感质量的内在规定性, 而且对情感有着直接的调控作用。情商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愈来愈大。个人有情商, 社会也应具备情商。社会情商就是指社会对其成员情感的合理化调控和管理能力。它具体表现为一套对情感调控的社会机制。社会的“情商力”是维持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的机制。

[关键词] 情感 情商 社会情商 社会学视野

〔中图分类号〕C91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1)03-0049-06

一、情商的社会学阐释

什么是情商? 心理学家们一般认为, 情商是相对于以认知、语言、计算为特征的智商而言的, 它是一种认知和处理情感的能力。如果以沙络维1990年正式提出情商概念为标志的话, 充其量十年的历史, 对情商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 因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应加以拓展和挖掘。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如何理解情商呢? 我们认为, 情商作为一种人类生存和发展智慧, 作为一种高层次的社会智力因素, 是人们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情感能力, 是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情感素质和情感水平。情商不仅是衡量人类智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更重要的是衡量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

人是处于多种关系中的。世界以人为核心衍生

出三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们在处理这些关系时, 既有理性的处理方式, 又有情感的处理方式。人们为了适应自然、社会、他人以及个人的自我感受, 在情感上总要作出一定的反映和调节。情商就是人们处理情感的方式以及对情感的调节能力, 是人们情感质量的内在规定性。智商主要是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领域中发挥作用的, 情商的作用对象主要是人的世界, 是社会界, 因而情商也被称为“人际智能”、“社会智能”; 但同时情商作为一种生态人道主义态度,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表现出与智商一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主张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真正平等的、和谐的关系。改造自然是人的智慧着力点所在, 爱护自然则成了人的情感关注的焦点。

情商具有如下一些主要特点:

第一, 社会历史性。人的情商是受社会历史发

展水平制约的，体现了一种社会历史规定性。在原始的蒙昧时代，人的情感没有任何整饰，是一种冲动的、盲目的非理性情欲，没有道德的限制，也缺乏审美性的令人愉悦的情感表现，是一种素朴的、本能的情感意识，情商处于低水平。情商的水平是随着社会进步逐步提高的。在当今知识和理性时代，人们的情感倾向于科学和理性、自由与平等，情商的发展已达到了现代文明的水平。

第二，社会调适性。社会成员的情感方式及其水平总是受到社会的调节和控制，另一方面，个体成员的情感方式也必须适应社会的要求。人的社会化包括情感的社会化。作为社会成员，必须按照社会的价值标准调整自己的情感，提高自身的情商水平，否则，就会造成社会调适能力衰竭，易与现实社会发生冲突。

第三，民族性。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情感处理方式，因而每个民族的情商都带上了自己的民族特色。民族性“情商”体现的是一种反映民族特色的情感的素质、情感的境界，是一个民族的人格和精神最集中的体现。

第四，价值性。人虽然都有感情，但人和人在感情价值方面的差异却很大。从最一般的角度，可以把情感分为正面情感和负面情感。符合社会法律、道德要求的情感价值为正。违背社会法律、道德要求的情感价值为负。情感的价值不仅有正负之分这种质的规定性，而且还有高低之分这种量的规定性。同是爱国之情，有的人为国家可以奉献生命，有的人最多只不过是一个守法公民。显然，前者的情感价值要高于后者。情商就是衡量情感价值的质量标准，是情感价值水平的直接反映和表现。情商高，意味着情感具有较高的正面价值；情商低，则意味着情感价值低甚至是一种负面的情感。可见，情商已成为对人们情感行为进行社会评价的一种重要价值尺度。

社会学研究情商，与心理学研究情商，有着一些不同的视野。

从情商的起源上，心理学注意情商的生物学基础，认为情商作为人的重要心理现象，是人脑的一种功能，情商表现为大脑对情感的控制和调节作用。社会学则更注重情商发生的社会性起源。如果说情感是人天生就有的，婴儿呱呱落地就会“喜怒哀乐”，但情商则是一种社会性智能，它必须通过后天的教育，并经过社会生活实践的洗礼和磨练才能形成。心理学也强调对情商的培养教育，但心理学主要致力于对个人情商的正规教育和正规培训，注重于一种“情商唤起”的模式，即试图通过一套固有的，规范化的情感观念和情感行为来培养人们的情商能力，在人的内在心理机制方面加以完善，以提高个人对自身情感调节和控制能力。社会学则注重社会环境因素对个人情商的影响作用，通过法律道德的制约、社会舆论的导向、社会风气的熏陶以及社会群体的互动，来促使人们完成情感的社会化，从而达到培养高情商的目的。同时通过社会法律、道德等机制约束和制止不文明的情感，对情感进行合理化的社会调控。

从情感的类别上，心理学着重研究的是认知性情商，即情感中的理性素质和能力，包括情感的自我认知能力和认知他人情感的能力，社会学所研究的情商则不仅包括认知性情商，还包括道德性情商和审美性情商。道德性情商，即人们处理情感的道德素质和能力。情感行为是一种社会道德行为，它集中体现了人的责任感、正义感和人性感。在道德性情商的观点看来，如果一种情感是损人利己的就是恶的，是不符合道德的，因而必须摒弃。感情道德品质的善与恶历来为人们所关注，人们希望惩恶扬善，同时也以善来规范自己的感情生活，以建立和谐纯正的社会人际关系。审美性情商即人们处理情感的审美素质和能力。情感是“人化”的，是经过人修饰而表现出来的。人的情感必须具有一种美的气质，才能为他人、为社会所接受。人的情感，可以由于它是否有益于社会 and 他人，是否有益于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而存在一个美与不美的问题，

都可以而且应该用美的标尺来衡量。情感美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自然美、质朴美、崇高美、真诚美、执着美、奉献美、和谐美，等等。情商中包含的理性、道德和审美因素能提高情感的质量和品位，能把低层次的喜怒哀乐这些人之常情升华为群体乃至全民族的一种高尚的具有文化价值的情感。例如，中国人民对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表现出极大的愤慨，这显然不是一种普通的心理感情，而蕴含着对祖国的挚爱以及为祖国效力的责任感、正义感等理性的、道德的因素。正因为如此，此次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没有仅仅停留在愤怒情感的表露和宣泄上，而是由此升华为一种同仇敌忾的气势和团结奋发的精神。总之，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来，认知性情商、道德性情商、审美性情商构成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情商丛”，也就是说情商的内在构质不是单一的，而是真善美的统一。认知性情商是人们确定情感行为真实性的能力，表达了人们对情感意义的理解和对情感理性标准的认知水平；道德性情商是人们确定情感行为合理性的能力，表达了人们对情感善恶的评价和对情感道德标准的掌握水平；审美性情商是人们确定情感行为有益性的能力，表达了人们对情感美丑的评价和对情感审美标准的掌握水平。

从情商的主体上，心理学注重研究情感的个体自控作用，把情商看作是“个体的”情商。而社会学则更注重研究“社会”的情商。即注重研究社会宏观的调控情感的能力。在社会学看来，自然界有个生态平衡的问题，社会则有个心态平衡的问题。人是社会的主体，而人都是有感情的。因此，社会心态平衡实际上就要落实到人的情感的平衡、人际心态平衡。而情商的实质就是一种平衡情感及人际心态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作为社会的个人应当具备，而且作为管理个人的社会也应当具备。每一个社会都应具备一种调控情感的“情商”能力，才能维持社会的正常发展。这种社会的“情商力”，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机制。社会学

虽然也研究个体的情商，但主要是研究如何从社会的角度促进人们自我调节情感的健康发展。由于心理学和社会学对情商主体的规定不同，决定了两者的对情商作用的对象也存在不同看法。心理学关心的是情商对个体成功的作用，而社会学关心的是情商对社会和自然的作用以及社会对个人情商的作用。总之，社会学研究情商的重点在于其社会性、宏观性，坚持把情商作为社会结构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基本要素来探讨，这就决定了社会学探讨“情商”的新视野。

二、情商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

我们的时代已进入一个被称为后现代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以知识为源，以科技为本。另一方面，现时代又被视为一种“情感化”的时代，情商的价值被现代人所推崇和加以运用。这表明，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形成，在要求人们具有高智商的同时，也要求具有高情商。1982年，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他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一书中，提出了高技术必然需要高情感来平衡的著名论断，并作为信息社会的根本特征。在这里我们不妨对奈斯比特的论断作个补充，即高技术不仅需要高情感，更重要的需要高情商，也就是说，在高科技时代，与其说人们祈求更多的情感交流，有着更多的情感需要，不如说，高技术需要人们具备高素质的情感能力和处理情感的艺术，这就是高情商。这是因为：

其一，高情感需要高情商。如前所述，情商作为情感的内在素质和能力，决定着情感行为的倾向性及其水平的高低，情感则是情商的外在显现。内在的东西必然要表现为外在的东西，外在的东西又必然有内在的东西作依据。高尚的情感（如待人宽容，与人平等）无疑是人的内在的较高的情感素质的自然流露，粗俗的情感则显然是人之内在的较低的情商素质的无意表白。可见情感是受情商决定的。当今科学技术的进步，征服自然的结果，给人们带来了从未有过的财富和富足，人们已由物质需求的

满足转向对精神性的情感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因此文化科技的发展并不导致情感的减弱、热情的枯竭,恰恰相反,文明人在情感上越来越细腻,要求越来越高。这种高情感需要高情商来驾驭。

其二,高创造力需要高情商。知识经济是创新经济,具备创造力是现代人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然而,创造力是不能没情商支持的。马斯洛指出,创造包含有大量平凡乏味的艰苦工作,因而也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泄气、沮丧、孤独感、厌烦担心等负面情绪。只有越过这些情感障碍,才能最终取得创造的成果。高情商者总能保持兴趣盎然的情绪状态,或能有效地摆脱消极情绪的困扰,他们因此更有可能取得突出的成就,高智力要转化为高创造力,高情商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中介。而在一个民族当中,具有高情商的人越多,那么社会的发展动力就越强,因为具备勇于和善于创造和革新的勇气,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能量和动力结构。

其三,高竞争力需要高情商。现代社会是竞争社会,竞争需要实力。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一个群体(如民族、组织等)而言,具备高情商是在竞争中取胜的重要保证。就一个民族来看,高情商是一个民族具有生机和活力的象征,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能力。它体现为一个民族的自尊、自信、自强并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奋发感,体现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维持公正与平等的正义感,而这些情感素质都足以构成一个民族的强大实力所在。从现代社会发展趋势来看,一个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人的素质,其中包括人的智商因素和情商因素。

情商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谋求进步的社会运动的兴起而日益重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技术、经济突飞猛进的背后,是现代人情感的失衡和危机的加深。情商的匮乏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毋庸置疑,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空间的形成,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超大范围、远距离的沟通条

件,人们有可能进行一种广泛的网络化的交往。但很多学者指出,这种交往是冷冰冰的,无异于“柏拉图式”的交往。人类是需要感情交流的,这种交流需要面对面、手拉手来进行,而这是“信息高速公路”所力不从心的。由高技术造成孤独感便由此产生。受孤独感或隔离感的困扰,现代人无法满足一种归属感和责任感等健康的社会情感生活,他们反而更易于离经叛道和接受颓废、腐朽的情感发泄方式。

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人们被灯红酒绿、莺歌燕舞所包围,沉溺于各种享受之中,逐渐丧失了斗志和毅力。在这种情况下,则更容易受到来自一些有害身心健康的诱惑。如容易受到酗酒和嗜用麻醉毒品的诱惑,或者可能形成诸如残忍、冷漠或抑郁之类有害的情感状态。另一方面,现代工业社会技术统治所带来的压抑,市场竞争中的不测风云,高效率下的超常节奏,使人们经常处于烦闷、焦虑、彷徨、畏惧的情感体验之中。这使人们的情感智商处于一种低层次和扭曲的状态。

情感方面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情感愈来愈受到工具理性的统治。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是一切行为都单纯以工具一目的社会合理性为取向,人们使用精密的理性计算技术把社会上的一切都变成了自己赢利的工具,然而最终也使自己异化为“理性”的工具,把人们变成了“没有精神的专家,不懂情感的享乐者”(韦伯语)。由于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功利化,导致社会凝聚力的削弱,其结果是人际关系的疏离、淡漠乃至紧张、冲突。人际交往的这种异化现象已越来越为现代思想家所关注,如哈贝马斯便提出要克服片面定义上的工具——目的合理性,提倡一种有情感的“交往的合理性”。

在情商普遍匮乏的背后是来自于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操纵。现代西方社会自我中心价值取向的大力提倡、享乐主义口号的喧嚣,使得个人私欲膨胀,人们只关心自己,视他人为“地狱”。在这种情况

下，人们一方面放纵自己的情欲，扩张自己的私欲，另一面对他人缺乏关怀、同情心。情商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

上述分析表明，如何适应当代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发展一种合理的健康的“情商”，不仅是当代每个人所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而且也是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社会情商与情感的社会调控

个人有情商，社会也有情商。社会的情商就是指社会对其成员情感的合理化调控和管理能力，它具体表现为一套对情感调控的社会机制。在对情感的调节上，社会情商表现出与个人情商不同的特点：(1) 集体性，社会情商是以社会的名义和整体的理性能力来实施对情感的调控。(2) 外在性，社会情商是从外部对人们的情感行为施加的影响力量，因而属于外在的社会调控机制；个人情商则是人们自觉地运用社会规范来指导、约束、检点自己的情感行为，属于一种内在的心理调控机制。(3) 广泛性，社会情商着眼于社会与自然、社会与个人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协调；而个人情商的协调作用仅限于个人人际关系的协调。社会情商与个人情商又是有联系的，社会情商是一定时代一定民族或国家对情感调控能力的集中体现，个人必须要遵循社会的情商规则，因此，个人的情商水平和情商能力归根结底是受社会情商制约的。另一方面，社会情商必须通过个人情商才能起作用，外在的社会调控机制必须转化为内在的个人调控机制才能运转起来。衡量一个社会“情商”水平的高低，有如下一些重要指标：(1) 社会中人们相互联系、相互和谐的程度；(2) 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3) 社会的有序性；(4) 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平等性；(5) 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①

“社会情商”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以下两点基本假设：其一，对“情感”必须从社会的角度给予调控；其二，对情感的社会调控必须是合理的。

社会发展有两条感情线，一条是人们愈来愈看

重情感，情感在社会中的作用愈来愈大；另一条线则是社会的情感问题愈来愈突出，愈来愈需要社会和个人合理化调控。“情商”便是人们调控情感的能力。但是，我们认为个人的情商对情感的调控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指出了个人自制与社会控制的区别。他认为，尽管人们有时候也能够抑制自己的意向、习惯、性情等等，“但是这种自己强制的行为不同于那种外来的社会强制。个人自己抑制自己的行为是离散的，归于个人的，好比物理学上的离心力，社会强制则是聚合的，归于集体的，好比物理学上的向心力”。^②因此，正如社会控制要高于个人自制一样，对情感也必须从社会的角度加以调控。然而，过去对情商的研究仅仅是以个人为主体的，是个人对情感的调节。在这种观点看来，个人的情感要靠个人自己的理智来加以控制，如果社会每个人都能具有良好的“情商”，那么，社会人际关系就会处于和谐之中。但是，在“情商”上的这种假设是难以成立的，这是因为：(1) 每个个体都是情感和理智的统一体，一般来说，理智对情感有调节作用，但就二者在人身上占的比例及作用来看，情感高于理智，二者的比例就等于一把斧子和一颗谷子（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语）；(2) 情感的调节不是一个单纯的理性问题，它往往受到利益的驱使，因此，即使对一个具有“情商”的人来说，当他的利益受到损害时，这时在他身上，往往也会情欲压倒“情商”，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来；(3) “情商”对个人而言，是一种素质要求，而这种素质并非人人都能具备。从社会整体来说，总有一部分人缺乏“情商”，因而就整个社会生活而言，情感调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显然，从个人的角度来探讨情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社会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是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之上的。情感往往受个人利益和需要的驱使和左右，而公共利益原则则要求以社会理性为基础。社会情商就是一种超出个体之上的理性的能量。它能够弥补个体调控情感时的不足和乏力，避免或减少个体与个体

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可能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从而维护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要提高社会情商水平，就必须建立合理的社会情感调控机制。社会调控情感需要采用各种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社会理性调控，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一个是科学知识方面。社会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总的价值体系，对人们的情感价值起着定向功能。社会通过意识形态手段，鼓励和促进符合该社会价值规范的情感生活，而批评和阻止各种反社会的或消极腐败性的情感生活。科学知识对情感的理性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就拿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在科学知识的限制、规范作用下，使人对自然的要求变得具体而合理，从而促进人们按照自然规律而不是出于情欲的需要来改造自然，从而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的关系。

（二）社会法律和道德调控，这是刚柔相济的两种调节情感的手段，法律偏于刚性，道德偏于柔性。在人与人的情感行为和情感关系中，人容易违反法律和道德，这与情感的特点有关。情感往往被看作是私人的，自由的，因而可随心所欲。情感有其自发性、冲动性、盲目性、从众性等特点。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情感也有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并非任何情感都是正当的、高尚的，都能符合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要求。因此，借助于法律、道德的力量给予情感以合理的调控显得十分重要。

（三）社会文化调控，即为健康文明情感的形成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社会风气。情商的培养与智商的培养不同，知识技能的掌握可以从外面直接灌输，由外力强化训练。而情商的培养则是一个缓慢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情感是发自主体内在需要的体验和升华，一种情感方式的形成，是情感主体逐渐地感知外在环境逐步形成的。尤其像仁爱、宽容、

信义、关怀、人道这类高层次的“情商”指数，必须要有良好的社会风气来熏陶，要有良好的人文环境来引导。社会文化环境愈完善，愈先进，情感的文化意蕴（即所包含的理性、道德、审美性因素）就愈丰厚，情商水平就愈高。

（四）社会团体调控，社会团体具有满足人们情感需要的功能。个人在团体中没有孤独感，能得到友谊和支持，并获得自尊，增强信心，这些方面无疑对人们健康情感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社会团体还是陶冶情操的重要课堂。像社区、家庭的精神文明状况就直接影响着人的情感的发展水平，是促使个人完成情感社会化的重要因素。社会团体特别是非正式团体还是社会情绪渲泄的渠道，对于维护社会的有序运转和安定团结起着“安全阀”的作用。

社会调控情感机制的形式不但多种多样，而且是变化发展的。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阶级社会有着不同的社会情感调控机制的形式。社会对情感制约和控制的性质、向度及其力度，从某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的性质和状况以及社会文明的发展水平。因此，社会情商同样有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之分，不同的社会以及同一社会的不同阶段，情商也会表现出不同的水平。

①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提出用来考察“社会形态”的两个概念。社会容量指社会团结在一起的数目；社会密度则反映了群众的集合程度。笔者认为，这两个概念反映了以情感为纽带所形成的社会向心力和凝聚力，因而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情商”水平的两个指标。

②《社会学方法的规则》，第83页，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版。

责任编辑：何蔚荣

•新世纪中国发展与执政党建设•

论江泽民关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维

肖继文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教授,江西 南昌 330003)

[摘 要] 现代化是我国面临的最大实践,也是需要在战略上作出正确思考的富有魅力的理论课题。江泽民同志坚持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因应时代的发展,提出系统完整的战略思维。在内涵上,予以全面把握,赋予新的内容;在战略发展目标上,从我国实际出发,提出了具体明确的时间和目标任务要求;在战略政策选择上,把领导现代化的注意力集中于科学决策和政策的制定;在领导保证上,提出关键取决于党和“三个代表”的思想,强调首先要搞好执政党自身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 江泽民 基本实现现代化 战略思维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1)03-0055-07

一、全面把握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现代化是指在科技和产业革命推动下,由工业化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的过程。对于现代化这一基本内涵,江泽民同志非常重视予以全面把握。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随着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丰富,他不断地把现代化的实践与时代发展统一起来,赋予现代化更丰富的内涵,使现代化由实现“四个现代化”发展为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生态化、民主化、法制化、文明化等内容。

(一) 强调现代化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党的十三大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

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就指明了我国现代化的内容不仅是经济现代化,还包括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江泽民同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十四大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思想,进一步指明现代化的内容是全面的,是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全面现代化,并在以后的有关报告和讲话中,对现代化的内容作了全面阐述。

第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现代化。江泽民同志指出,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中心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①使我

国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现代化。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重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指出，“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这都属于政治现代化的内容，江泽民同志非常强调政治的现代化。

第三，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文化现代化。根据邓小平关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都要硬的思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精神文明建设同实现现代化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江泽民同志在此次全会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二）对原有现代化的提法进行了调整，使现代化的内涵更为确切。党的十三大关于经济领域现代化的提法是：实现“工业化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党的十五大根据新的情况对现代化的提法作了修改，这就是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所指出的，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之所以作如此调整，这是因为：

第一，把“生产”现代化改为“经济”现代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生产是一种经济活动，内含在经济范畴中，因此经济比生产具有更广泛的内涵，我们的现代化不仅要使生产现代化，而且要使整个国民经济都现代化。原来提出的“生产”现代化则远远不够，必须把“生产”现代化调整为“经济”现代化。

第二，把“商品化”改为“市场化”，是同经济现代化相适应的。“商品化”是生产现代化的要求和不可逾越的阶段，原来提出“商品化”显然是生产现代化的需要。但是，我们的现代化必须是经济现代化，因此，与之相适应的应是社会化、市场化、

现代化。这样，把“商品化”改为“市场化”则是顺理成章的事。同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②只有经济市场化，才能最终实现经济现代化。

（三）把信息化、国际化、生态化纳入现代化之中，为现代化增添了新的内容。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现代化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发展。一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派生出许多新的内容，二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涌现出许多新的提法。江泽民同志通过对现代化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及时提出了信息化、国际化、生态化等问题，使现代化的内涵更为丰富。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信息化浪潮汹涌澎湃。在此背景下，江泽民同志强调要重视信息化，指出：“四个现代化，哪一化也离不开信息化。”^③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要“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江泽民同志精辟地阐述了信息在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充分说明信息化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国际化热潮，使各国的发展都同国际化有着紧密联系。江泽民同志密切注视这一发展趋势，用世界眼光思考中国现代化问题，强调要重视国际化。他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在十五大精神指引下，我国积极争取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我国现代化将进一步融入经济国际化的热潮。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非常强调总结吸收传统工业化的历史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把生态化列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传统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自然资源日益稀缺、环境破坏、生态失衡，从而使经济发展难以持续。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阐述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问题。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加强环境污

染的治理，植树种草，搞好水土保持，防止荒漠化，改善生态环境。”从而突出了生态化在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

（四）凸现城市化的内容，将现代化推向新的发展点。改革开放 20 多年，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国已经基本告别了短缺经济，迎来了买方市场，今后的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强劲持久的需求推动。实现城市化，是增加国内需求的重要途径，因此，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是我国现代化新的发展点。但是，长期以来我们重工业化，轻城市化，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造成我国国内需求的扩大受到二元经济结构的严重阻碍。城市化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从两个方面提出了城市建设问题。一是阐述了城市的地位和作用，他说：“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发展各具特色的经济，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进一步引导形成跨地区的经济区域和重点产业带。”二是强调“搞好小城镇规划建设”。这时，虽然还没有明确使用“城市化”的概念，但是已经明显地表达了城市化的思想。

1998 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建设小城镇问题作了明确阐述，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有利于乡镇企业相对集中，更大规模地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并且强调“要制定和完善小城镇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小城镇要合理布局，科学规划，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这实际上是城市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城市化的艰巨任务。全会的这一重大部署，可望大大促进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二、从实际出发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

现代化的重点问题有两个：一是现代化的观念问题，包括现代化的理念、内涵和内容；一是现代

化的战略选择问题，包括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政策的选择。江泽民同志不仅重视引导我们转变观念，增强现代化的意识，而且重视对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在确立什么样的战略目标这个问题上，始终坚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提出切合实际的战略目标要求。

江泽民同志主要是从时间要求和具体目标要求这两个方面来考虑的。

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要求来看。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展望 21 世纪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前景时说：“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明确提出了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要求。对于这一要求的基本理解是：

第一，这是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吻合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为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时期。基本实现现代化既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束，也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这是一个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的时间。比起资本主义先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用了二三百年的时间实现现代化相比，也要短得多。但也不同于 60 年代曾提出的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间要求，更不同于 50 年代提出的要在 15 年内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而是要 100 年时间。

第三，这个时间要求是根据我国的国情和能够保持的年均增长速度科学计算出来的。只要使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我们就可以在现有人均 1000 美元的基础上，再用 50 年时间，使 GDP 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求来看。江泽民同志关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不是抽象的，而是一个具有特定内容的概念。根据江泽民同志在

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任务，这一要求可以归纳为十个方面：(1) 经济上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现代化；(2) 完成工业化，由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工业国”；(3) 实现市场化，“经济市场化的程度较高”；(4) 实现城市化，“非农业人口占多数”；(5) “科技教育比较发达”；(6) “全体人民比较富裕”；(7) 逐步缩小地区差距；(8) 建立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9) 精神文明得到充分发展，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普遍提高；(10) 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江泽民同志关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具有以下明显的特征：

第一，形成了综合性的现代化目标体系。这个目标体系从满足人民群众的全面需要出发，由三个大系统和若干子系统构成。第一个大系统是经济发展，包含若干子系统；第二个大系统是社会进步，包含若干子系统；第三个大系统是人的素质和生活水平，包含若干子系统。

第二，具有国际可比性。现代化有客观标准，江泽民同志所列的各个评价项目是同国际接轨的，如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等，符合国际现代化的标准，经得起实践检验。

第三，现代化的水平是基本的、初步的。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有一个实现过程，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现代化所要达到的水平和实现的程度会有所不同。我国到 21 世纪中叶还只能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水平，它有待于进一步发展、扩大和提高。

第四，充分体现着我国的国情。我国的现代化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性，而且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呈现刚性等，在这样一个大国搞现代化，其任务是复杂的，艰巨的，具有显著的民族特点。

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上，江泽民同志还对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作出了更具体的部署。早在 1992 年邓小平谈到我国实现现代化目标时曾经说过：“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④江泽民同志遵循邓小平这一思想，在十五大报告中，把我国新世纪全面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划分为三个时期的具体目标，从而对进一步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提出了更高、更新、更具体的要求。

第一个时期，即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目标。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努力实现‘九五’计划和二〇一〇年远景目标，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具体来说，就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〇〇〇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第二个时期，即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目标。江泽民同志说：“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这就是说，东部发达地区继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后，其它更多地区也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的各项制度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也将更加定型化”。^⑤

第三个时期，也就是到新世纪中叶的最后三十年的目标。江泽民同志比较原则地提出了这个时期的目标要求，即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含了国民生产总值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再翻一番，人均 GDP 这一标准值可达到 9000 美元，人民生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三、注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政策选

择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同时，还非常重视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政策选择，把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注意力放在战略决策和政策的制定上，坚持通过正确的战略政策选择，实现对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领导。

战略政策选择，是一项复杂的领导工程。江泽民同志在领导实施这项工程时，主要是依据我国的国情、变化了的形势以及现代化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的。(1) 我国是后发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建设怎么搞，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史上的新课题，对于战略政策的制定、调整和运用，必须充分考虑这一国情，“一切要从实际出发”，^⑥“不照搬外国模式。”^⑦但同时，又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⑧(2) 我国目前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由通货膨胀转向通货紧缩，已经形成了买方市场。在这种形势下，依赖原来的总量扩张拉动经济增长已经不可能了，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应通过战略政策选择，引导人们在新的经济活动中去寻找。(3) 现代化呈现非均衡发展的态势，有的地区发展比较快，有的地区仍然比较落后；有的领域有长足发展，有的领域严重滞后；有的行业比较先进，有的行业停止不前。为此，我们的战略政策选择必须有利于促进全国性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缩小存在的差距。(4) 世界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机遇，同时又使我国现代化面临继续改善资源配置和提高生产力的挑战。因此，我们要通过战略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寻找对策，做到兴利除弊。

基于上述情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主要进行了以下基本战略政策选择。

1. 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战略。一方面坚持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采取有选择性的宏观

调控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以拉动转型后的经济增长。

2. 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结构性转移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最困难的问题。为了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调整”，要求通过结构性调整，捕捉新的发展机会，保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质量。一要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应通过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两大战略性调整，使大多数大中型国有企业初步解困。二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我国产业结构的层次比较低，离现代化的目标有较大的距离，必须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三要调整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进行转移和调整，我国农业人口转移、就业结构的改变严重滞后，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应运用人口政策和就业政策，加快对这方面问题的解决。四要完善分配结构，“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

3. 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基础”，为了解决科学教育还不适应现代化需要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问题，一是要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二是要从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制订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大力发展科学教育。三是深化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促进科技、教育同国民经济的结合。关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必须做到：第一，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二，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提高资源利用率。第三，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

4. 东西部协调发展战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及十五大以后，在西北地区、广东省等地视察时，提出了推进东部地区的现代化与加快西部地区

开发的思想。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作出的面向新世纪、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战略决策。首先是东部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在推进改革开放中实现高水平的发展，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如江泽民同志要求广东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基本前提条件，没有东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就不可能进行西部大开发，也就不可能在全国实现现代化。其次，实施西部大开发，要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国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支持力度；进一步发展东部地区同中西部地区多种形式的联合和合作。西部大开发是中国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全国要从大局出发，支持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

5. 依法治国方略。江泽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⑤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第一，要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第二，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第三，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第四，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

6. 文化发展战略。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剧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互相激荡，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提出了文化发展的战略思想。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文化上要积极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技术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

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四、关键是搞好执政党自身的现代化建设

江泽民同志在视察广东高州的讲话中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讲话，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邓小平建党思想和现代化建设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不仅强调了党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而且提出了党的现代化的重要思想，为我们党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搞好自身现代化建设、发挥核心领导作用指明了方向。

（一）党的领导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清楚地阐明了这一思想，指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实现这次大会确定的任务，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江泽民同志在视察广东高州的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明确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江泽民同志认为，党在现代化建设中的这种历史地位和作用不是自封的，而是由“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决定的，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形成的。”^⑥从历史和实现情况来看，在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像我们党这样集中了那么多先进分子，组织得那么严密和广泛，为中华民族作出了那么多牺牲，同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前进中善于总结经验、郑重对待自己的失误，以形成并坚持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所以，江泽民同志指出：“历史把重大责任赋予我们党，人民对我们党寄予厚望。党领导人民在二十世纪写下了光辉篇章，也一定能在二十一世纪写下新的光辉篇章。”^⑦这就是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只要坚持党的领导，就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二）实现党的现代化才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何谓“党的现代化”，江泽民同志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在他的重要报告和许多重要讲话中表达了

这方面的思想。根据江泽民同志的报告和讲话精神，可以使清楚地认识到，所谓党的现代化，就是党的思想现代化、作风现代化、组织现代化，就是要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党的“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大的战斗力，带领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

现代化建设跨入新世纪的新形势下，提出党的现代化问题，不是偶然的，在江泽民同志的思想中至少表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缘由：

第一，党的现代化是党的建设发展的必然趋向。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有一个重要原理，就是“党在发展”。这实际上提出了党的现代化问题，即党的发展的辩证法问题，其基本精神在于：党既要坚持自己的根本性质、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又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结合新的任务，以改革的精神建设党，不断提高自己，完善自己。

第二，党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全面现代化思想，即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政党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核心地位，因此，政治现代化，包含了党的现代化；党的现代化则属于政治现代化的范畴。可以想象，如果党不实现现代化，就要影响政治现代化，政治不能现代化，我们国家就不能全面实现现代化，那样，现代化就将是残缺不全的。毋庸置疑，党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第三，党的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在中国非常艰巨，中国共

产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其自身必须走向现代化，只有具备领导现代事业所需要的思想理论素质、政治素质、文化科学素质以及决策能力、驾驭能力、拒腐防变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党才能不负历史重任，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现代化事业走向成功。

(三)“三个代表”的思想体现了党的现代化的要求。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中国，围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开创了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今天，在跨世纪的新形势下，党面临实现现代化的艰巨任务，如何继续推进这个新的伟大工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回答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指明了党的自身要实现现代化以及怎样搞好党的现代化建设的方向，适应了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新形势。

①②⑨⑩⑪《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5、25、32、46、46页。

③《中国科技论坛》1991年第1期。

④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372页。

⑥⑧《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⑦《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2页。

责任编辑：叶金宝

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现代化理论的新贡献

刘 琳

(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副教授, 广东 深圳 518021)

[摘 要]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 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等现代化方略, 为中国现代化理论作出了新贡献。

[关键词] 第三代领导集体 现代化 中国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 (2001) 03- 0062- 05

现代化是自 1840 年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契机, 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从此, 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共同进行了长期的艰辛的探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站在历史和时代的交汇点上,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开拓进取, 不懈探索, 结合新的实践深入研究, 以跨世纪的思维创新, 带来了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战略的较大飞跃, 从而以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

第一, 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市场经济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

从 1979 年到 1992 年间, 邓小平同志曾先后 12 次论及市场经济问题, 特别是在 1992 年春, 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时指出: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论断, 石破天惊地打破了人们原有的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传统观念, 使人耳目一新。这不仅极大的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同时也为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找到了正确的答案, 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但是, 明确地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却是党的第

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我国人民深入进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提出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伟大目标，并初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的讲话中，依据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这个目标的提出，集中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从而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指南。随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确定的目标、要求和原则等加以系统化、具体化，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成为建立新经济体制的工程化蓝图，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突出贡献。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的新论断，同时作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部署，这些战略部署，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问题，它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个重大的社会变革结合在一起，以市场经济为体制动力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实现，从而大大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第二，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以依法治国方略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总结“文化大革命”及其之前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同

志强调“发展民主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他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高瞻远瞩地作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著名论断，同时，他特别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问题。1989年，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指出：“民主和法制建设要抓紧进行。”同年9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指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任务，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把“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作为全党“必须努力实现的十个方面关系全局的主要任务”之一。到了党的十五大，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又有了新的飞跃性认识。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越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充分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表明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利，已经进一步被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表明我们党的执政方式和国家的治理方式正在从原有的“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转变；标志着我们正在向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迈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史上一座崭新的里

程碑，充分体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思维和理念上的日益成熟，必将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三，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任务，以精神文明建设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

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强调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提出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我们党工作重点之一，并把它看成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为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了巨大努力，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增添新的理论内容，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还专门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这一决议是新时期我党指导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标志着我国精神文明建设跃上新的台阶。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依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论断。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问题，早在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系统地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问题。后来，他多次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在党的十五大上，他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论断，强调文化既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江泽民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

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依托，我国的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一定会进一步加快。

第四，以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为基础，把促进中国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总体考虑之中。

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三个方面，三位一体，不可偏废。据此，党的十三大首次明确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目标，这个提法一直沿用到十五大。“富强”主要体现为经济现代化的要求；“民主”主要体现为政治现代化的要求；“文明”主要体现为文化现代化的要求，主要是指精神文明。这三个方面的现代化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在动态发展中共同促进现代化总目标的实现。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为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总目标，从90年代一开始，就突出强调了社会全面发展问题。江泽民指出：“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项事业，是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的事业，不但经济要上去，人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秩序、社会风气都要搞好。”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要求出发，党和国家在制定现代化建设的大政方针时充分体现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1994年10月，我国制定并公布《中国社会发展规划》，向全世界郑重作出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快社会全面发展的承诺。1995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

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突出强调要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要十分重视并妥善解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相互协调发展，并提出了“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积极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的社会发展总要求。接着，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再次确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事业。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又一次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以上一系列的重大决策和举措，深刻反映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发展全局的驾驭能力，表明党中央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富有时代精神的新飞跃。

第五，准确把握知识经济发展的脉络，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以知识创新为动力加速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进程。

邓小平同志早在1978年就有了这样的预见：“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时隔八年，他又进一步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科教兴国的思想逐渐被重视和丰富起来。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1991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在中国科协四大上发表讲话，指出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1992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颁布了我国的中长期科技发展的纲领。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被明确提出。在党的

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全面清楚地阐述了科教兴国的主要内容，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十五大报告同时还指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早在1994年3月我国政府制定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便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今后的发展将不只是经济的发展，而是要走一条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新路。1995年9月，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一起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为推动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当今世界，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使用了知识经济的概念。同年6月1日，在接见出席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部分代表的讲话中，江泽民再次论述了知识经济问题，指出：“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知识不断创新，高新技术不断产业化。”江泽民希望两院院士和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创新精神，加快建立当代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全面增强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此后不久，在江泽民同志的亲自过问下，我国首项《知识创新工程》开始启动。

以科技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增长才是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才是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经济增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准确把握知识经济发展脉络，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着手研究中国的创新体系。以知识创新为动力，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将驶入快车道。

第六，正确把握世纪之交的国际战略形势，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使我国在比较长的和平时期集中

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

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分析国际形势重大变化的基础上，以战略家的胆识和气概，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明确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它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他又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说发展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科学论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工作重点实现了战略转移，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并指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

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1999年，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与前几年相比，1999年的国际形势确实比较严峻，突出表现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军事干涉主义有新的发展，经济殖民主义有新的发展。面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这种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冷静观察、沉着应付，正确把握世纪之交的国际战略形势，作出了“机遇大于挑战”的准确判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为，当前国际战略形势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这个大趋势并没有改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并没有逆转，我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和周边安全环境仍是机遇大于挑战，希望多于困难。正确把握世纪之交这一世界大势和世界格局，可使我国在比较长的和平时期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努力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让我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责任编辑：叶金宝

•历史学•

南京政府十年的政企关系考察^①

涂华奇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089)

[摘要] 本文认为政企关系是理解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问题。文章构筑了一个分析政府与民营企业关系的框架, 从市场环境、国家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关系、产权保护、政治参与四个方面具体讨论南京政府十年的政企关系。通过考察说明, 南京政府的主导性倾向是与现代化背道而驰的, 它倾向于控制经济、压制民营企业、发展国家资本。这也是国民党时期中国现代化探索之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所在。国民党的作法揭示了后发国家民营企业的一个发展悖论: 既需要强政府的帮助, 又可能受到它的压制。能否走出这个悖论, 是后发国家现代化成功与否的关键。

[关键词] 南京政府十年 政企关系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K2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1)03-0067-08

一、政企关系: 一个理解后发现代化的关键问题

现代化按其发生类型可分为两种: 早发内生型和后发外源型。在早发型的英美现代化之初, 私有产权制度和相对自由的经济环境已经形成, 农业商品化颇有成效, 社会分化程度较高, 新兴的资产阶级在这种条件下自发地成长。与技术革命的到来相适应, 民营企业作为工业化的主力军, 缓慢地、自下而上地推动着人类历史上第三次大变革——现代化^②的到来。在整个过程中, 国家除了在农业上有所作为外, 很少干预经济。这个模式的特点是: 民营企业是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民营企业的成长是现代化的关键。在后发现代化国家, 情况则大为不同。它们不具备英美等国的初始条件, 无从指望现代化以自发的、内生的方式在这里成长。一般说来, 它们面临如下障碍: 传统社会结构极其顽固, 社会分

化程度低, 现代经济成分难以成长; 不少国家陷于四分五裂之中, 政治动荡, 缺乏统一的国内市场; 农村商品化程度低, 市场发育缓慢; 当现代化启动后, 现代化的先行国凭借经济实力, 迫使后发国家进入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格局, 使之处于依附发展地位。另一方面, 现代化的传导性又使得这些国家无法抗拒这一世界历史性的潮流。于是, 后发现代化国家一般都重视政府的作用, 通过国家力量来取得超经济的发展, 以赶超现代化。政府的介入使后发国家面临一个现代化的新课题: 如何处理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理想的状况是, 在国家作用充分发挥的同时, 民营企业也获得充分的发展。但后发国家的实践却呈现出颇为复杂的局面, 在政府广泛干预经济的情况下, 只有少数国家的民营企业同时获得充分发展, 对大多数后发国家来说, 政府作用的强化却往往导致官僚经济体系的过度膨胀, 民营企

业沦为附庸和牺牲品。政企关系的不同际遇相应影响着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为此，本文试图对南京政府十年的政企关系进行考察，希望从这个角度对中国现代化在这一时期的得失成败有所说明。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民营企业呼唤强有力的政府

先讨论一下北洋政府时期民营企业的发展状况是必要的。这期间，民营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正是南京政府的使命所在。当代经济史的研究认为，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③在1894年，民营资本为723万元，占国内资本总额的8%，同期外国资本为5434万元，占61%，国营资本为2797万元，占31%，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民营资本都少得可怜。到1913年，民营资本发展为15499万元，增长21倍，占资本总额的10%，国营资本为14888万元，增长不足6倍，占资本总额的10%。这期间，由于外国资本的大量输入，民营资本的相对量变化不大，但绝对量却有惊人的增长，其势头已远远超过了国营资本。到1920年，民营资本增长到42987万元，占资本总额的18%，国营资本为27902万元，占11%，外国资本为236825万元，占70%。外国资本主要集中在铁路上，制造业中以本国资本占优势。^④据杜恂诚研究，从1923年到1927年，民营资本继续以一定规模发展，5年间共新设企业608家，创办资本额共约10322.7万元，新设企业数超过了一次大战5年间（1914—1918年）的数字，创办资本总额也接近那5年的水平。^⑤

不过，民营资本的迅速发展并不能归功于北洋政府。北洋政府虽然倡导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却保持了满清集权政府的许多性质，依然具有对整个经济进行控制的倾向。只不过，这时期是中国政治衰败的顶峰，军阀割据形成了众多地方权力中心，它们集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于一体，足以和中央政府抗衡。北洋政府徒具中央政府之名，缺乏起码的全国性动员能力，根本无法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这种状况使得它没有能力像满清政府那样对新兴经

济成分实施控制，也使得“自强运动”所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一度衰落，给民营资本腾出了一片发展空间。在沿海一些受军阀混战影响较小的通商口岸城市，现代资本主义凭借其顺应现代化发展的旺盛生命力，自发地发展起来。显然，这时期私营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应主要归功于它自身的内在逻辑。如果说北洋政府有所贡献的话，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的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

上述讨论并不是想说，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无需政府的干预，相反，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面临着若干致命的障碍，它们是民营企业的自发演进所无法突破的，只有借助强有力的国家力量，才可能予以消除。首先，由于传统经济结构根深蒂固，国内市场发育缓慢，军阀割据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各地关卡重重，税目繁多，商品的流通受到极大阻碍。可是，统一的国内市场是现代化的前提，是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其次，满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协定关税税率为5%，实际不过3—4%，是世界上最低的进口税率。^⑥北洋政府承续了这一局面。外国商品在几乎没有关税的情况下大举涌入中国，中国民营企业受到强大的竞争压力，一直处于发展的劣势。再有，民营企业的发展集中在以轻纺业为主的制造业中，在铁路、矿业、电力、机械制造等基础产业方面很少投资。当时的国家资本在这方面的投资甚至比民营资本还少，有限的基础产业主要靠外国资本，而且大部分集中于铁路。如此脆弱的基础产业显然不利于民营资本乃至整个工业化的推进。软弱无能的北洋政府显然不能解决这些困境。

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希望之所在。但是，南京政府成立后实际情况却未能如其所愿。

三、市场环境

南京政权建立后，民族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当局解决几个长期影响市场状况的因素，如低关税、厘金、币制混乱等。南京政府有所作为，但积极作用

发挥得并不充分，其中可看出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态度。

关于恢复关税自主。关税自主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在于保护民族产业的成长，是民族资产阶级多年的愿望。它也是国家主权的重要方面，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南京政府成立后即致力于此。民族资产阶级对此大力支持，1927年8月上海总商会号召各会员帮助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并表示“愿以血肉和生命来做主权的保障和政府的后盾”。^⑦1928年，美、英、法等11国与南京政府订立关税新约，制定了一个由5%至27.5%的七级税则，由于日本反对，该税则未能通过。1930年与日本达成片面优惠的中日关税协定，中国的关税自主才算基本收回。^⑧新关税政策规定最高税率可达80%以上，平均税率1928年就超过10%，1934年则超过30%，^⑨比起1842年以来长达100年的值百抽五税率，是大大有利于本国产业的发展的。但是，国民党的关税保护作用是大打折扣的。上海国货工厂代表专门在上海总商会召开“审查国定税则草案会议”，提出按商品种类分别征税的原则，^⑩把进口商品按其与本国产品有无竞争关系分为两大类，竞争性商品主要是轻纺工业产品，正是民族工商业的主要内容，应该对此类产品课以高额进口税，减少进口量；非竞争性产品包括工业原料、机械、交通工具等，它们是民族工商业发展所必须，而国内尚不具备生产能力，对这类产品，应征收较低的进口税，以减少民族工商业的生产成本。可是，关税政策的实际效果却与上述要求相左。从1927年至1936年十年间，非竞争性进口商品的实际税率一直高于竞争性进口商品，1932年和1933年甚至高出10个百分点，同时，非竞争性进口商品所占进口比重也大大低于竞争性进口商品的比重。^⑪特别是1934年的新税则，由于日本的压力，降低了一部分轻工业品的进口税率，同时，为了增加关税收入，又提高了棉花、棉纺织机械、石油等产品的进口税率。这完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背道而驰，为此，上海市商会、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中

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上海机械国货工厂联合会等团体曾掀起反对1934年税则的运动。^⑫成功的后发现现代化国家一般都是在高关税保护下完成进口替代，进而再降低关税，以鼓励民族商品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南京政府的关税政策远未达到这个目标。而且，由于东北沦陷和华北危机，大量日本商品通过走私逃避了关税。中国民营企业的压力依然很大。

关税自主之所以未能充分发挥保护作用，和国民党实施关税政策的动机有关。为了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南京政府军费开支大得惊人，从1929年至1937年，军费占每年财政支出的40—50%（1933年和1936年除外，分别占39.1%和36.3%）。^⑬此外还要支付与军费相当的赔款。提高财政收入成为政府经济活动中压倒一切的任务。由于南京中央政府把土地税的征收权下放给地方政府，财政负担几乎全部集中到城市工商业头上。非竞争性产品在国内无替代品，即便税率提高，进口量并不减少，税收也因此增加。1924—1928年平均每年关税收入是1.21亿元，到1931年增为3.88亿元，以后仍保持在3亿元以上。1931年—1932年度关税收入占南京政府全部税收的60.2%，占财政收入的49.5%，到1936年—1937年度还分别占49.3%和30.3%。^⑭从增加财政收入的角度看，此时的关税政策是十分成功的，但它削弱了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作用。

关于裁厘。厘金是清政府为了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而设立的一种封建税收，以后就一直延续下来。据《中国年鉴》第一回统计，全国共有厘卡735处，这张厘卡网严重地破坏了市场的完整性，^⑮极大地阻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从清末新政以来，民族工商业者一直在倡议裁厘。1928年国民党政府讨论过裁厘问题，但对裁厘议决而不行，却把注意力放在准备用来替代厘金的“特种消费税”上。1929年初，上海总商会80多个商业团体联合致电国民党政府，再次强烈呼吁裁厘，并反对举办特种消费税。财政部复电解释说，全国裁厘后，中央政府每年收入将短少7600余万元，因而必须举办特种消

费税。上海、南京等地商会再次呼吁，但国民党政府还是不肯让步。1930年底，国民党政府开始裁厘，永远废除一切厘金以及由厘金变名的税目。同时又实行了两种新税，一种是统税，一种是特税（即特种消费税）。统税的征收对象是卷烟、麦粉、水泥、火柴、棉纱等轻纺工业品，这正是民族工业的主要产品；特税的征收对象为木料、瓷器、纸类、茶叶、丝绸、茧等与民族工商业密切相关的产品。新税的征收使裁厘减下来的负担又加了上去。1933年底火柴统税增加后，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大中华火柴公司，在1934年按新订税率共付税款2128281元，比按旧税率多付出1211194元，每月的利息损失就达5万元。^⑥裁厘给国民党政权带来很大好处，一是可以趁机设新税，从而提高财政收入，二是可以削弱地方军阀在经济上的独立性，这两方面正是国民党政府裁厘的主要动机，至于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显然不在主要考虑之列。当然，新增加的税收和厘金毕竟不一样，前者是封建税，对市场的破坏性很大。客观上，裁厘对于发展工商业是有利的。

关于币制改革。民国以来，中国的货币制度十分混乱，南京政府建立后也未改观。银元流通已经相当广泛，完粮纳税均用银元，但银两在商业结算和国际收支中仍是计算单位。银元、银两制度的并存，既增加了折算的困难，又增加了对外贸易的风险。同时，货币种类繁多，各种银元、铜币以及中外银行发行的纸币共计不下20余种。^⑦如此混乱的货币制度十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社会各阶层要求统一货币的呼声在北洋军阀时期已多次发出。南京政府成立后，“废两改元”、“统一货币”的提案在1928年的全国经济会议上提出并通过，但由于外国银行和本国钱庄的反对，这个方案并未实施。直到1933年，才正式实行“废两改元”，所有交易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废两改元”统一了银本位制，有利于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不过，银本位制的中国货币容易遭受世界银价剧烈波动的冲击。1934年6月，美国实施《白银法案》，高价收购白银，引起世

界银价暴涨。中国在几个月中流失了数亿白银。国内银根吃紧，信用紧缩，物价下跌，民族工商企业、银行、钱庄纷纷停业或倒闭。仅上海一个城市，1934年有510家倒闭停业，1935年有1065家倒闭停业。^⑧1935年2月，上海市商会致电南京政府实业部，要求采取措施，给以救济。南京政府紧急加设高额白银出口税和进口商品关税，才算基本止住白银大量外流的局面。此时，南京政府已经完成了银行业的国家垄断，借助这次白银危机，1935年11月推行进一步的币制改革：放弃银本位制，实行法币政策。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所有支付项目均以法币为准，不得使用银元，所有民间的银币、生银和其他银行发行的钞券逐渐以中央钞票换回。^⑨在经济史研究中，对币制改革的评价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在当时的紧迫形势下，币制改革势在必行，用统一的纸币代替金融币本身也是进步。而且，直到抗战，国民党并没有滥用纸币发行权去谋取财政收入，而是成功地通过在国际市场上出售白银和发行债权稳住了法币的对外汇率，稳住了国内的物价，1936—1937年国内出现了一个相对的经济繁荣时期。其间，民族工商业受惠显著。^⑩另一种观点认为，币制改革并不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是国民党“谋求金融垄断，进而全面垄断国民经济的一个迟早必然要走的步骤。国民党政府通过法币垄断，垄断了纸币的发行权、聚敛了华商银钱业的白银存底，削弱了地方军阀所办的地方银行的实力”。^⑪两种观点并不是根本对立，前者是从当时的实际效果去评价币制改革的积极效应，后者则是从以后的走向去评价其“不良动机”，笔者以为，这两方面都同时存在。

总起来说，南京政府采取了若干重要的经济政策，它们对于改善市场环境、促进民族企业发展发挥了作用。但是，前述经济政策都是以国民党政权的自身利益至上为出发点，没有刻意去培育民营企业。美国学者易劳逸在《流产的革命》中写道：“只

要一提到城市经济，国民党政府的基本缺点就是这个政权的领导人将它最高的优先权放在国家军事的政治统一上。因此，这个政权只把城市经济看作一个财源，它很少为经济发展问题花费精力。”^②

四、国家资本与民营资本

由于国家资本在北洋政府时期急剧衰落，南京政府建立时，国家资本相当有限，所接收的北洋官营企业大多低效、亏损，国民经济中的主角是民营企业 and 外国企业。国民党政权明确表示要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1928年11月7日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建设大纲草案》规定：政府应积极提倡个人兴办实业，凡是能够由私人资本去经营的，应尽量由私人资本去办。此外还颁布《现行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和《工业奖励法》，鼓励民营企业改进技术。^③当然，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相当有限。南京政府在这时也试图控制经济，采取的手段主要是发行债券、增设税目等，国家资本却较少发展，相应留给民营企业的经济活动空间比较宽松。从1927—1930年，民营企业获得了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期。^④

在发行债券、征收税目的过程中，国民党政权对民营企业形成了比较大的依赖性，因为它们是主要的财政来源。国民党政权越来越感到有必要把国民经济控制在自己手中。南京政府后期，在“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口号下，国家资本开始膨胀起来。第一个步骤是金融资本的国家化。

北洋政府时期，银行业的显著特征是商业化。商办银行在数量上和实收资本总额上都超过了官办和官商合办银行，在官商合办银行中，商股大多占有优势，并取得实际控制权。甚至像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有国家银行性质的大银行，官股也都降为附庸，政府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南京政府成立之初，银行的商业化性质并没有改变，只是南京政府的公债政策使政府与银行联系密切起来。

1928年11月，国民党政府设立中央银行，资本2000万元，1934年增资1亿元，宋子文、孔祥熙先

后任中央银行总裁。1935年3月，南京政府以近乎欺骗的手段攫取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控股权。同年4月，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资本总额为1000万元，孔祥熙任董事长，作为国家特许的专门农行。中、中、交、农加上1930年设立的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和1935年11月由中央银行拨款1000万元设立的中央信托局，构成国民党政府垄断金融业的“四行二局”。国家金融体系基本形成。^⑤国民党政府还向私营银行渗透。1929年11月中国国货银行成立，这是一家官商合办银行，政府以不过半数的股权控制了这家银行。1931年以加入官股的方式控制了新华信托银行。1936年对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加入官股，变成官商合办。同年收购改组广东银行，由宋子文任董事长。1937年对中国通商银行加入官股，变成官商合办。又对中国实业银行加入官股，变成官商合办。到1938年止，在147家新式银行的资本总额41285万元中，官办和官商合办银行的资本总额已超过25000万元，占60%以上；就营业额而言，各行在1936年底共达727589万元以上，而官办和官商合办银行计450000万元之多，占总额的61.9%。此外，国民党政府趁钱庄境遇不佳，令中、中、交三行借款1800万元，由财政部组建“钱庄监理委员会”，对上海钱庄实施控制。^⑥银行成为国家官僚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后，它们的主要任务是听从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政策，相应地，它们与民营产业资本之间相互促进的良好势头也就中断了。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后，接管了北洋政府的国有铁路，设铁道部负责修筑和管理全国铁路。公路全部归中央政府或各地方政府所有。南京政府还首创中国航空事业。通讯产业有所发展，都逐渐由交通部统一管理起来。航运业中民营的比例还比较大，但中国最大的船运企业轮船招商局1932年被当局收为国营，孔祥熙、宋子文还千方百计将权力的触角伸向民生轮船公司。^⑦1935年资源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政府开发工矿业 of 正式组织。它举办了煤、石

油、电力等能源企业和钢铁、大型机械和化工等基础工业企业。到抗战爆发，南京政府举办的工矿企业在全国工矿业投资中开始占到15%左右。^④此外，在东北、广东、山西，地方政府所办的官营企业形成了一定的规模。^⑤

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政府投资建设基础产业在工业化之初是合理的，因为基础产业投资大，民间资本或是财力有限不足以投资，或是因利润稀薄而不愿投资。但是，国民党政府此举不是为了弥补这种“市场缺陷”，而是为了全面控制国民经济所采取的一个步骤。这些企业一经成立，就具有官僚垄断色彩，政府明确规定它们独享某些领域的经营权，比如，资源委员会就享有钨、锑、锡的出口垄断权。它们排斥市场竞争，挤压民营企业。联系国民党后来的举措，它实现国家垄断经济的步骤是这样的：先金融业，再基础产业，最后是轻工业。

五、产权保护

传统中国是一个缺乏产权保护的国家。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倡导的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民间，则是平均主义观念根深蒂固，国家本身常常是产权的最大危害者。由于现代化的传导性，在产权制度尚未确立的情况下，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在近代中国早产了。北洋政府时期，名义上颁布了确立财产所有权的法规，实际上形同虚设。可是，没有产权制度的确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缺乏基本的制度保障和动力。

南京政府的建立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他们渴望尽快结束军阀混战的分裂局面，渴望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作他们的保护神。但是，为了维持庞大的军事和政治开支，1927年5月，南京政府却发行了3000万元的公债。政府代表逐个商店、逐个工厂强行推销。对于不向政府捐款、不认购公债的商人和企业家，就采取通缉、逮捕、查封资产，甚至绑架和敲诈。^⑥据一项比较保守的估计，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一年零二个月中，上海各界向政府提供的钱款有将近1亿元之多。^⑦这种对私有产权的肆意

侵夺再现了传统中国极权官僚制的劣根性，而且，这种充满了匪气的行为造成了一度的白色恐怖。资产阶级对国民党政权的信心受到很大打击。

如果说上述侵犯产权的极端作法是为平息军阀的战争所迫，尚有理由的话，1928年6月全国经济会议上，商界代表提出“保护商人财产”的议案遭到拒绝，则表明国民政府根本不理睬资产阶级对保护私有产权的要求。该议案要求“所有私有财产，如船舶、面粉厂、工厂、矿山等等，现在仍被政府当局所占据者，应一律立即归还，所有非法没收的财产也同样立即归还原主”。上海闸北的工商资本家为维护自己财产不受侵犯，甚至组成了一个闸北商团，上海总商会也公然抗拒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解散命令，继续拨款予以支持。^⑧可惜的是，这些抗议和争辩要么遭到冷落，要么被强力予以制服。

南京政府站稳脚跟后，对待民营经济，充满匪气的强占强取是没有了，但并没有致力于产权制度的建设。相反，把中国的产权问题推向一个更为尴尬、复杂的境地。国民党开始发展国家垄断资本（具体情况前文已述），形成了大量产权关系模糊的经济组织。同时也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它们是权力的衍生体，在经济生活中处于强势地位。它们一经形成，立即成为建立产权制度的障碍。此外，为了发展国家垄断资本，通过兼并、控股等手段巧取豪夺民营资本的事情时有发生。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规模分别位于全国银行业的第一和第三，1935年3月，中央政府以救济金融恐慌为名发行金融公债1亿元，其中1500万元拨中国银行增资，1000万元拨交通银行增资。银行界接受这些公债，本来是作为政府向银行贷款的担保物，但中央政府却强行要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将增拨的公债作为政府的官股。这样一来，政府用一堆债券骗来了对两大银行的控股权。^⑨银行国有化后，南京政府控制、吞并民营企业的手段就更加完备了。1933年，荣氏兄弟经营的申新公司发生困难。以陈公博为部长的实业部对申新进行苛刻调查，故意贬值估价，

指责申新管理不善，提出由政府接办申新，并在报端制造收归国有的舆论。荣氏兄弟在同行业资本家的帮助下，据理力争，才终于幸免于难。^④另一著名民营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却没有这样幸运，1937年，宋子文控制的广东银行趁公司经营困难，以比市价15元低2/3的价格（即每股5元）购买了南洋公司的一半股票，控制了该公司。^⑤至于地方政府，由于军阀作风的残存，侵犯民营企业产权的现象更是所在多有。

纵观南京政府十年，它在提供产权保护这个公共产品方面无所建树，而且它本身就是危害产权的最大强势力量。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六、政治参与

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又一个方面是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新兴的进步经济力量，它的充分发展要求相应的政治地位。南京政府十年期间，政府在加强经济控制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民营企业的政治控制，民营企业越来越走向政治体系的边缘。

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政权的衰落使民间经济力量的政治独立性相应成长，他们通过商会等自主性社会组织，在政治生活中享有了一定发言权和政治自由。北伐战争爆发后，他们站在国民党一边，给予大量经济支持。他们天真地认为，既然帮助蒋介石建立了南京政权，那么，他们与这个政权的关系就是股东与经理的关系，所以他们不客气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其中包括政治上的发言权，并组织各省商会联合会，准备参政。1927年12月，上海总商会电邀各省总商会在上海举行“各省总商会代表大会”，蒋介石、戴季陶、孔祥熙亲临致贺，大会在最后宣言中希望商人“积极参预政治，以符合全民政治之实际”。^⑥南京政府为了巩固政权，对资产阶级采取了一些拉拢的作法。“四·一二”政变及《劳资争议处理法》的颁布满足了资产阶级“解决工潮”的要求。1928年6、7月间，蒋介石集团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财政会议及铁路会议，专门邀请资本家

代表出席，倾听他们的意见。南京政府还把江浙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请到政府机构中，授以一定的职位。^⑦

但是，国民党是靠军事起家的，权力不是来源于社会的委托，它更相信军事立国和全面控制，无意把资产阶级作为政权的社会基础。南京政府成立之初，为了筹措军事与政治经费，就不惜使用绑架、敲诈等手段，粗暴地向民营企业摊派。当资产阶级的参政要求与国民党全面控制社会的企图冲突时，国民党就准备彻底制服他们。上海商会是中国资产阶级最大的组织和代言人，1928年8月，它以经济力量为后盾，提出了裁减军队、限制军费、保护私有财产、减轻税赋、编制全面预算等建议，强烈要求南京政府接受。遭到拒绝后，双方对立相当严重。同年，国民党修订《商会法》，并另订《工商同业公会法》，在整顿工商团体的名义下，把上海总商会与其它更直接受到国民党控制的商会组织合并，削弱总商会的独立倾向。国民党中执会进一步规定：上海商会须得遵守上海市行政当局的管辖，所有商会成员必须信仰三民主义。商会的独立性被进一步阉割。^⑧

对于蒋介石的“恐怖政策”和背信弃义，资产阶级极为不满，到“九·一八”事变前，这种不满已积累到了相当程度。1932年国难会议前，上海议员62人准备了一个提案，其核心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些人主要是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包括虞洽卿、陈光甫、杜月笙、黄金荣等。但南京政权决不允许资产阶级作为强大的政治势力而存在，更不能容忍作为反对派而出现。为此不惜使用卑鄙手段，1933年、1934年，国民党暗杀了上海的资产阶级头面人物杨杏佛、史量才。^⑨1935年以后，国民党通过金融资本国家化逐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全面控制，随着经济独立性的丧失，资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被扫除殆尽。

国民党看似成功的政治控制孕含了极大的危机。新兴政治力量的出现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是政治

参与扩大的表现。政治参与的扩大要求相应的政治制度化,从而把新兴政治力量整合起来,否则就会产生政治动乱。^⑧资产阶级是现代化中的新兴力量,而且是倾向于稳定的力量。国民党对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压制,意味着把他们排除在制度化的政治体系之外。这样,资产阶级成为了国民党政权的异己力量,加入到反对现政权的行列之中。

七、对南京政府十年政企关系的几点思考

(一) 1936年:到达经济起飞的前夕了吗?

郑圆竹认为,到1936年,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处于经济起飞的前夕,^⑨一些西方学者也持类似看法。这种看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十年,中国的民营企业有较大发展,城市工业化也相应取得显著成就。按照章长基的估算,1912—1936年,中国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为9.4%,其中1931—1936年年均增长9.3%,如果把东北除外,1931—1936年工业年均增长率为6.7%。即使减掉估算中的夸大成分,增长速度仍相当可观。^⑩但是,这种成就只是器物层面的现象,前面的讨论说明,在制度层面上,特别是在政企关系上,南京政府十年的主导性倾向是与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国民党政权强调自身利益至上,倾向于控制国民经济、压制民营企业、发展国家资本,到抗战前夕,已经为官僚资本垄断国民经济作好了种种制度安排。这十年,国家资本的膨胀还比较有限,民营企业还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民营企业充分发展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已经开始中断了。中日战争爆发后,在战时状况的推动下,官僚资本加速膨胀,很快就垄断了国家经济,相应地,民营资本急剧衰落。这样,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又一次失败了。革命史的研究往往关注国民党的政治反动性所导致的军事失败。事实上,国民党在中国现代化努力上的失败有着同样深刻的意义,而这一失败的根子在南京

政府十年时期就已经种下了。

(二) 后发国家的一个发展悖论。

总起来看,南京政府十年民营企业的发展处于这样一种尴尬境地:在之前的军阀割据下,有限的多元化给它提供了宽松的发展环境,取得了较快的增长,但它更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来保护它、帮助它;当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统治巩固并强化国家机器后,民营企业的发展又受到了压制。“或是由于得不到国家的强大支持,因自身软弱而无力进行发展;或者投靠军事化的国家机器,而成为官僚资本主义的附属物与牺牲品”,^⑪这就是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历史悖论。同时,它也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普遍面临的悖论。在后发国家,政府干预经济是十分必要的,它能用超经济力量为发展铲除障碍和提供帮助,但是,政府的过分干预往往又会压制民营企业的成长。能否走出这个悖论,使政府成为民营企业成长的亲和力量,而不是异己力量,是后发国家现代化成功与否的关键。

①本文的政企关系是指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

②[美]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1—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③⑤⑩⑪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330、330、434、43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④⑥严立贤《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第249、25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⑦⑨⑩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黄逸峰等著《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第355、360、358—359、359—360、366、402、410、349、35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⑧⑪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第32、33—34、60、32、32、69、101、112、75—8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⑮⑰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第258、272、267、267、272—274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②③[美] 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277、27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

明清广东的社学

李绪柏

(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 本文主要探讨了明清广东社学的发展概况、明清广东社学在建制规模、经费学田、教学内容、社师遴选等方面的特点, 以及社学在广东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贡献等。

[关键词] 明清 广东社学 发展状况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1)03-0075-07

明清二代学制基本相同, 中央有国子监(太学), 地方有府州县儒学, 这是官方教育体系。此外, 还有大量的书院、义学、私塾、社学等, 均属于非官方教育系统。其中社学尤引人注目, 它既非官方教育体系, 又属于基础教育系列, 所谓“国朝开设学校, 自胄监至于府州县备矣, 惟乡之社学不列于官, 待有司而后兴。”^①本文主要探讨明清广东社学的发展概况, 以及社学在广东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贡献等。

一

朱元璋登位之初, 即仿古之小学, 普遍设立社学。洪武八年(1375年)诏曰:“昔成周之世, 家有塾, 党有庠, 故民无不知学, 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

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 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 有司其更置社学, 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 庶可导民善俗也。”^②显然, 这时社学带有浓厚的官办性质。不久, 由于各地官吏举办不力, 趁机渔利, 扰民害民, 故遂命停止。

十六年(1383年)冬, “复诏民间自立社学, 延师儒以教子弟, 有司不得干预。”^③这次诏令, 允许民间自立, 强调有司不得干预, 因此社学带有更多的民办色彩。从此, 全国各地社学开始普遍兴建。

明前期广东社学的情况, 见诸记载极为稀少。隆庆《潮阳县志》载:“邑之有社学也, 盖起于洪武八年奉诏创立者, 其为学凡有五: 一在射圃内, 今废。一在城隍庙西, 坐通渠之上, 曰源泉社学。一

^{②③④}朱英、石柏林《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 第451—457、456页,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③}杨单伟《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 载《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④莫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 第150—151页, 华东师范大学1998年版。

^⑤忻平《南京国民党政权崩溃原因探析》, 载《近代史

研究》1992年第2期。

^⑥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第51页, 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⑦⑧}郑国竹《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载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

^{⑨⑩}罗荣渠《现代化新论》, 第326、307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责任编辑: 郭秀文

在际留仓内，曰西隅社学，嘉靖三十二年知县黄休泰重建。一在南门外桥南，曰聚会坊社学，今废为民地。一在南门外南薰亭东，曰南薰社学，后废为灵山驿。”^④此外，东莞《茶山乡志》载：“吾乡社学，初在北门邱氏祠侧……正统三年，茶山迁社学即铁炉岭雁塔寺为之。”^⑤据此，则东莞茶山乡明前期确曾创建过社学。

明前期由于社学尚属草创阶段，进展不太顺利。明中叶以后，在最高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催督下，各地布政使、提督学官、府州县长吏皆奉诏而行，故在天顺、成化、弘治间，广东兴起第一次社学创办高潮。成化十九年（1473年），“布政使陈选作兴社学，朔望考其诵习，作训蒙文以勸之。”^⑥德庆州旧无社学，成化中督学佥事赵瑶命判官庄楷、知州管淳建养正、程溪、菁莪、西源、金定五社学。^⑦程乡县东、西、南、北四社学，俱成化、弘治间知县刘彬建。^⑧

值得注意的是，琼州府在此次高潮中成就尤为突出。正德《琼台志》关于社学云：“皇朝天顺，成化二次兴建，天顺间义学六，成化间社学一百七十九。”并引旧志云：“天顺间尝建立而未遍，成化甲午，副使涂棐复令于州县内外择地建学，学择教读一人，以掌教事。”社学数量最多的是琼山县，“今观旧志，琼山一县，七乡人民耳，而社学之多，乃至八十余所，其余州县称是。”当然，社学既多，免不了参差不齐，尤其教师质量难以保证。故“学多则人贱其师，则知耻者不为，而为之者其人可知。”^⑨这是成化、弘治间广东大兴社学的一般情况。

明代广东兴建社学的第二次高潮，是在嘉靖间魏校大毁寺观淫祠的时候。魏校，字子材，昆山人，学者称庄渠先生，弘治进士。正德、嘉靖间任广东提学副使。他认为“社学教化首务也，久废不修，无以培养人才，表正风俗。”因此结合毁佛，他要求各郡长吏，“亲诣各坊巷，凡神祠佛宇，不载于祀典，不关于风教及原无敕额者，尽数拆除，择其宽敞者改建社学。”^⑩在魏校的大力敦促下，广东各地

社学纷纷兴建。现存方志中有关明代广东社学，大都与魏校有关，可见其影响之大。如：番禺县，“嘉靖元年提学魏校尽毁淫祠，檄飭有司改建社学六十余所，今犹有存者。”^⑪嘉靖《惠大记》在列举了各县社学数量之后，乃云：“并嘉靖壬午提学副使魏校令所司悉撤淫祠改建。”^⑫高明县社学40余所，除迎薰、拱辰、宾曦三社学为知县徐纯所建外，“余皆明嘉靖元年提学魏校檄县毁淫祠立。后以艰去，事未竟，嘉靖七年知县陈坡踵行之。”^⑬

诸如此类，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故后人每称，“至嘉靖元年，广东提学魏校大毁淫祠，令府州县各立社学，广东社学之盛，自此始。”^⑭

嘉靖间是广东社学创建的高峰期，此期广东社学不但数量激增，而且许多以前从未兴建社学的穷乡僻壤，也创建了社学。嘉靖末，著名学者黄佐编纂《广东通志》时，对全省社学作了一次初步统计，除少数州县未建或缺载外，其余府州县均详细记载了社学名称、数量、地址等。现据此制表如下：

嘉靖广东社学统计表

府名	县名																总计
广州	府城	南海	番禺	顺德	东莞	增城	香山	新会	新兴	清远	龙门	三水	从化	连州	阳山	连山	241
	8	5	48	42		2	3	15	1	8	3		1	3	2		
韶州	曲江	乐昌	仁化	乳源	翁源	英德											37
	4	12	6	2	8	5											
南雄	保昌	始兴															19
	18	1															
惠州	归善	博罗	海丰	河源	龙川	长乐	兴宁	和平									49
	8	12	6	3	6	8	3	3									
潮州	海阳	潮阳	揭阳	程乡	饶平	大埔	惠来										34
	4	3	10	4	7	4	2										
肇庆	高要	四会	新兴	阳春	阳江	高明	恩平	德庆	泮水	封川	开建						72
	2	1	1	1	3	41	4	2	14	2	1						
高州	府城	茂名	电白	信宜	化州	吴川	石城										28
	3	3	1	1	1	18	1										

[illegible]

雍正后广东社学创建进入高潮，但各地官吏奉行不一，故发展极不平衡。如乾隆时《潮州府志》载各县社学，多见“今废”、“久废”、“后废”、“俱废”^⑦字样，一片荒凉凋残景象。而同期广州府各县社学，南海 99 所，番禺 60 所，顺德 124 所，^⑧仍是一片繁荣兴旺局面。由于潮州各地社学名存实亡，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谕军机大臣等，据李侍尧等奏，广东潮州府属各县，设立官学教习官音，有名无实，徒滋糜费，请概行停止一折，所奏甚是。”^⑨故四十年（1775 年）后奉裁廩项，将拨银取消。这个举措，有的地方受影响较大，“而社学渐废”。^⑩有的地方则影响不大，“而各乡增建，不因是少懈。”^⑪但自此之后，广东社学官办色彩逐渐淡化。

嘉道以后，清廷国势转衰，加之内忧外患日益加剧，在此复杂背景下，广东社学也开始发生许多变化。

其一，是社学名称与义学、书院混淆不清，三者之间界线模糊难辨。先是，“嘉庆以来，岭南、珠江、南海、汾江诸义学，咸改署书院。”^②以后，“其有大宗名族，自设家塾，亦称书院者。”^③正如同治《番禺县志》所说：“谨按本邑书院、社学，其可考者，肇自前明。至国朝文治丕洽，党塾乡序，错布乡堡。其间或称书院，或称义学，或称社学，名虽不同，而实则一。”^④

其二，社学变为文会之地。文会又称文课，即乡人会文比赛之意。如佛山崇正社文会，始自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每年二、四、六、八月之四日，文士齐集，盛时会者多至四五百人。^{⑥5}此风浸染成俗，所谓“粤中文会极盛，乡村俱有社学，文会即集社学中。”^{⑥6}久而久之，使社学性质发生了变化，以至《佛山忠义乡志》作者叹道：“乡之社学，始于明洪武三年，嗣是而设义学，建书院……然延师授徒，只佛山书院一处……其余皆乡人会文地耳。”^{⑥7}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其三，社学兼为讲约之所。讲约之事，起自雍正时，凡州县城内及各大乡村，各立讲约之所，设约正一人，值月若干，“每月朔日举行……众以齿分左右立，设案于庭中，值月向案北而立，抗声宣讲《圣谕广训》，各人肃听，约正复推说其义。”^④原来规定社学生童要由师长率领，亲诣附近约所，恭听宣讲《圣谕广训》的。以后反过来，乡人齐集社学，不知不觉之间，社学演变成为讲约之所。

其四，社学成为议事公所。由于社学经常成为乡堡文人绅耆会文、讲约聚集之地，久之，社学又向议事公所发展。凡有大事，乡民齐集于此，议事而行。如顺德县安和社学，“每月之二日，绅士齐集，诘奸饬俗。”^⑧道咸期间，广东局势动荡，各地纷纷编练保甲，兴办团练，于是社学又成了团练中心。保甲团练，有的利用旧有社学进行；也有的新

成立团练，迺以社学称之。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举人李芳清准在广州城北石井建立新的升平社学，捐资团练自卫。^⑩又如番禺县清平社学，“在萝冈洞内，道光丙午年奉宪编练保甲，合迺子、青紫、冈园、塘头四约同建。设立社长、副约、正乡、正正，严申条例，清息盗原，有事集议于此。”^⑪因此在鸦片战争后，社学成为由士绅领导的各阶层人民爱国自卫的武装组织，在反对英人强迫租地、反对英人入城斗争中起过重大作用。但此时已是仅有社学之名，而无社学之实了。

三

明清广东社学在建制规模、经费学田、教学内容、社师遴选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为节省篇幅，故一起叙述。

明清广东社学创建者，情况各异。有地方长吏，如儋州松林、木堂、永泉等10社学，俱成化中知州陈袞建。^⑫有当地乡绅，如大埔县湖寮社学，嘉靖初乡绅呈请改隆庆岩寺为社学。^⑬也有吏绅共创，如揭阳县棉湖社学，雍正八年（1730年）知县陈树芝、湖口司巡检王秀倡合寨士绅兴建。^⑭还有数乡堡合力举办，如番禺县石井社学，“在城北三十里，乾隆二十九年合石井十三乡同建。”^⑮

社学建置规模，也参差不齐。明中后期广东社学，多由庙宇祠堂改建，社馆因陋就简，这是一大特色。若非寺庙改建者，一般情况下，规模均不大。如崇祯时高州知府姚继舜重建茂名县六社学，多是“门堂各三间”，“门一座，堂三间”^⑯等。清代社学在规模建置上也相去无几，但也有少数社学，由于经费充裕，建筑上堂皇壮观一些。如南雄直隶州秀峰社学，“在城东百里莲溪一都石塘村，乾隆二年都内士民创，计屋十六间。”^⑰而同期琼山县雁峰社学，“凡建讲堂五间，文奎楼五间，东西两斋十二间，大门三间，周以垣墙，规模整肃。”^⑱这是一座颇具规模，气派不凡的大社学了。

社学名称，来源也呈多样化。有以方位称者，如：东隅、西隅、南隅、北隅。有取寓义教化吉祥

者，如：蒙养、敦本、崇正、厚俗等。也有迺取地名者，这类数量最多，如：高冈、恩溪、周陂、樟村等。广东许多社学名称，从明代一直沿用到清代。

社学经费，也有多种来源渠道。明代广东，有“以近学墟市租税充束修”^⑲的，有“列肆十七以供岁费”^⑳的，有“置铺三十二以给十六社学”的。^㉑但最常见的还是置学田。社学学田，或官吏捐置，或众士绅捐置。由于学田属于恒产，因此社学便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不复有后顾之忧。

清代广东社学经费，与明代稍有异同。最大不同是雍正、乾隆间，官给帑金24两，因此社学在相当长时期内有固定经费保障。自奉裁廪项后，社学经费与明代几无区别，或置田产，或捐俸银，或筹款发商生息。如曲江县东、西、南、北四隅社学，“康熙二十四年，知府唐宗尧、知县秦熙祚捐俸修建。复捐束修，延师训课合邑子弟，士民赖之。”^㉒以后岁久倾圯，道光五年（1825年）知县叶廷芳建复，“筹款一千二百七十两，发东水煤商生息，岁得息银一百五十两，为延师修脯，酌立章程。”^㉓

明清二代对社学教师，有许多具体规定。如明初规定：“其经断有过之人，不许为师。”^㉔嘉靖中，佛山人冼桂奇也谓：“社学师俱由郡守选经明行修者充之。”^㉕看来，“经明行修”是明代任社师的基本条件，但仍嫌太笼统。清代对社师资格规定就比较具体，如雍正初诏令“择生员学优行端者，补充社师。”又乾隆《大埔县志》载，“择文行优长贡生、生员教课。”^㉖这里，社师基本条件是生员资格，一直到清末，这个规定都没有变化。

社学之师，多经遴选。嘉靖中，“提学副使张希举，考选社师之有儒行者，分司教读。”^㉗明末崇祯时考选社师，“因是广集儒童，择老成驯谨者，初试之课，再试之文。音必清亮，字必端楷，讲必贯串。令有家室者居之，给札，以巾履相谒见。议将旷地垦税，社给数金，俾糊其口。”^㉘清代社师遴选，当也不外乎此。

明清二代对社师有许多优厚待遇。如明代“免

为师之人差徭。”清代也是“免其差役，量给廪饩。”社师虽待遇优厚，政府对社师也有许多考核检查规定。如明天顺间，对社师要“年一考校，择取勤效。”清雍正时规定，“如社学中有能文进学者，将社师从优奖赏。如怠于教习，钻营充补，查出褫革，并该管官严加议处。”^⑤但社师数量多，流品杂，如何统一管理、考核、奖励、处分等，明清二代的一些规定，大都嫌太含糊，难以确切实施。

社学教学内容，明清二代差别较大。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令民间子弟读《御制大诰》。又令为师者率其徒能诵《大诰》者赴京，礼部较其所诵多寡，次第给赏。又令兼读《律令》。”^⑥明中期以后，除一般经书外，讲习冠婚丧祭之礼是社学教学的重要内容。魏校督学广东，大力提倡习礼，“教童生虽以经书，然三时分肄歌诗、习礼、演乐。”^⑦还“特建各隅社学大馆，以为诸生学习礼乐之所，以礼乐读诵，互相启迪。”^⑧

清代社学教育，可用“学为文字”、“教以礼义”，“宣讲《圣谕广训》”来概括。少数民族地区和潮属地方，还要加上“训以官音”。如雍正十三年（1735年）“议准，广东省凡有黎瑶之州县，悉照连州之例，多设官学。飭令管理厅员督同州县，于内地生员内，选择品行端方，通晓言语者为师，给以廪饩。听黎瑶子弟之俊秀者，入学读书。训以官音，教以礼义，学为文字。每逢朔望，该学师长率其徒众，亲诣附近约所，恭听宣讲《圣谕广训》，申明律例，务令通晓，转相传诵。”“又议准，广东省潮属地方，于设立约正、直月之外，照黎瑶设立官学之例，多设官学。仍飭令地方官，于该村附近生监内，另选学行素优者为师，酌量给以廪饩，听零星村落之子弟，入学读书，训以官音，教以礼义，学为文字。飭令该地方官不时稽察，务期实力奉行。”^⑨

四

明清广东社学发展历经五六百年，其间虽兴衰不一，有行有辍，但基本上维持下来，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教育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综观

明清二代广东社学，它的作用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推动基础教育普及深入。明清二代基础教育，主要由私塾和社学承担。因私塾要聘请塾师，花费较高，一般穷人负担不起。所以，“贫者不取其修”^④的社学，就成为广大农村童蒙上学读书的主要地方。由于社学数量多，分布广，“每乡每里俱设社学”，其接受对象是“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送入读书。”加之明清二代社学经费多由官绅捐赠或有学田支持，使得社学带有免费义务教育的性质。社学的这种广泛性、普及性、平民性和义务性特点，是中央太学、府州县儒学及书院、私塾等完全不能比拟的。它在推动基础教育普及深入方面的作用，也是其他教育机构无法替代的。

第二，形成全社会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明清广东社学，既不是纯官办性质，也非纯民办性质，而是二者兼而有之。社学的这种奇特性质，说明它是全社会兴办教育的产物。在兴办社学的过程中，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到地方各级官吏雷厉风行的催督，从士绅的闻风踵起，到阖族捐建、以至合十数乡村之力同建，流风所至，浸染成俗，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全社会重视教育，兴办教育，乐育文教，以兴学重教为己任的良好风气和优良传统。

第三，移风易俗，促进社会进步。社学的作用，除读书识字，提高文化知识外，化民善俗，育才成治，即礼乐教化的功能也不容低估。早在成化中，刑部郎中洪钟言：“广东程乡（今梅县）流移错杂，习斗易乱，宜及平时令有司立乡社学，教之诗书礼让。”^⑩强调的正是教化和移风易俗的功能作用。而清代在黎瑶少数民族区和潮属各县社学中，读经之余，兼训官音，教以礼义，则移风易俗的作用更为明显。由于广东僻在海隅，历史上社会文化发展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故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礼乐教化和移风易俗正是社会全面进步的一种表现。

④陈献章《程乡县社学记》，顺治《潮州府志》卷十

二。

②③《明太祖实录》卷九六、一五七。
④隆庆《潮阳县志》卷九。
⑤袁应淦编、刘文亮补编：《茶山乡志》卷二。
⑥⑬⑮嘉靖《广东通志》卷三七、三七、五〇。
⑦嘉靖《德庆州志》卷十二。
⑧⑫康熙《程乡县志》卷二。
⑨④⑨正德《琼台志》卷十七。
⑩⑫魏校：《檄郡县立社学文》、《择立社师文》，康熙《东莞县志》卷十三。
⑪⑮乾隆《番禺县志》卷七、十七。
⑫嘉靖《惠大记》卷二。
⑬《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三四八。
⑭⑭⑮⑮道光《南海县志》卷十一。
⑯崇祯《东莞县志》卷三。
⑰⑱⑲⑳㉑㉒《清会典事例》卷 396，中华书局 1991 年。
⑳康熙《翁源县志》卷二。
㉑康熙《阳春县志》卷五。
㉒④⑨雍正《揭阳县志》卷二。
㉓③⑩方东树：《新建廉州湖廉社学记》，《仪卫轩文集》卷 9。

㉔乾隆《潮州府志》卷二四。
㉕乾隆《广州府志》卷十六。
㉖《清实录广东史料》（二），第 360 页，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1995 年。
㉗③⑨咸丰《顺德县志》卷五。
㉘④④⑤同治《番禺县志》卷十六。
㉙⑤⑤⑤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二、四、十二。
㉚③④⑤⑤乾隆《高州府志》卷六、十三、十三、十三。
㉛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451 页。
㉜万历《儋州志》地集。
㉝⑤⑤乾隆《大埔县志》卷四。
㉞道光《直隶南雄州志》卷十四。
㉟道光《琼州府志》卷三九下。
⑥⑥⑥万历《广东通志》卷五三。
⑥⑥康熙《韶州府志》卷三。
⑥⑥光绪《韶州府志》卷十八。
⑥⑥⑥《大明会典》卷七八。
⑥⑥卢子骏：《潮连乡志》卷二。
⑥⑥黄钊：《石窟一徵》卷二。
责任编辑：郭秀文

明清广东笔记漫谈

李龙潜

(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广东最早的散文笔记出现于汉代, 历经唐宋, 至明清达到空前繁盛, 不仅门类多, 数量亦不少。但由于各种原因, 湮没亦不少。目下存留下来的一些罕为人知的珍希笔记, 包含丰富的历史资料, 可补史乘之缺。

[关键词] 笔记的含义 广东珍希散文笔记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1)03-0082-04

“笔记”一词的含义, 梁代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称: “今之常言, 有文有笔, 以为无韵者笔也, 有韵者文也”。这是魏晋以来人们从文章体裁来区分而定出的。当时, 士人讲求声韵对偶的文字, 称为“文”, 即“韵文”, 运用散文体裁笔记下来的文字, 称为“笔”, 即“笔记”。今人称为“散文笔记”, 包括随笔、笔谈、杂识、札记等。内容大都记见闻、辨名物、释古语、述史事、写情景等。

广东最早的散文笔记应该是东汉番禺人杨孚写的《异物志》。它记载广东物产、双季稻栽培、制糖工艺以及民情风俗等。中经唐宋, 散文笔记逐渐盛行, 著名的有唐段公路撰的《北户录》三卷和宋赵勰撰《广州市舶录》三卷, 后者可惜已佚; 前者叙述广东风俗人情、饮食衣制、歌谣音乐、草木果疏、虫鱼鸟兽, 内容丰富, 为研究广东风俗史、文学史、动植物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迨至明清时期, 随着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 散文笔记的著作不仅种类繁多, 而且内容丰富多彩, 可谓达到空前繁盛的景况。根据内容的倾向, 就种

类而言, 约略可分为三大类:^①

第一类, 是小说故事类, 即志怪、轶事小说。如清代钱以恺撰《岭海见闻》四卷, 就是“杂采小说”而编成的。其中有不少篇章反映了民间传说故事或轶事小说的内容, 如秦末冼氏起兵安境保民, 海南岛黎母山上有千年寿妇担任部落首领等。^②清王士正撰《皇华纪闻》四卷, 是康熙二十三年作者以少詹事奉使祭告南海, “因摄其道途所经之地, 搜采故事为此书, 多采小说地志之文, 直录其事”。^③

第二类, 历史琐闻类, 包括范围较广泛, 记野史, 谈掌故, 辑文献的杂录、丛谈等, 都属这一类。这类笔记在明清时期的广东出现较多, 著名的有: 明王临亨撰《粤剑编》四卷, 是作者于万历二十七年(1601年)奉命到广东办案时, 记途中见闻所作。内容包括古迹、名胜、时事、土风、物产、艺术、外夷、游览八目。清屈大均撰《广东新语》二十八卷, 举凡天文地理, 经济物产, 风俗人情, 百工艺技, 花草虫鱼, 无所不载。内容广博, 比较翔实, 辩论周详, 可算是一部广东百科全书。此外清张渠

撰《粤东见闻录》二卷，是仿《广东新语》体裁而写成的。清三水范志昂撰《粤中见闻》三十五卷，虽然袭用了《广东新语》很多条目，内容完全相同，但大部分所述“或得诸游览，或传于故老，一一参订以典籍”。^④仍有可取之处。明香山人黄瑜撰《双槐岁钞》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是书“所记洪武迄成化中事，凡二百二十条，……其书首尾贯事，在明人野史中颇有体要”。其中叙述科举、军政、边备等，可补正史之不足。钮琇撰《粤觚》二卷，是作者亲历之地的见闻，该书收在《觚剩》中。

第三类，考据、辨证类，即读书随笔、札记。如明博罗张萱撰《疑耀》七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是编考订故实，循循有法”，“考证往往有依据”，内容翔实可靠，常为学人所引用。其他如明郭棐撰《酉阳正俎》十篇，明湛若水撰《问辨录》六卷，清王钺撰《星余笔记》一卷，清顺德仇巨川撰《羊城古钞》八卷等都属此类。

在这里想提出研究的，是一些专门的著作，刘叶秋一概不列入笔记之列。^⑤我觉得可以商榷。如明朝郑之侨撰《农桑易知录》，是据典籍和访问材料编成，共三卷，是广东现存最早的有关农业的著作。内容主要是介绍明代广东农桑种植知识，如种稻、麦棉等方法 and 程序、工具说明、防涝及备荒事。但其中有 1/3 的篇幅是叙述明代农村基层单位里社组织、保甲的任务、婚丧习俗、饮食起居、服饰时尚等和农桑技术完全没有关系的内容。^⑥又如清陈徽言著《南越游记》三卷，记述广东山水、古迹、异闻、风土、物产以及名贤轶闻琐事。还有王士禛撰《广州游览小志》一卷等。还有史地相结合的专著如明郭棐撰《粤大记》三十二卷，内容有纪事、人物、政事三大类。以上各书有的是跨学科的，如《粤大记》，既可入方志类，亦可入笔记类。但是，如果笔记类的论著把它们摒弃，内容就会失色，何况清人黄芝瑞撰《粤小记》四卷，尚要列入笔记类呢。所以研究明清笔记很有成就的专家谢国桢先生在《明清笔记谈丛·重版说明》中，把上述性质的书都列入

野史笔记范围，是有道理的和必要的。

明清时期广东究竟出现了多少笔记？至今尚未见有人统计过。根据阮元纂《广东通志》卷 189—198 艺文略著录的统计，共有《羊城古钞》等 42 部，其中已佚或未见者有明郑维新辑《惠大记》六卷、明苏乔撰《封川野志》二卷等 16 部，占以上统计的 38%，可见损失湮没严重。自然，上述统计是非常粗略和不完全的，据我所知，许多笔记都未被著录，如上面提到的《粤小记》、《粤剑编》等。如果把现存的和已佚的著录和统计，想来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明清广东笔记湮没严重的原因，一是广东地处亚热带，春夏气候潮湿严重，书籍不易保存；二是水火兵灾，毁灭不少。如清初广东从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三年（1661~1664 年）三次划界“迁海”，公私所藏的许多书画，包括明清广东笔记在内，遭兵火毁灭无遗。史称：顺德桂洲人胡曰乾家中“蓄彝鼎图籍甚富，值国朝迁界尽失亡”。^⑦李果奇有“书藏万轴同归尽，画蓄千函总搏沙”之句，^⑧可见他家原藏书画甚多，“迁海”时亦全部被烧毁殆尽。三是过去人认为小说笔记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因而不免受到鄙薄。清人钱泳说：“昔人以笔札为文章之唾余，余谓小说家亦文章之唾余也”，^⑨就是佐证。

多年前，我在各地搜求明清史资料时，发现了一些广东明清时期的散文笔记，由于或为抄本，或为流传不广的刻本，一直罕为人知。现择其中几种具有较珍贵史料价值的稀有的散文笔记作一简单的介绍。

（一）《离乱见闻录》三卷，（清）陈舜系撰，海盐朱氏旧藏传钞本，又有《高凉耆旧遗书》本。谢国桢撰《晚明史籍考》曾著录。

陈舜系（1618~1679 年），广东吴川人，长期任私塾教师，永历间，入李定国部任医生。该书记载了大量的有关明末清初广东社会经济状况的史料，如闽广间的长途贩运贸易、洋货销售、市镇盛衰、币值变动、物价升降、赋役征派、黄册的编制和接送等等。同时对明清之际广东地区的抗清斗争有详

细的叙述。书中所记，多为陈氏亲历目睹，比较真实，可补史乘之阙。

(二)《华衮手记》一卷，(清)蔡皇襄撰，钞本。

蔡皇襄(1620~1717年)，广东海丰鹿境人，明季生员。该书记事始于崇祯四年(1631年)，终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共69年，按年月次序记述广东惠梅潮地区的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如刘香犯海丰，惠州刘进忠叛乱，清兵攻打广州及潮惠等地的抗清斗争，海丰沿海人民被强迫迁移入内地的悲惨遭遇及苏成领导的反抗“迁海”的斗争，对各地的物价、田地买卖、赋重役烦、人民贫困以及捐纳贡生等等，都有详细生动的描写，是研究明末清初惠潮梅地区历史的重要资料，十分珍贵。

(三)《吉康治乱记》一卷，(明)彭希周撰，钞本。

彭希周，万历时任惠州知府。是书记叙万历年间归善人民采矿，隆万间陆丰人民反抗斗争以及赋役、物价、田价等情况。虽是一鳞半爪，然而字字珠玑，十分难得。

(四)《雷州记》一卷，(清)李廷纂撰，钞本。

李廷纂(?~1849年)，山东章丘人。嘉庆进士，道光时任雷州知府。全书数千言，仿唐宋人小体文字，以游记随笔形式写成。内容记述雷州历史山川、语言风俗、物产胜迹，较为翔实，尤其能辨地方上流传讹说，不随俗论，更为难得。文字简朴，叙述雅洁，辩论有据，是珍贵的地方文献。

(五)《甲申南社乡寇变纪略》一卷，(清)谢重华撰。

谢重华(1598~1679年)，东莞茶山南社乡人，崇祯举人。是书记崇祯十六年东莞、新会等地奴仆、佃户起义事。我见到该书是选录本，近据作者故乡杨宝霖教授函告，该书曾被收入《南社谢氏族谱》(不分卷，康熙钞本)中，看来无论是选录本或是钞本，都是印数少，流传不广。

从以上介绍的几种明清时期广东珍稀散文笔记

及其他种类笔记来看，其所提供的历史资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 清初广东抗清斗争和“迁海”资料。清初清政府实行文化思想禁锢，规定所有著述悉要依《明史》和《四库全书》的编纂原则，对违碍禁令的人事，悉需铲版删除，如抗清人物和事迹等。而《离乱见闻录》却详细记述广东东南地区的抗清斗争，《华衮手记》详细记述“迁海”的经过和人民群众反抗“迁海”的斗争，弥足珍贵。屈大均撰《广东新语》也记述清初“迁海”的情况，但记述因“迁海”而死亡的人数，就不够具体和准确。

2. 经济史料。一般来说，正史如明清的《食货志》记述的都是带有全国性的典型资料，就是广东的地方志有时记述经济史料也不具体。《离乱见闻录》记载明末清初闽广间的长途贩运贸易、洋货销售、市镇盛衰、币值变动、物价升降以及梅绿和澳门的贸易等。《华衮手记》和《吉康治乱记》记载惠潮梅地区赋役、田价、物价以及采矿等，都非常具体，可作为正史的补充。

3. 典章制度方面。如屈大均撰《广东新语》记载的田制——沙田、弥田、坑田、旱田、潮田、卤田等，《离乱见闻录》记载的赋役征派、黄册的编制和接送等，都非常具体，完全可补史乘之缺失。

4. 阶级斗争方面。明末清初广东的奴仆、佃户起义，是历史上重大的事件。正史常忽略不载，只有各县志有所记载。但似《甲申南社乡寇变纪略》专门详细地记述崇祯十六年东莞、新会等地奴仆、佃户起义的笔记，给我们提供了十分具体生动的研究个案，还是十分少见的，弥觉珍贵。

此外，人物传记，如《粤大记》、《粤小记》等都有历史人物传记、特别是文人轶事的记载。同时，社会风尚方面，如《雷州记》就论述了雷州语言风俗、物产胜迹等。在此就不再一一介绍。

自然，整个明清时期广东的散文笔记所包含的历史资料是非常丰富的，决不止上述这些方面。

由于明清时期广东的散文笔记内容庞杂，泥沙

和珍珠并存，因而利用它，首先要注意弄清资料的背景及文字的含义。如赵翼撰《檐曝杂记·广东蛋船》载：“广州珠江蛋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猝难禁也。蛋户本海边捕鱼为业，能入海挺枪杀巨鱼，其人例不陆处。脂粉为生者亦以船为家，故冒其名，实非真蛋船也。珠江甚阔，蛋船所聚，长七、八里，列十数层，皆植木以架船，虽大风浪不动。中空水街，小船数百，往来其间，客之上蛋船者，皆由小船渡。……七、八千船，每曰皆有客，小船之绕行水街者，卖果食香品，竟夜不绝也。余守广州时，制府尝命余禁之，余谓此风由来已久，每船十余人，恃以衣食，一旦绝其生计，令此七八万人何处得食？且缠头皆富人，亦哀多益寡之一道也，事遂已”。有人据此认为：“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广州珠江蛋船中的普通脂粉手工业作坊是相当发展的，每船有十余人‘恃以衣食’，‘缠头’则‘皆富人’，一共七、八千船，达七、八万人之多。这里存在着资本主义因素是毫无疑问的。”^⑩其实这里的“脂粉”，指的是出卖肉体的妓女生涯，非制造脂粉者，因为无论制造脂粉者或“绕水街者”，皆无需禁，“客”指嫖客，才要禁止。关于清初珠江河畔蛋船妓女生活，清张心泰撰《粤游小识》卷三有详细的描写，可以佐证。由于不理解，未弄清“脂粉”的含义，就贸然下结论说这里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自然是错误的。其次，对有疑问的材料必需考订而后利用，不然，就容易上当。如明郭棐撰《粤大记》卷二十四《李文儒传》，黄国声教授经过研究后指出是全抄黄佐《广东通志》的，“黄志中有一段论述文儒为岭南节度使孔戣记室，时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文儒请于孔戣优礼之，每月给送使钱。韩愈谢不肯受。所据为韩愈的《潮州谢孔大夫状》，事实确凿无疑。而《粤大

记》则改‘韩愈谢不肯受’作‘文儒谢不受’，遂致事实不符，情理大悖”。^⑪如果不考订，据《粤大记》所述，自然错误。此外，明清广东散文笔记存在着不少志怪迷信、天命、轮回、因果报应等封建内容，阅读时自应分析、批判。

①关于笔记的分类，过去《四库全书总目》把其编入史部杂史、子部杂家、子部小说家三类，这种单纯根据文体的分类法，早已有人指出，并不完全科学。近人刘叶秋同志把笔记分为三大类：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考据、辨证类。这种分类，正如作者所说：“笔记一体，本来就以‘杂’见称，一书之中，往往兼有各类……，这样为之分类，就不免有顾此失彼之感”。（见《历代笔记概述》第4页，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这是事实，我认为根据文体及内容的倾向而言，这一分类仍旧可以。正如冯尔康教授指出：“比前人大大前进一步，摆脱了四部分类法，把古代笔记体图籍真正归为一门，并给予较合理的分类”。（见《清史料学初稿》第239页，1986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因此，本文采用这种分类法。

②见《岭海见闻·前言》，载《岭海见闻》，1992年广东高教出版社出版。

③清阮元《广东通志》第三册，卷一九四，艺文略六。

④见范德玉《粤中见闻序》，载《粤中见闻》，1988年广东高教出版社出版。

⑤《历代笔记概述》第5页。

⑥参见李龙潜、陈忠烈撰《评介郑之侨〈农桑易知录〉》一文，已收入《广东农史研究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即将出版。

⑦《咸丰顺德县志》卷二四，列传四。

⑧《广东文物》卷六。

⑨《履园丛话》扉页：《履园丛话序目》。

⑩参见《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编，第485页。

⑪黄国声撰《粤大记·前言》，载《粤大记》，1998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郭秀文

求真存实 开拓创新

——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

陈金龙

(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31)

〔中图分类号〕B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326 (2001) 03- 0086- 03

中山大学教授吴义雄博士的新著《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 最近已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初读全书, 掩卷凝思, 笔者深感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称道和肯定:

一、选题的拓荒性。长期以来, 国内学术界对于传教士在华的活动, 一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考其原因, 一方面或许是这个课题比较敏感, 难以把握。在人们的印象中, 当年传教士是随着洋枪洋炮进入中国的, 他们从事的活动不免带上了侵略的色彩, 这就使人们对于传教士在华的活动容易采取一种简单回避或否定的态度; 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有关资料的散失和缺乏。由于种种原因, 晚清的中国文人一般很少提及传教士的活动, 而教会机构对此的记载主要为内部材料, 大多使用英语, 并且由于年代久远或已流散国外, 或已破旧不堪, 这就给研究工作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幸的是,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研究, 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并陆续推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 有些是资料的整理汇编, 有些是翻译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 有些是散见于各学术刊物的单篇论文, 也有以传教士为研究对象的学

术专著。这些研究成果, 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应当看到,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 由于资料条件的限制, 对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 要么语焉不详, 对历史的真实缺乏细致的梳理; 要么浅尝辄止, 对一些表面事实背后的内在联系缺乏深入的探讨, 甚至有不少以讹传讹之处。

就西方学者和宗教界人士对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播问题的研究情况来看, 尽管资料较全, 起步较早, 且论著较多, 但对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活动的研究, 仍存在若干缺陷。比如, 各种论著对早期新教在华传教的整体情势和演变趋势尚未作出清楚的说明; 对新教传教士在华所开办的各项事业, 还局限于片段的或局部的了解; 对他们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外关系演变过程中思想与活动的认识, 也有待深化; 对他们学术文化活动的思想背景, 缺乏应有的介绍; 对他们文化活动的演变过程和一些具体方面, 研究也很不充分。而且,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 西方学者研究这段历史时所持的原则和方法, 也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①

基督教新教自 1807 年传入我国至今, 已有 190 多年的历史, 而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 是其在华活动之始。不了解这一段历史, 就无法说

明新教在华活动的全貌，也没法说明后续各阶段传教士的思想和活动的历史背景。因此，这是一个急待拓展的领域，也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吴义雄教授此书正是选择了这一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该书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早期活动的几个主要方面的基本史实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新教传教士这个特殊群体的各种活动对近代中国社会和中西关系的诸方面所产生的独特影响，揭示了早期新教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一般规律。就其选题而言，无疑是一项开拓性的研究，填补了学术界的空白，由此也奠定了其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

二、史料的翔实性。研究历史必须详尽地占有历史资料并进行具体分析，然后才有可能从中引出科学的结论。近些年来，制约传教士研究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不易获得新材料。吴氏此书之所以能有所突破和创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运用了大量国外的档案材料和书刊文献，在资料上有比较大的突破和更新。20世纪90年代，吴义雄先生有两次赴美访问研究的机会。访问期间，他查考了传教差会的档案，传教士的日记、信件，传教士的著作，当时的宗教期刊，以及后代教会人士所修史书，现代学者的相关研究论著，等等。从书后所附英文参考书目来看，作者查阅的差会档案、宗教期刊、各种著述就有100多种，书中所引用的史料，80%来源于这些英文资料。这些史料，国内学界很难有机会获取和研读，有一部分资料更是闻所未闻。同时，对于内地和港台的相关资料，以及传教士的中文著述和所办的中文期刊，作者也进行了广泛的涉猎和收集，参考和征引的书目也达70多种。应当说，作者是在占有丰富而翔实的史料之后才展开研究的。唯其如此，该书的不少内容能给读者以面目一新之感。

比如，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的学者，都深知英文《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的史料价值，但真正要利用起来，却不那么容易，没有浓

厚的史学功底和较好的英文水平，是难以企望的。吴义雄先生在研究过程中，则通读了20卷《中国丛报》的全部内容，从中获取了不少极为珍贵的史料，也使一些历史疑难问题得以迎刃而解。例如，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中，马礼逊教育会与马礼逊学校、“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和“中国医务传道会”等，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机构，但其具体情况如何，它们的开端、演变、结局怎样，史学界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交代。吴义雄先生则以《中国丛报》各卷刊载的有关这些机构的文献资料为主，并参考其他相关材料，对这些机构的来龙去脉作了详尽的考察，为中西文化交流史增添了新的内容。^②

又如，关于英美传教士之间的“译名之争”，以往学界很少提及。该书依据美部会的文件、《中国丛报》、《印中搜讯》(The Indo-Chinese Gleaner)等宗教期刊所载文献和其他著述，对“译名之争”作出了清晰的说明，使英文资料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但是，史料并不等于史实，由于假史料和错史料大量存在，史料种类、数量越多，应用史料就越应该慎重。有鉴于此，该书在占有丰富史料的基础之上，又对史料进行了分析对比、研究整理和辨别真伪，做了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力求准确而恰当地运用史料。由于史料确凿而又充分，该书读起来令人感到可信、真实。

三、论述的科学性。广泛搜集和占有史料，固然是历史研究的前提，但研究的结果如何，还取决于治史者的主观认识能力。吴氏此书，虽引用了大量史料，但它绝对不是史料的简单堆砌和陈列，而是以史料为依据，通过对史料的透辟分析和研究，得出了许多精审之论，由此也折射出作者的史识和眼力。具体说来，该书在论述上有以下几点独到之处：

其一，把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置于唐代以来基督教与天主教在华传播、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这一宗教背景之下来分析，放在资本主义在近代欧美的兴

起、地理大发现后西方的殖民扩张及 19 世纪初期的中外关系状况这一世界大背景之下来考察,而没有就史论史,就传教论传教,孤立地考察问题。该书的作者从这一特定的视角入手来论述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有高屋建瓴之效,为客观、公正评价新教传教士的活动奠定了基础,由此也显示出作者立意的创新和视野的开阔。

其二,该书的论述做到了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该书依据丰富的史料,对一些微观的历史问题,作了全面、详实的解说。如马礼逊的传教活动和“恒河外方传道团”的成立,美部会对华传教活动的酝酿和裨治文、史第芬、伯驾、卫三畏在华南沿海的传教活动,郭士立的沿海传教活动、传教观点和福汉会的活动,叔未士、罗孝全的传教活动,中法三次传教问题谈判,新教传教士论鸦片贸易及对鸦片战争的态度,伯驾、裨治文与美国对华交涉,雅裨理与娄礼华私闯漳州和娄礼华命案,罗孝全索赔事件,英华书院的开办及其历史影响,新教传教士的译经活动,新教传教士的中文著述,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新教传教士与早期西方汉学,等等,论述非常透彻,使读者对这些历史活动、历史事件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另一方面,对一些关乎传教士研究的宏观问题,作者站在新的高度,作出了大胆的分析 and 合理的推断。如作者认为,从 1807 年伦敦会的马礼逊到广州,至 1851 年新教传教士所办的《中国丛报》停刊,是近代新教在华传教运动以广州为中心的阶段。1851 年后,传教活动的中心北移到上海。故此,该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 1807—1851 年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传教活动。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传教活动中心的北移呢?作者作出了如下分析:从传教活动的角度而言,江浙地区的地理环境比较优越;从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中外商业贸易的中心从华南沿海逐渐北移到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传教士们对广州的人文环境感到不满。^③也许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不是问题的全部,但在目前看来,这种分析和判

断是合乎历史的。

再如,作者在书中,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作出了总的评价,认为如果从吸收中国信徒这一衡量传教活动成绩的重要指标来看,这一时期新教传教士所取得的成果是微不足道的。但这一时期新教传教士留给以后在中国活动的传教士的遗产,不在于征服了多少中国“异教徒”,而在于他们于各口岸建立了传教系统,摸索出了一套传教方法和经验,在于造就了传教运动的权威和培养了传教运动的精英。^④

其三,该书的立论既不囿于旧说,又不回避敏感问题,论述客观、公允。例如,究竟怎样看待传教运动与西方殖民侵略势力的关系,是每一个研究传教士的学者不能回避的问题。该书既不简单地把传教运动看成是西方殖民侵略的工具,也不断然否定传教运动与强权政治之间的关联。作者认为,以传播基督教新教为职志的传教士,职业决定了他们必然与清廷的限制政策产生冲突,而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与殖民侵略势力结盟,从宗教的目的出发而与后者互相利用,否则他们就难以获得有利的传教环境和条件。因此,传教士的宗教使命必然会导致他们与强权政治的结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教士与他们的政府有一种实际上的共谋关系,并不意味着传教士的派遣属于一种政治计划。^⑤也就是说,早期新教传教士来华传教,纯粹是一种宗教行为而非政治计划,尽管传教士与强权政治有结盟,但这种结盟产生于来华之后而不是形成于来华之前。

四、态度的严谨性。在职业道德滑坡的今天,学风也不免受到影响。吴氏此书,还有一点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作者治学态度的严谨。本来,以上所述已足以表明作者治学的风格和态度。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方面值得学界推崇。比如,作者在开篇即系统回顾、介绍了 100 多年来中外学术界、宗教界有关本课题的研究情况,没有为了提升该书的学术价值而讳言前人的学术成果。(下转第 96 页)

•文学 语言学•

唐代文学史的编撰：历史与现状

董乃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000)

[摘要] 本文认为断代文学史与文学通史都属于综合性文学史, 前者一般由割截后者而成, 但却比后者具有更强的专业性, 能更多更深地反映文学史专题研究的成果。文章回溯了唐代文学史研究发展演变的历史, 并通过对近年出版的五部有代表性的唐代文学史著作的评述, 阐述了断代文学史的基本性质、学术要求和它们所可能具备的特色。

[关键词] 文学通史 断代文学史 唐代文学史 专业性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1) 03-0089-08

一

“唐代文学史”是断代文学史的一种, 所以回溯唐代文学史编撰工作的历史、论析其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还需从为断代文学史正名说起。

这里所说的断代文学史, 是指与通史性质一致的综合性文学史, 即它们所述所论不限于某一种文体而涉及各种文学体裁、各类作家, 它们与通史的区别, 最显眼而又根本的, 是在于叙述的时间范围上一个“通”一个“断”而已。像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鲁迅的《汉文学史纲》, 就是两部产生年代较早的著名断代文学史。^①断代文学史毕竟是从文学通史的整体上割截下来的, 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反过来, 将断代文学史相连缀, 也就可以成为一部文学通史。鲁迅在厦门大学的《中国文学史》课程没有完成, 已写出的部分讲义就成了断代文学史; 新时期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编撰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原曾取名为《中国大文学史》), 实际上也就是十部断代文学

史的汇集。

我们现在所见的断代文学史多是以朝代, 如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来划分的。^②文学的发展演变, 犹如一条滔滔长河, 照理是不应切割的, 而且文学的演化并不与朝代的变迁同步, 那么, 通常所见的按王朝更替把它分为几段, 成为断代文学史, 这是合理的吗? 可取的吗? 这就关乎断代文学史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问题了。

对这个问题, 钱钟书先生曾有所论述, 他的观点见于《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文。^③该文针对当时有人“力非文学史之区划时期”, 说道: “夫文学史之时期, 自不能界域分明, 有同匡格; 然而作者之宗风习尚, 相革相承, 潜移默化, 固可标举其大者著者而区别之。”这是一种很通达的观点, 要旨在于: 文学史之分期当然不是绝对的死板的, 但就“作者之宗风习尚”的沿革演变来看, 分期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分期虽不必“界域分明, 有同匡格”, 但从文学风尚的递嬗试为分期, 还是可行的, 分期自

需建筑在研究的基础上，其本身也就是一种研究的成果。那么，对于大体依王朝更迭为文学史的做法又该如何看呢？钱先生继续写道：

且断代为文学史，亦自有说。吾国易代之际，均事兵战，丧乱弘多，朝野颠覆，茫茫浩劫，玉石昆冈，惘惘生存，丘山华屋。当此之时，人奋于武，未暇修文，词章亦以少少衰息矣。天下既定于一，民得休息，久乱得治，久分得合，相与燕忻其私，而在上者又往往欲润色鸿业，增饰承平，此时之民族心理，别成一段落，所谓兴朝气象，与叔季性情，迥乎不同，而遗老逸民，富于故国之思者，身世飘零之感，宇宙摇落之悲，百端交集，发为诗文，哀愤之思，惨若风霜，憔悴之音，托于环珞；苞粮黍离之什，旨乱而词隐，别拓一新境地。赵翼《题梅村集》所云：“国家不幸诗人幸，说到沧桑语便工”，文学之于鼎革有关，断然可识矣。夫断代分期，皆为著书之便；而星霜改换，乃天时运行之故。不关人事，无裨文风，与其分为上古、中古或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何如汉魏唐宋，断从朝代乎？

这就是说，文学风貌与社会变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像朝代更迭这样的大事，自不能不给文学以多方面的影响。文学史之由唐至宋，既有文学内部的沿革演变，又与朝代的兴替（关键是与这种兴替紧密相关的社会生活和人民心理的深刻变迁）分不开。所以，文学史如不分期则已，如若要分，那么与其按自然时序百年一个世纪或数世纪为一大段来分，还不如按朝代的替革来分为好。这样就把文学史的断代与中国历史的习惯分期对应起来了，文学史本来就是历史（尤其是文化史）的一部分，这种做法与文学史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位置，也是相称的。所以，依王朝的更替来划分文学史段落，不仅用于断代文学史，即在文学通史的编撰中，也一直沿用下来，目前似乎尚无公认的更好办法可以取代它。

断代文学史既是文学通史的一截，那么在文学通史之外又出来个断代文学史，必要性何在呢？或

者说，断代文学史有哪些文学通史所不具备的特点呢？

关键就在于断代文学史具有比文学通史更强的专业性，是一种更专门的文学史。它所叙述的时间短了，但内容则向深细方面拓展，深入到文学通史受体制限制所不能涉及的许多方面。文学通史无论是作为大学教科书还是作为一般的知识性读物，它的篇幅总是有限的，在这有限的篇幅中要包容各个朝代，每个朝代能够分配到的份额都不会多，至少不可能比一部单独的断代文学史多。篇幅的限制决定了编写的方针，能够进入文学通史的自然只能是更为重要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因为通史的参照系是上下数千年许多朝代的文学成就，而断代文学史则是在一代之中作比较和选择，作家作品的入史标准自然就比通史要宽。从某种意义上说，断代文学史与文学通史的关系就是断代史与通史的关系，亦如区域文学史之于文学通史，就像地方志之于国史的关系一样。断代文学史是缩短了文学通史，地方志则是缩小了的国史。方志可以而且应该更详尽更细致地把一个地区的山川、物产、历史沿革、民情风俗和历代人物写入书中，正如断代文学史可以写入更多的作家作品和文学事件而这些内容在国史和文学通史中却不一定都有位置。

不妨略举实例说明之。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初版）是一部内容很丰富充实的通史，它的魏晋南北朝（含隋）部分占四章，分量已然不轻。从内容看，它以一章篇幅述当时文学思潮，涉及文学理论的建设 and 神怪小说的兴起等，又以一章述魏晋诗人，一章述宋齐梁陈及隋的诗风，一章专述南北朝民歌，可以看出它一方面汲取了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优长，一方面又因文学观念的演进而有所发展。但刘师培书作为一部总篇幅不长的断代文学史，却仍有许多刘大杰通史所无法涵盖的内容，尤其是对于魏晋至陈文学家有关史料巨细不遗的勾稽和对文笔说、声律论的专门讨论，更是断代史之特长，而为通史所难以效法。若再与后起

的《魏晋文学史》(徐公持编著,1999年)、《南北朝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编著,1991年)相比,二者的区别就更大了。两部断代史合共83万字,是刘大杰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部分的九倍多,篇幅差距如此,其叙论的详略粗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史专业性之强弱,自然不会很小,而之所以有如此区别,即源于二者史体的不同。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是这样,其他各段文学史断代写法与通史写法的区别,大致也是这样。

由于史体不同、所述历史时间长短不同,断代文学史在内容上要比文学通史专精。由此亦可推知,断代文学史若再作分体的处理,由于进一步根据文体对所述论的范围作了限制,其内容就必然要比断代文学史更为专精。从文学通史到文学断代史到各类文体的断代文学史,时限愈严、范围愈窄而所述论则愈专愈精愈深,这是文学史学科发展进程中的明显趋势。

二

现在我们来看看唐代文学史的发展演变情况。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最早的稍具文学史意味的唐代文学论著,是朱炳熙编写的《唐代文学概论》。^④此书除极简单粗略地谈到唐代文学发达的原因,唐代文学的特点、派别和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外,主要是分体介绍唐文学,文、诗、词、小说及其他艺术。全书10万字左右,不但所述粗疏,所论尤为随意,科学性非常薄弱。然而,此书不可忽视的地方在于,它已经提出了此后直至今日新写的唐代文学史仍然不可不考虑的几大根本问题,在这一点上,该书作者表现出他的敏感,虽则他的解答不能令我们满意。

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朴安、胡怀琛兄弟合编的《唐代文学》,内容简略粗浅。直到40年代出版的几种唐代文学史,如陈子展在1944年后出版的《唐代文学史》,^⑤依然如此。不过,此书虽然短小,却已具断代文学史的雏形。它以概论性的“说到唐代文学”开篇,以下讲唐诗,即以初、盛、中、

晚分为四章,显然是以时序为线索来叙述。同时辅之以文体的分述,再列出古文运动、唐人小说、唐五代词人等章。从体例上看,已可说是后来唐代文学史的具体而微。

进入5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有渐成显学之趋势,可是,唐代文学史的专著仍然十分罕见,就我们所见到的这一时期的正式出版物,似乎惟有周祖谟《隋唐五代文学史》^⑥一种。此书所述的时限从杨隋到五代,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阶段。其体例已完全是“史”的规模,除开篇的一章概论外,其余四章为隋及初唐文学、盛唐文学、中唐文学、晚唐五代文学,在每一段中包含各类作家(诗人当然是主体),不再因某些文体而另辟新章,而只在各章中设节。作者处理时代与文体两者关系的原则显然是先时代而后文体的,这就使本书成为规范的断代文学史。

本书字数不多,仅18万,但内容相当充实,虽非面面俱到,但凡有所述论均颇详明,尤重艺术分析。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观点往往不同俗,而敢于独树一帜。如对王维的田园诗,当时一般观点是评价不高,此书却说:“尽管王维不是一个真正的农民,没有理解农民在官僚地主压迫下的痛苦生活,但无论如何他已经认识到在那种社会里,只有农民和自然生活才是真正美的。”“评价他的一些诗,不应该从它有无揭露了社会矛盾或作者有无斗争性去理解,应该从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形象带给读者的美的感受和体现在这些诗中的内容对于过滤读者脑海中的庸俗思想的作用来理解。”作者很正确地抓住了文学审美功能和对人的潜移默化作用来衡量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最后甚至喊出这样的话:“让庸俗社会者去否定这些诗篇吧,这些诗篇也决不因他们的否定而丧失其应有的价值。”^⑦由此可以察知本书作者对其时甚为风靡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极为反感。

60、70年代的中国,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被紧缚于政治,断代文学史的写作也颇萧条,直到“文革”

结束，拨乱反正，情况才有所变化。随着“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著述再一次成为学术热点，唐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编著，在这次热潮中，成绩更是突出。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几年中，一下子涌现出好几部分量远超前人的唐代文学史。兹略按出版先后排列：

《天宝文学编年史》，熊笃编著，重庆出版社 1987 年。

《隋唐五代文学史》，罗宗强、郝世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上卷，1993 年 3 月；中卷，1994 年；下卷，待出。

《唐代文学流变史》，李从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

《唐代文学史》，上卷，乔象钟、陈铁民主编，下卷，吴庚舜、董乃斌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年。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傅璇琮主编，辽海出版社 1998 年。

这些著作一个显眼的共同特点是篇幅都比以往同类著作大大加长。其中《天宝文学编年史》仅述天宝一朝 15 年的文学，字数已为 15 万。《隋唐五代文学史》仅上、中二卷，述至中唐，已近 70 万字。《唐代文学流变史》50 万字。《唐代文学史》上下卷字数过 100 万。最长的是四卷本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达到 250 万字。这些新出之书之所以篇幅扩大，主要是在资料的引用数量和剖析的详细上有很大进展所致，这就使唐代文学史的专业性和学术性有了明显的提高。专业性和学术性的提高，是这些著作的共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们与 30、40 年代带有普及性的唐代文学史著作区别了开来。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关于唐代文学发展演变之时代文化背景。

在普及性读物中，这一内容也必须涉及，但往往是概括言之一带而过，而在专业性的文学史著作中，就需要详细、周到和具体，要更多地利用史学

研究的成果，甚至在某些方面补充、发展史学的工作。如乔象钟、陈铁民、吴庚舜、董乃斌等集体编著的两卷本《唐代文学史》，除在“唐代文学总论”一章论述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时谈到经济发达、政治开明、文化多元、思想自由和中外文化交流互动等情况以外，在初、盛、中、晚各大段落乃至一些有特殊意义的时期（如大历、贞元至大中、咸通至天祐、五代十国等），也都紧扣文学发展状况安排了专论背景的文字。在这些叙述中，注意了史学成果的利用，如对中晚唐政治和社会重重矛盾的分析，对这一阶段虽战乱频繁而生产和经济状况在某些地方仍有所上升的揭示。而有的问题史学界尚有争议，如牛李党争的实质与是非等，唐代文学史则通过对一系列作家与党争关系的剖析发表了看法，推动了这一问题的研究。

二、关于文学思潮和流派。

普及性读物较少或者并不涉及这个方面，但却是专业文学史用力的一大重点。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它在初唐即设“文学思想的发展”一章，至盛、中唐则列有士人精神面貌（士风）、文学观念变化、文体文风改革的理论等章节。这说明了它对文学思潮变化的重视。其叙盛唐诗歌，有意打破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之类传统提法，把研究诗歌的题材视角改变为风格、意象和审美效应视角，从而做出了崭新的概括。如它把王维、孟浩然及其周围或风格相近的诗人（如常建、储光羲、綦毋潜、卢象、丘为、阎防等）称为“一个以人与自然为题，追求静逸明秀之美的诗人群落”，把王昌龄、李颀、王之涣，崔颢、高适、岑参等人统称为“寄热望于人间世的诗人”，然后又按“追求雄健旷放的清刚之美”、“追求慷慨苍凉的豪壮美”、“追求奇峭俊逸的壮丽美”将他们分为三种类型，实际上也就是三个流派。该书对文学思潮的来龙去脉，渊源流变，对不同风格流派的构成及其特色，都花费了很多笔墨，成为它的一大特色。

三、关于作家创作道路和作品艺术鉴赏。

无论是在普及性的还是专业性强的断代文学史中,这都是构成著作的主体部分。但在前者,叙作家生平,往往限于摘抄史传所载的宦历游踪;叙其创作成就,则常常是引出几首著名作品以示例而已。而在后者,这两方面的内容都大大扩充和深化,由原先的简叙生平发展为系统评述创作道路,即结合作家的生活遭际论析其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的演变,以及创作重心的转移和个人风格从形成到定型的过程等等。断代文学史中某些大作家的章节,往往篇幅颇长,叙述全面而深细,或对这位作家进行分期剖析,或对其作品进行分类批评,不啻这位作家的文学专传。与此相关,对于他们代表作品的引用数量和艺术分析,也大大增多加深。

试看社科院文学所《唐代文学史》的杜甫章,在这部断代文学史中,杜甫与李白、白居易三位每人占了两章,算是第一等大作家。杜甫两章四节共4.2万字(李白的字数相当)。第一节述其生平和创作道路。第二节为杜甫诗文的思想内容,径引诗句加上未引句子而概括介绍诗文内容的,共有46处,用“居中引”的办法列出杜诗杜文较长段落进行分析评论的,有16处。第三节论杜诗艺术,引述杜诗31处,具体地论析了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内涵和原因、杜诗风格的多样性、杜诗所塑造的自我形象和其他人物形象、杜诗对“赋”法的运用、杜诗的议论特色及其抒情性,还有杜诗在形式和语言锤炼上的成就,等等,可以说非常全面而细致。最后一节论杜甫的影响和历代的杜甫研究,则涉及中晚唐和宋以来大量古人对杜诗整理研究的成果,几乎是一篇杜诗学简史。像这样的写法,是只有专业性更强的断代文学史才允许和能够做到,而为一般通史和普及性读物所不能或不需的。这也就成了断代文学史独立存在的重要依据。

四、关于文学创作和文学史规律的阐释和探讨。

近年新出的几种唐代文学史在这方面都树立了较高鹄的,用力较勤,探索较深,这也是它们专业性较强的一种表现。

例如,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有“盛唐诗人的精神风貌”一章,鲜明描绘了盛唐士人的强烈入世精神和基于自信、自负、人格独立而产生的豪纵傲世姿态,并论证了这种精神、姿态与儒、道、禅思想及游侠风气的关系,特别是精辟地论述了士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以及他们精神世界内部的深刻矛盾。其文云:当时士子不欲入世则罢,倘欲入世且有所作为,则唯有求仕为宦一途,而只要走上此途,无论是否真能进入官场朝廷,就都将某种程度地改变或压抑自己的人格。“他们之中,有的因此而完全异化为皇权的工具,有的媚附权要,多数是辗转奔突于难以自解的精神苦闷之中,或是发扬蹈厉、挥斥幽愤,或是随缘任运,寄情自然。……当他们通过诗的渠道把自己的追求、奋争与矛盾、烦恼宣泄出来的时候,盛唐文学的主体色彩,也就这样形成了。”^⑧这里的论析呼应了前文对盛唐文学特色的描绘,把唐代社会体制、士人生活道路和复杂心态与盛唐文学精神联系起来,实际上就从人与文学的关系这个角度切入了文学与文学史发展的规律。这一论述对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特征的认识都有所启发。类似的论述在罗、郝二氏主编的文学史中还有多处。

李从军《唐代文学流变史》更以恩格斯《反杜林论》关于思维的任务是揭示历史过程内在规律性的论述为指导,将全书根本宗旨归结于探索规律,明确宣布:其书“旨在反映唐代文学与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关系;唐代文学不同时期的作家、流派、作品的文学倾向和文学思潮;各个时代文学的风貌特征及演变状态;文学对社会生活及社会现象的反映和作用;文学和其他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之间的联系;文学创作者与现实生活、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唐代文学总体演变和发展趋势,并力求从中探讨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⑨由于作者

持此目标,故对唐代文学从分期到特征的概括、到具体作家的述评,均紧扣揭示规律性这一主题。

对规律性的探讨,带有科学试验从已知事实向未知领域挺进的性质,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断代文学史在这方面的收获尽管还是初步的,其观点和结论尽管尚需接受检验和不断修正,但这一努力已使这类著作的理论品位大大提高。

三

以上,对近年出版的诸种唐代文学史的主要共同点作了分析,由此也可大致窥见文学史断代研究与专书著作的性质及其学术要求。当然,这几种唐代文学史又各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

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上、中册),还有三个明显特点应予注意:一是有意与文论史相融合,将文学思潮、文学批评和一代文学创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作历史的考察,从而增加了理论观点的厚实程度。这与主编之一的罗宗强先生对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曾作过专门系统的研究有关。二是行文有气,笔端常带感情,因而颇富个性色彩,一般集体合作的文学史不易臻此。三是注释详尽,附载了大量为进一步研究所必需的资料,凡有争议的问题则尽量将各家观点客观介绍,以为进一步深入探讨之基础。这也是这部文学史专业性、学术性较强的表现。

李从军的《唐代文学流变史》无论章节编排还是文字表达,都刻意打破传统文学史模式。就其理论色彩之浓而言,可称它是一部史论体的文学史;就其各章节标题的恢诡、行文的挥洒而言,又不妨视之为杂感随想式的文学史。这两点在文学史撰写史上都颇具创新的意义。如果说有什么不足,那就是本书的操作方式基本上还是运用先有和外在的各种中外理论于唐代文学,论述的结果是证明唐代文学的发展演变与那些理论相符,大体不出那些理论的范围,所以,此书的分析更多的属于印证和演绎。不能否认这种论证的意义,也许这是走向独立理论创造的必经之途,但更高的境界毕竟应是从唐

代文学的实际出发,从唐代文学本身提炼出切合其真实状况的规律性认识。应该说,唐代文学的丰富多彩及其发展中的曲折变化,是为这种理论抽绎提供了充足条件的。如果研究者所获得的认识只适合于唐代文学,那是唐代文学的特殊规律;倘若它的涵盖面更广,对认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都有效,那就有可能上升为更高一层的规律性认识。对于一切有志于作理论探索的文学史研究,这是一个值得下功夫追求的目标。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同人合著的两卷本《唐代文学史》规模宏大,涉及面广,写入了一般文学通史所不载的许多人物,对唐散文家、小说家创作成就和俗文学状况的介绍也比一般通史丰富得多。这样就大大扩展了文学史的视野和容量。又有意识地从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唐代文学家生平游踪的考订、唐集的整理笺释、敦煌文献的解读以及对唐代社会、文化、民俗的系统研究中汲取最新成果,使本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学术水平。

下面谈谈两部编年体的唐代文学史。

两部编年体唐代文学史虽大小悬殊,但各有其贡献。熊笃《天宝文学编年史》虽仅述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年)的文学,但具有开创之功。

全书以作家游踪和创作活动为主,每年按每人一条列出若干人,如天宝元年十条即叙述了王之涣、王维、崔颢、高适、李白、储光羲、杜甫、岑参、萧颖士、贾至等10位作家,以后各年有所变动增损,共记述了30位作家,而王维、王昌龄、高、岑、李、杜自是主角。叙述中颇注意彼此的关连,有意将作家交游编织成网;对作家往昔有关行事和作品,则予以回溯,并引出代表作加以品评赏析。有些安排颇见匠心,如天宝五年(746年),是诗人李颀在本书中第二次出场,史文较长,先述其在洛阳听董庭兰奏《胡笳弄》,作《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诗,遂引此诗全文论析之;接叙“李颀是盛唐诗人中善于描写音乐的能手”,又引出作年不明的《琴歌》和《听安万善吹箎歌》,云“三诗虽

同写音乐，却春兰秋菊，各尽其妙。”下面又引出他的好友綦毋潜，简介了綦的生平、仕历，引述了李颀给他的赠诗，一直叙到綦赴周至尉之前去终南山访储光羲时的赠诗（亦引出全文）。这样就使本书对作家的描叙血肉丰满，比较生动。本书除充分利用前人和同行研究成果外，亦有作者自己的考证所得（如王维生年），尤以史述与文学性赏析结合得较好为特色。若论其不足之处，则其一、所写年限过短，尚难以看出盛唐文学的总貌，单个作家的行踪介绍也欠完整；其二、全以作家列目，而缺少其他性质（如有关政治、经济与文化艺术其他门类、中外交流等）的条目，仍留有作家年谱之拆散重编的痕迹，显得视野不够开阔。

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比熊著晚出10年，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可供参考，且以多位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合力编成，所述时间下及五代宋初，达360年之久（618—978年），是一部体大思精、资料丰富、考据详实的专著，代表了当前这一领域的最新成就。

此书编者对编年体史书的特点和优势有充分的自觉。主编在《自序》中写道：“研究文学确实应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所谓整体，包括文学作为独立的实体的存在，还包括不同流派、不同地区可能互相排斥而实际又互相渗透的作家群，以及作家所受社会生活和时代思潮的影响。这样做，就会牵涉到总的研究观念的改变。”^⑩为了在研究中贯彻这种整体性原则，为了克服前此大量章节体文学史所暴露出来的共同弊病，这才想到了“逐年地作综合记录，把政治发展、经济改革、人们思想情绪的变化、作家们复杂多样的经历及其创作活动，作总体、流动的考察”这样的编年体模式。具体到唐代文学史，便是“把唐朝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动（如生卒、历官、漫游等），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往，文学上重要问题的争论，以及与文学邻近的艺术样式如音乐、舞蹈、绘画以及印刷等门类的发展，扩而大之如宗教活动、社会风尚等等，择取有代表性

的资料，一年一年编排”，^⑪从而使文学史成为一幅“立体交叉”的生动活泼的图景。

资料数量的丰富和胪列原始材料以考证的方法，特别是全书客观冷静、不加评鹭更不作描绘渲染的著录方式，使这部文学史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由于是纲目体的编年纪事，又由于有足够的篇幅，本书所涉及的人物、作品、现象和事件在同类著作中是最多最广的，表现出一种非常宏阔的视野。

这部断代文学史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值得提出的是它标志着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范型新的深刻变化。中国文学史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表现了愈来愈清晰、科学的文学观念，把许多原先被传统文学观藐视和排斥的文体，如词曲、小说、戏剧和通俗文学等，请进了文学史，并给以崇高地位。然而，同时也将一些在历史上曾受到重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学作家和作品排除出了文学史，发生了削中国古代文学之足以适西方现代文学观之履的弊病。经过近年来的痛苦反思，愈来愈多的文学史家认识到加强文学观的科学性、努力使我们的文学观与国际同行沟通甚至接轨固属必要，但尊重中国文学的历史事实，把我们的文学观念和理论建筑在本国文学史的事实之上，则尤其重要。不强用今人的文学审美取向去硬套古代作品，惟有这样，方能写出全面真实反映中国文学实际的文学史。《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所持的正是这种经过近代文论洗礼的新的文学史观，它尊重唐人的文学观，彼时普遍观念所视为文学者，本书多予采录，并不因其不合近数十年来通用之所谓纯文学标准而简单排斥。在本书中诗歌与诗人活动自然仍是重镇，并且不以将载录范围扩大到传奇小说和通俗文学为满足，而是把当时若干虽具实用性而不失美感的文章（包括骈散二体）和善写此类文章的作家也都尽量记入，从而以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唐代文学的巨大繁荣。

唐代文学史研究在近年的成就是可喜的。取得这种成就的根据和保证是唐代文学专题研究的全面丰收。文学史当然有它的独立学术价值，但归根到

底，它又必须建立在各专题研究的坚实基础之上。专题研究的成果不断进入文学史，促进着文学史水平的提高；文学史又不断整合和反映着专题研究的成果，同时也就在刺激着专题研究的深入，二者就处于这样一种互动互利的关系之中。所以，走向专业、追求精深，这是文学史研究的大趋势，也必然要在文学史的撰写工作中表现出来。文学史不但因向专题研究汲取营养而日益深化，而且通过本身体制的变化而走向专精。由一般的文学通史，进至断代文学史，再到断代的文体史，研究区域呈缩小之势，而研究深度和精细程度则大大增加，这个发展趋势从近年来有关唐诗、宋词、唐赋、唐小说、唐判文、唐试策的专史和专题研究的涌现，已看得相当清楚了，而可以预见的是，这一类专史还将拥有更远大、更美好的前景。

(上接第 88 页)

又如，作者在研究过程中，依据所掌握的资料，制作了十多幅简表，如“1847—1854 年新教差会和传教士分布情况简表”、“1835—1850 年中国医务传道会医院情况简表”、“马礼逊学校课程情况表”、早期新教传教士的中文著作简表、早期新教传教士编著的中文词典简表、“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翻译中国书籍情况表”、“来华新教差会名录”、“1807—1851 年来华新教传教士一览表”等，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而这些简表看似简单，编制起来却十分复杂，没有严谨的治学态度，是难以完成的。

再如，我国历代治史素有文史兼通的优良传统，有文史不分家之说。尽管目前有不少史学工作者认识到了这一点，但真正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没有对历史资料的娴熟掌握和深

①刘书是其在北京大学的讲义，1920 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鲁书是其 1926 年在厦门大学任《中国文学史》课的油印讲义，未编完，至西汉司马相如而止。先生逝世后才出版。

②先秦不是一个朝代，大抵从中国文学之起源叙起而止于秦统一者，均可称为先秦。

③《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原载《国风》半月刊第三卷第八期，1933 年 10 月 16 日。本文所引，见《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

④朱炳熙《唐代文学概论》，上海群众图书公司 1929 年版。

⑤陈子展又有《宋代文学史》一书，后曾与《唐代文学史》合印为 1 册，称《唐宋文学史》。

⑥⑦周祖谟《隋唐五代文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⑧见该书第 163 页。

⑨见该书《前言》。

⑩⑪见该书第 1 册，第 3、5 页。

责任编辑：呼 韩

刻理解，是难以企望的，该书的作者则较好地做到了“史”与“文”的统一。纵观全书，从建构体系的章目标题到段落行文，无不充溢文字的优美感。

当然，书中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由于篇幅的限制和研究的难度较大，书中尽管提到了新教传教士的早期活动对后续阶段的影响，但并没有展开作充分的说明，也许这一问题并不属于本课题研究的范围，但如能多费一些笔墨，则更能凸现本课题研究的重要和价值。

①③④⑤参见吴义雄著《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第 22—23、206—209、516—517、520—521 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参见陈胜彝先生为《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

责任编辑：郭秀文

论城市文学研究的方向

蒋述卓¹ 王 斌²

- (1.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东 广州 510632)
2. 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摘 要]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研究无论是在文学研究还是社会学研究方面都有较为深入的发展, 但仍存在明显的不足, 如研究的随意性、缺乏比较眼光、缺乏理论深度。城市文学研究的方向在于: 首先应该确定其研究对象与范围, 这是城市文学理论建构的基础; 其次是从空间角度去考察城市文学; 再次是将城市文学置放在人类文明进程史中去考察研究。

[关键词] 城市文学 乡土文学 城市文学理论建构 空间形态 文明进程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1) 03-0097-06

一、现状与不足

如果我们从 1983 年北戴河首届城市文学理论笔会算起的话, 城市文学的研究也已有了 17、18 年的历史。在这将近 20 年的时间里, 城市文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无论是对于城市文学本身的文学研究, 还是对于城市文学的文化社会学的研究, 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人们在许多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但是, 至少我们对于城市文学的发展脉络、城市文学的特性、城市人的生态与心态、城市文化与文学、城市化与文学、城市生活方式与文学等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就 80 年代至今的城市文学研究的进程来看, 它明显地受着我国当代城市化的进程以及当代城市文学本身发展程度的制约。80 年代, 我国当代城市文学刚刚处于起步阶段, 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也还没有开始。因此, 当时对于城市文学的文学研究相对薄弱, 而在较为深入的文化社会学研究中, 却又存在着大量搬用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对中国当代城市社会现实进行演

绎的弊端。90 年代, 我国进入城市化迅速发展时期, 城市文学也随之异军突起, 无论是中国的城市还是城市文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由此, 城市文学的研究也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社会学研究都有较为深入的发展。文学研究方面集中于对以“新生代”以及 70 年代作家为代表的城市小说的探讨, 文化社会学研究方面则避免了 80 年代直接套用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的缺陷, 更加切合 90 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的实际, 深入阐发城市各方面与文学的深刻关系。在这方面, 李洁非现在仍在进行的“城市化与文学”系列研究十分突出。因此, 从深度上来看, 90 年代迄今的城市文学的研究比 80 年代有较大的进展。

然而, 从总体上来看, 当前城市文学的研究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研究的随意性。大量的研究资料表明, 当代城市文学的研究是极其散乱的。众多的研究者只是根据自己的兴趣, 选取特定的目标, 作浅尝辄止的

探寻,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人很少。80年代的吴亮、徐剑艺,现在的李洁非是对城市文学进行较为系统研究的为数不多的代表。其次是研究的微观性。也许是由于进行城市文学研究的都是一些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的缘故,他们的目光紧紧盯住90年代的“新生代”小说本身,最多把目光延伸到80年代或建国以后。而对于20、30、40年代的城市文学,则不予理睬,完全把它们推给了现代文学的研究学者。对于现代城市文学尚且如此,对古代城市文学则似乎更加不屑一顾,甚至对于其是否存在都很怀疑。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文章仅就90年代的城市文学本身来谈论城市文学,鲜有将其纳入整个城市文学发展的历史视域,对其生成与变异,在宏观考察的基础上,进行深刻的理论透视,从而揭示出城市文学本身的特性及其发展规律的文章。其次是缺乏比较的眼光。比较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特别是异质文化间的文学比较更能揭示出文学的共通的规律。而从80年代至今的大量的城市文学研究文章中,几乎没有一篇将中国当代城市文学与西方城市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其比较意识的薄弱、研究视域的狭窄由此可见一斑。如果不能在古今中外的城市文学的整体中去透视我国当前的城市文学,要想对其有多么深刻的认识,对城市文学的发展规律有多么深刻的把握,几乎不可能。再次是理论深度不够。现在的大量研究仍停留在现象描述的阶段,理论建构不多。比如对于以“新生代”为代表的90年代的城市文学,人们似乎在“欲望”二字之外,难以再说出更为深刻的东西。即使是论述较为深刻的城市与文学关系方面,仍给人某种不足之感。最后,研究的力度不够。城市文学已经在当代特别是90年代获得了十分巨大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并存的文学格局。然而,从宏观的角度对城市文学进行深刻的理论透视的专著仍未见出现,这与当前城市文学蓬勃发展的形势是极不相称的。

二、理论建构的基点

80年代北戴河城市文学理论笔会上,便已提出城市文学理论的建构问题,但是从城市文学研究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不足来看,这种成果是十分有限的。未来城市文学研究的方向、研究的核心,无疑仍然是城市文学理论的建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中国城市文学研究的一个理论目标。要实现这一理论研究的目标,一些资料性的前期准备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工作理论界也一直有人在做,比如90年代初徐剑艺便编选了《新都市小说选》,现在陈晓明编选的《中国城市小说精选》也已经出版。这两部选集囊括了新时期以来大部分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小说,但是,由于选择工作是在编选者特定的标准之下进行的,(比如,陈晓明就直接把“欲望化叙事”作为其选择的标准),因此,这两部选集都不是当代城市小说的荟萃,许多在我们看来是典型的城市文学作品都没有入选。因此,这两部选集都存在着范围狭窄的缺陷。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在更大范围对城市文学作品进行搜集编选,这种工作应该在整个文学史的范围内进行,包括古代、近代、现代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代特别是80、90年代。对于城市文学理论的建构来说,这种城市文学作品的编选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对于研究对象范围的框定,是城市文学理论建构的基础。笔者以为在这种城市文学作品编选的同时,更应该进行《城市文学史》写作,对城市文学发展的历史进行详尽的清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人们对于城市文学从古到今发展历史本身的认识是十分薄弱的,尽管已有多篇文章对此进行了梳理,但是这种梳理大多只是蜻蜓点水式的,给人的只是一种粗浅的印象。一般文学史中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很少有专门从城市的角度着眼的。因此,对于城市文学要想在宏观上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这种城市文学专门史的写作便显得非常重要。

无论是文学作品的编选还是文学史的写作,都是以特定的文学观为基础的,前些年文学史界重写文学史热正是当代文学观念变革的产物。城市文学

作品的编选与《城市文学史》的写作同样必须以某种城市文学观为基础,而从80年代以来,理论界对于城市文学的认识一直未能够达成某种共识。事实上,对于城市文学概念的讨论一直是研究的一个焦点。在对于何谓城市文学的认识上,不仅观点众多,莫衷一是,而且即使是对提城市文学,人们也态度各异,肯定者有之,怀疑、否定者同样有之。比如,80年代曾镇南就认为,“都市文学”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不可能也不必要对其进行严格的界说。^①雷达也承认“城市文学”是一个不得已而用之的概念,经不起穷根究底的推敲和质询。^②90年代,王干对于“城市文学”定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上存在的困惑,进行了明确的理论阐述。他认为,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便存在着命名、定义的困难。当代文学的发展呈多元态势,且存在着极强的“覆盖率”,而命名是以一元方式进行的,这就造成了某种不确定性。城市文学是一个正在生长着的新概念,对其进行定义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局限性都是难以回答的。^③诸如此类的反对意见还有很多,然而,更为明确的反对意见来自于作家。如汪曾祺认为,提“城市文学”是理论先行,为时过早;王安忆则认为,对城市文学作一个界定是痛苦的,她从不有意考虑写城市还是写农村,城市农村只是作为人物活动的一个舞台、场景而存在的。^④如果我们单独来看这些反对意见的话,会觉得不无道理。但是,一旦把它们纳入整个文学史的框架内,其目光的短浅,对于像新感觉派小说这样的城市文学的存在的漠视便十分明显,从而使得其论说显得十分的苍白。

就对城市文学进行定义来说,存在着两类主要的观点,一类是依据惯常的题材标准对城市文学进行定义,另一类则是突破题材的层面,从其它方面来对城市文学的特质进行界定。前者如:凡以写城市人、城市生活为主,传出城市之风味、城市之意识的作品,都可以称做城市文学。^⑤这种观点是80年代前期的主要观点。而从80年代后期开始,从题材层面上对城市文学的特质进行界定成为主流,而且

观点非常多。人们从审美、城市人身份、现代意识、都市意识、物化等等许多方面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界说,这其中有两种观点非常重要,一个是对于城市文学的现代意识、都市意识的强调,一个是从物化方面对城市文学进行的界说。现代意识在80年代末开始被人们提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要位置,认为现代意识、都市意识应该是都市文学的核心。这种观点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如:“从创作方面来说,城市文学不仅是题材的问题,关键在于是以陈腐的传统观念,还是以现代意识去观照正在蜕变中的城市生活和都市人的复杂心态。所以说,现代都市意识是城市文学的灵魂。”^⑥“我们所说的都市文学并不等同于题材意义上的表现都市生活状况的文学,而必须是用现代意识观照现代都市生活,反映都市生活流向和价值观念变迁,刻画现代都市人格和心态,具有都市审美风貌和艺术表现特征的文学。”^⑦对于这种观点表述得最为清楚明晰的是司徒杰:“都市文学所抒写的题材理所当然地应该是都市生活,这是我们界定‘都市文学’这一概念的起点线。也就是说,都市文学首先应该是‘都市的’文学,以期在题材上和‘乡土的’文学区别开来。但‘都市的’文学不一定就是都市文学——逆命题不成立……在理解‘都市文学’这一概念的时候,我们并不能把它仅仅看作是‘都市的’文学,以期只在题材上和‘乡土的’文学相对应,而应更多的把它理解为现代都市意识观照下的文学,以期在文化的指谓上和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意识观照下的文学相区别。”^⑧从物化角度对城市文学进行界说的主要是李洁非,他认为“在真正的城市文学中,必须包含物和商品的观念,人的命运和他们彼此的冲突、压迫,不论表面上看起来是不是采取了人格化形式,必须在其背后抽取出和归结到物、商品的属性。”^⑨

之所以说这两种观点非常重要,一方面是由于它们代表了当今城市文学中的主要观点,另一方面而且是更为主要的方面在于,当把现代意识或者是物和商品的观念作为城市文学质特征的时候,城市

文学的涵盖面被大大地压缩了。现代意识是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在人类意识领域的表现，而物化则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的产物，两者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基本上是同步的，它们的上限最多只能推至西方工业革命的年代，而在我国则更晚。当我们把城市文学限定在这样一个大致的范围之内的时候，对于城市文学更深一层的追问便开始了——对于我们来说，用“城市”来限制文学到底意味着什么？

三、空间——考察城市文学的一个视角

对于文学可以有多种考察的角度，其中之一是时间的。我们习惯上从时间的角度，在大的时间段上将整个文学分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三个大的部分。我们也可以从时间的角度对整个文学总体进行另外一种划分，依据作品描写内容所属的时代与作者写作年代的差异，将整个文学总体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历史文学，一个是现实的文学，一个是未来的文学。历史文学，顾名思义，不管它的写作年代如何，它的内容无疑是远离作者生活写作年代的，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历史小说是它的主体。而现实的文学则是对于作者当下生活的直接演绎与反映，因而具有即时性。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中，现实的文学占据着主导地位。未来文学，则主要是指科幻小说，如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它所描写的内容与历史文学一样远离作者的现实生活，只不过它是指向未来，而历史文学是指向过去的。因此，从时间的角度来看，这三者构成了整个文学的总体。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待整个文学总体的话，那么与时间相对应，我们也就可以从空间的角度来对文学进行重新的整理。

就空间而言，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空间形态，大到山川平原、湖泊海洋，小到亭台楼阁、房屋居室，空间以无限多样的形态存在着。就人类的生存空间来说，有两种空间占据着异常重要的地位，那就是城市与乡村。自从人类从蒙昧时代走出，并日益向文明时代迈进之后，城市与乡村便构成了人类生存

空间的主体。文学对人类生活的反映便集中在这样两个空间之上。由于城市在根本上是一个空间性而非时间性的概念（尽管城市有它自己的历史），因此，当我们用“城市”来限制文学的时候，它实质上意味着是从空间这一独特的角度对文学所进行的一种概括。从这种角度去理解城市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不失为从宏观上对城市文学进行整合的一种新的途径。

当我们把城市文学中的城市作为一种空间场景引入的时候，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在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在空间上既有城市空间场景也有乡村空间场景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城市与乡村这两个场景大量地转换，相互交织。那么又如何能够根据空间场景来判定作品的城市文学属性呢？显然，如果我们用空间来界定城市文学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必须要加以解决的问题。在此，我们引入“前景位置论”。

所谓前景是相对于背景而言的，前景与背景是两个相互对应的概念。任何人物的活动都是在一定空间场景之内的活动，而空间与空间、场景与场景之间存在着大与小、同质与异质的关系，而且就它们与人物的关系而言，也存在着远近、亲疏的不同。由此，空间、场景便呈现出前景与背景的不同。一般而言，人物直接活动于其中，眼之所及，目之所触的空间场景便是前景。而与之有着密切关系，对其有着重大影响的更大范围的空间便是背景。因此，就空间的大小上来讲，背景要大于前景。就其与人物的关系来说，前景比背景更为直接密切。一般来说，前景与背景之间可以是同质的，也可以是异质的，要依据背景的层次而定。

从根本上来说，城市与乡村是两个异质空间，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且其内部各部分之间存在着质的同一性。因此，当人物完全活动于城市、乡村这样一个单质空间内的时候，在其前景与背景之间便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两者完全是同质的。因此，在空间上，这种前景与背景完全同一的空间

便具有了某种典型性。这种空间的典型性使得在此空间上反映人类生活的作品也具有了典型性，即是说在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之间对应地存在着典型形态的城市文学作品与典型形态的乡土文学作品，它们在各自的空间上保持着高度的纯粹性。比如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沈从文的《边城》、刘绍棠的《蒲柳人家》等等，在这些作品中，它所展现的完全是一个乡村生活的世界，没有丝毫城市的影子。同样，在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王安忆的《长恨歌》、邱华栋的《手上的星光》、林坚的《驶出欲望街》、卫慧的《上海宝贝》等等作品中，其城市空间的纯粹性同样突出。

对于这样典型的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我们很容易从整个文学作品的整体中将其提取出来。而当作品中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同时出现的时候，这两种空间之间的关系便决定了整个作品的归属问题。就空间意义上来讲，城市与乡村是两个对等的空间，但是当它们共同出现在作品中的时候，其地位则是不一样的。在这两者之间，必有一个居于主导的前景位置，而另一个则居于从属的地位。当城市空间在作品中处于主导的前景位置的时候，作品便具有城市文学的性质。反之，当乡村居于主导的前景位置时，作品便是乡土文学而非城市文学。显而易见，无论是哪种情况，作品中的空间都不再具有纯粹性。因而，它们都不再是典型的城市文学或典型的乡土文学。如此来看的话，在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中便存在着两大类，一类是典型形态的城市文学、乡土文学，一类是非典型形态的城市文学、乡土文学。在典型的城市文学与典型的乡土文学两极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中间交叉地带。从典型的城市文学向典型的乡土文学一极看，城市文学的典型性逐步减弱，直至最终消失，而乡土文学的典型性逐步增强，直至成为典型的乡土文学。反之，从典型的乡土文学向典型的城市文学一极看的话，其情形正好相反。

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典型形态的乡土文学无论是在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还是在当代文学中都

大量地存在着，即使是非典型形态的乡土文学也异常众多，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的整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因此，说中国是乡土文学的国度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反观城市文学，其情形截然不同。典型形态的城市文学在古代文学中非常少，大量存在的是非典型形态的城市文学。而在现当代文学之中，无论是典型形态的城市文学还是非典型形态的城市文学都很多。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城市文学更是大量涌现，大有超过乡土文学之势。

四、人类文明进程史中的城市文学研究

作为对应的两极，典型的城市文学与典型的乡土文学各有自己鲜明的特质，它们分别展现了人类的不同特性。概而言之，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永远存在、永远必须要面对的冲突的双方——自然与文明的鲜明表征。乡土文学是自然的代言人，它所言说的永远是人的天然本性，表现着一种恒定不变的质素，它意味着善良、纯朴、和谐、安宁等等。这种恒定的质素虽历经千年而不变。从先秦时期的《诗经》到唐代山水田园诗、明代的小品文、直至沈从文的《边城》、刘绍棠的《蒲柳人家》，人性的至朴与纯真始终如一。典型乡土文学的发展历程，展示了自然在文明的不断冲击下所保留的程度。而城市文学则记录下人类迈向文明的每一个脚步，一部城市文学发展史同样是一部人类文明的进程史。当我们感叹于几千年的乡土文学在审美意识、审美风尚、物质景观、生活内容等方面存在着惊人相似的时候，我们在城市文学中看到的则是物质景观的巨大变迁，精神世界的剧烈动荡，审美风尚的频繁更迭。当我们把《三都赋》、《三言二拍》、《骆驼祥子》、《都市风景线》、《上海的早晨》、《钟鼓楼》、《顽主》、《环境戏剧人》、《上海宝贝》等等放在一起的时候，便可以看到，无论是物质景观还是人物的精神世界，其间的差异何异于天壤之别。

人类在逐步走向文明的进程中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异，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及其（下转第107页）

论《醉翁谈录》的性质与旨趣

董上德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对罗烨《新编醉翁谈录》的性质与旨趣应做重新的辨析。该书不是“笔记”，也不是“笔记传奇话本集”；它是一部专供“小说”与“合生”艺人参考使用的、以男女风情为旨趣的故事与资料的类编。其旨趣比较复杂，编撰者既歌颂坚贞的爱情，谴责负心的行径，又流露出对“齐人之福”的向往，对花衢柳巷的依恋。

[关键词] 醉翁谈录 通俗类书 男女风情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1)03-0102-06

南宋罗烨编撰的《醉翁谈录》二十卷本，是小说史、戏曲史研究者必读的典籍。此书在我国久已不见著录，1941年日本影印观澜阁所藏旧刻孤本，并公之于世。自被发现以来，《醉翁谈录》中的“小说引子”、“小说开辟”两段文字，最为人们所熟悉，研究者每每称引，是十分重要的小说史料。

学术界对《醉翁谈录》的研究，是随着其书重新面世而展开的。赵景深先生于1941年撰写《因〈醉翁谈当〉的发现重估话本的时代》一文，^①着眼于“小说开辟”中所收录的107种话本目录，从小说史、戏曲史的角度肯定这个话本目录的特殊意义。谭正璧先生于1945年撰写《绿窗新话与醉翁谈录》一文，^②对《醉翁谈录》做了介绍，并列出书中传奇文部分的目录，认为这部书是“传奇集兼杂纂集”。到80、90年代，人们对《醉翁谈录》的认识、判断尚不大一致，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醉翁谈录”词条称此书为“宋代笔记”，并指出“它转

述了《太平广记》和唐宋其他传奇小说书籍里面的故事，另外还采录了一些诗词杂俎之类”。^③而《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醉翁谈录”词条却认为此书是“笔记传奇话本小说集”。^④看来，《醉翁谈录》其书的性质和旨趣，仍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

—

说《醉翁谈录》是“宋代笔记”，似乎只就其书名而言，并未符合书中的实际。

在笔记类的著作中，南宋金盈之的八卷本《醉翁谈录》，或记“名公佳制”，或录“京城风俗”，或作“禅林丛录”，与一般笔记一样，涉及面广，既拾掇旧书，又记录见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京城风俗记”，大体反映出北宋汴京的风俗人情，其开首的小序，用的是北宋遗老的口吻：“予世居京城，自南渡以来，每思风物繁盛，则气拂吾膺。暇日因命儿侄辈抄录一年景致及风俗好尚，无不备载。行将恢

复，再见太平，当知予言历历可验也。”^⑤尽管是“抄录”而成，但“抄录”本身就体现出一定的主体意识。与之相似的是，《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都有记“当时之盛”并“缅怀旧事”的主体意识。反观罗烨的《醉翁谈录》，它既没有记载“当时之盛”，也不“缅怀旧事”，只着眼于民间的叙事现象，缺乏一般笔记所具有的个人风格；它向读者提供故事的材料，却不以记录见闻取胜。

可以与之比较的还有宋楼璩的《醉翁呓语》、宋李宗谔的《先公谈录》和伪唐张洎的《贾氏谈录》。《醉翁呓语》是一部记录见闻的笔记，尤其以发表著者的零星见解为特色，如书中说“医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脉知病源者，正意之所通也。”另一条说：“文士轻薄，不顾道理，有甚害义者；今诸家杂说，往往有之。”^⑥其以“醉翁”自居，似乎受到号“醉翁”的北宋文豪欧阳修的影响；其以“呓语”自谦，实则标榜自己颇有见解。而《先公谈录》是作者记录其父亲言谈的书；《贾氏谈录》是作者记录“好古博雅”的贾黄中言谈的书，其中有“余问贾君”字样，是问答体。^⑦反观罗烨的《醉翁谈录》，既不象《醉翁呓语》那样倚老卖老，也不象《先公谈录》、《贾氏谈录》那样记录言谈，它用的是貌似笔记的书名，实际上不是笔记类著作。

说罗烨的《醉翁谈录》是“笔记传奇话本小说集”，似乎很“全面”地概括了此书的内容，但又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如上所述，它不是“笔记”；至于说它是“传奇话本小说集”，其中的“传奇”，也是需要辨析的。认为它含有“传奇”，可能是一种误解。固然，书中的不少故事有其来历，往往是删改前代的传奇作品而成，如辛集卷一的《柳毅传书遇洞庭水仙女》、癸集卷一的《李亚仙不负郑元和》，分别删改自唐代传奇《柳毅传》和《李娃传》，但是，从文本的角度看，前者与后者不是一码事，经过删改之后，前者从后者脱胎而出，前者与后者的文本属性是不一样的。相比之下，可以看出，删改

之后的故事更加便于记诵，而所删去的往往是一些与故事主干关系不大的枝节，如《李亚仙不负郑元和》，介绍郑元和时，只是说“有荥阳郑生，字元和者，应举之长安。”^⑧而删去了《李娃传》中“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隽朗有词藻，迥然不群，深为时辈推伏……”一段文字；更值得注意的是，《李亚仙不负郑元和》改动了故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即它不象《李娃传》那样，在“荥阳生”囊中羞涩时，李娃亲自以“尚无孕嗣”为托词，哄骗“荥阳生”去拜“竹林神”；它改为让李亚仙置身事外，直接出面哄骗郑元和的是妓院的鸨母，她对郑说：“女与郎相知一年矣，而无孕嗣。此间有竹林神，报应如响，宜诣彼祠下，祭奠求子，可乎？”这显然是经过通盘考虑后作出的改动，它关乎女主人公性格的前后统一问题，突出了李亚仙在整个哄骗事件中处于被动的地位，使得李亚仙的形象更为纯洁了。这已经超出一般意义的删改，而是对原有的故事“动手术”。进而言之，《李亚仙不负郑元和》的文本属性已经不是“传奇”，而是经过重要变动后的、便于识记的小说话本。说它是小说话本，还有明显的“本证”，它一开始就写道：“李娃，长安娼女也，字亚仙，旧名一枝花。”这显然与唐代流传的《一枝花话》有联系，而“一枝花”的称谓，在《李娃传》中是没有的。可以说，《李亚仙不负郑元和》不完全是《李娃传》的删改本，它还参考过口传的《一枝花话》。而《柳毅传书遇洞庭水仙女》，同样对唐传奇《柳毅传》多有删改，如龙女初遇柳毅时，只是说：“妾，洞庭龙君小女也，嫁与泾川次子……”，而删去传奇中的“贱妾不幸，今日见辱于长者。然而恨贯肌骨，亦何能愧避，幸一闻焉”一段文字。相对而言，前者的叙述较为直截了当，而后者则有所铺张；前者易于识记，后者难于背诵。从易于识记的角度看，《醉翁谈录》中的故事文本具有不同于“传奇”的功能。

还有一个问题，所谓“笔记传奇话本小说集”

的说法，忽略了书中的一部分内容，即乙集卷二的“妇人题咏”、戊集卷一的“烟花品藻”、戊集卷二的“烟花诗集”、庚集卷二的“花判公案”等，它们不以叙事为主，而以吟咏诗词见长；它们各为一类，是有意的编撰，并非一般杂乱无章的“笔记”可比。

其实，不仅以上诸卷各为一类，书中的所有故事文本都是分类的，如甲集卷二是“私情公案”类，乙集卷一是“烟粉欢合”类，等等。就其性质而言，《醉翁谈录》是一部小型的类书。

二

日本学者大塚秀高、宇野直人都认为《醉翁谈录》是一部“通俗类书”。^⑨笔者赞同这个判断，但认为它尚嫌笼统。

类书的编撰，在宋代有进一步的发展。仅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类书类一”的著录，宋代所编的类书比唐代要多，唐代7种，而宋代有29种。可见，宋代编撰类书的风气较盛。著录于《四库提要》子部“小说家类”的《太平广记》，按题材分为92个大类，尽管四库馆臣没有把它列为类书，但其编撰方式与类书无异，它的分类编次的做法，便于使用者按类检索，具有类书的功能；其参与编撰的人中，就有编类书的专家，如吴淑，曾参加编撰《太平御览》，其本人也编出《事类赋》30卷。而在宋代编类书成风的社会文化土壤中，在《太平广记》等分类编排的小说集的影响下，出现《醉翁谈录》这样的“通俗类书”，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不过，《醉翁谈录》作为“通俗类书”，有其特殊的用途。

这部书在卷首“小说开辟”中曾列出当时“说话”的几个大类：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捍棒、神仙、妖术等。按说，位于卷首的“小说开辟”具有“总序”的性质，而书中的故事当据以分类才是，可实际并非如此，所收录的故事并无灵怪、朴刀、捍棒、妖术等类，其所分出的类别，如“私情公案”、“烟粉欢合”、“宝窗妙语”、“花衢实录”、“遇仙奇会”、“神仙嘉会”、“负心”、“夤缘奇遇”、

“重圆故事”等，尽管名目各异，但其内容，一言以蔽之，不出“男女风情”四字。显然，描写男女风情的故事，在当时是最受欢迎的“小说”内容。故而《醉翁谈录》以收录这一类故事为主。

如果《醉翁谈录》仅仅是收录这类适用于“小说”的故事，那么，其书的性质就显得较为单纯，无非就是便于“小说”艺人参考的、专讲男女风情的“故事类编”。可是，书中的一部分内容，不一定适用于“小说”，如“烟花品藻”、“烟花诗集”，占了两卷的篇幅，毫无故事性，全部是品评妓女的七言绝句。又如“嘲戏绮语”，凡9条，篇幅短小，都是笑话体，都以女性为中心话题。又如“妇人题咏”，凡7条，都是诗话体，都以表现女性的诗才为主。这些部分，虽然与“小说”不一定有密切关系，但总与“说话”相关，笔者认为，它们是为“说话”家数之一的“合生”提供参考资料。宋洪迈《夷坚志乙集》卷六记载：“江浙间路歧伶女，有慧黠，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⑩可见，“合生”不以故事性取胜，而以演员的敏捷、诗才见长。据《夷坚志》的上述说法，“合生”的演员似以女性为主。她们作为“路歧人”，地位低下，冲州撞府，没有安定的生活，而能“知文墨”，实在不易；为了适应她们演出的需要，于是，有人编出参考书，供她们借鉴使用，《醉翁谈录》的上述内容，似乎与此有关。在酒席之间，众人的话题有“荤”亦有“素”。笑话、妓女，固然可以成为有助“酒兴”的话题，而表现女性诗才的逸闻，也不失风雅，故而“荤”“素”兼有，能适应不同场合的需求。据《醉翁谈录》卷首“小说引子”的说法，“合生”与“演史”等“说话”家数一样，都要求“皆有所据，不敢谬言”。显然，“合生”演员不仅要有急才，而且她们所“题咏”的内容要有依据。《醉翁谈录》含有适用于“合生”的材料，正是为此而备的。

此外，书中还有两方面的内容：一为“闺房贤淑”，凡6条，都是贤妇淑女的小故事，刚好与书中

的妓女故事形成鲜明对比；一为“花判公案”，凡15条，都是以官员审理男女风流案时的判词为主，而风流事件本身，则往往数语带过，相当简略，故事性不强；而判词有散文，也有韵文，且以韵文居多。就这两方面的文本形态而言，它们似乎不宜单独用来“演出”，可能的用途是，“闺房贤淑”的小故事用于话本头回的参考，而“花判公案”则用于男女风流故事结尾的参考。比如，宋元话本《宿香亭张浩遇莺莺》的结尾，就有“花判”；“花下相逢，已有终身之约；中道而止，竟乖偕老之心。在人情既出至诚，论律文亦有所禁。宜从先约，可断后婚。”^⑪其写法是概括出风流故事的重要“关目”，然后再下判语，与《醉翁谈录》之“花判公案”的写法是相近的。^⑫此外，《古今小说》第33卷《张古老种瓜娶文女》的头回、《醒世恒言》第11卷《苏小妹三难新郎》的头回，都提及谢道韞“咏雪”的故事，这个故事也收在《醉翁谈录》的“闺房贤淑”类中，题为《道韞才辨》。而“闺房贤淑”中各故事的女主人公都是古代知名度较高的贤妇淑女，除谢道韞外，还有陈尧咨的母亲、程颐（伊川）的母亲等，其事迹常被引用。

综上所述，《醉翁谈录》不是一般的“通俗类书”，它是一部专供“小说”与“合生”艺人参考使用的、以男女风情为旨趣的故事与资料的类编。^⑬

三

《醉翁谈录》以男女风情为旨趣，具体而言，有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描写文人的风流韵事。书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现象，是以柳永为主角的故事构成一类，题为“花衢实录”，凡4则。在这部书里，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享此“殊荣”了。这些故事的编述，是适应着当时人们的口味的，尤其是柳永，风雅与风流得而兼之，象“花衢实录”中的《三妓挟耆卿作词》，应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以至于它在后世的话本小说中被敷衍为《柳耆卿诗酒玩江楼》（《清平山堂话本》）、《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古今小说》）等情

节更为复杂的作品。就趣味而言，这类作品流露出“艳羨”的倾向：柳永落拓的经历，自然引起人们的同情；柳永风流的故事，又使人在同情之余平添几分“羡慕”，令广大落魄失意的人从中得到些许慰藉。值得注意的是，今人施蛰存、陈如江辑录的《宋元词话》，^⑭也辑入《醉翁谈录》中的若干条，其中，“花衢实录”各条，悉数收入。过去，“说话”中的词人故事，如今被看作是“词话”，连该书编者之一的施蛰存先生也不禁惊叹：“宋人论词，散见于小说者，如此之多，亦始料所不及也。”^⑮从《醉翁谈录》所收录的词人故事看，它们固然是文人的风流韵事，^⑯同时，也内含着词的创作与“小说”创作的互动关系。关于这一点，笔者拟另文讨论。

一是描写男女恋爱的“越轨”故事。这一方面的作品，有《张氏夜奔吕星哥》、《静女私通陈彦臣》、《因兄姊得成夫妇》、《梁意娘与李生诗曲》、《郭翰感织女为妻》等。其中，《郭翰感织女为妻》最为奇特。它描述的是天上的织女下凡另觅夫婿的故事，略谓：太原书生郭翰，于月夜遇见一“明艳绝代”的少女，自称“天之织女”。二人“携手升堂，解衣共寝”。次日拂晓，织女辞别，凌空而上。此后，每夜皆来，与郭翰“情好转切”。郭翰戏问她何以不顾牛郎而独往独来，织女答曰：“阴阳变化，关渠何事？且河汉隔绝，无可复知；纵复知之，不足为虑。”郭再问她与牛郎相会是否快乐，答曰：“天上那似人间，正以期运当尔，非有他故也。又况一年一度相会，争如今日夜夜相逢，君无猜忌。”然而，这个故事仍以悲剧结束；织女不得不奉天帝之命，与郭翰诀别。郭翰从此不再结婚。从其叙事模式看，它有点象是对民间传说中的牛女故事的“戏仿”，男女主人公同样具有挑战“天条”的勇气，同样最终被“天条”所惩罚，故事因而带有悲壮的色彩。不过，《郭翰》中的织女，从其言谈看，比牛女故事中的织女更为大胆，她在故事中以有夫之妇的角色到人间追求有情人，将“贞节”观念置诸脑后，其对封建礼教的冲击力度是相当大的。值得注意的

是，这个故事原载《太平广记》卷六八，文末注：“出《灵怪集》”。而它被收录在《醉翁谈录》时，其文本是改动过的，最显著的地方是，男女主人公初次相遇时，织女对郭翰说：“吾天之织女也，久居清阙，旷阻佳期，幽态盈怀，上帝赐命自游人间，寻择佳侣，仰慕清风，愿托慈契。”而“寻择佳侣”一语，为原文所无，显然是后加的，揣度其用意，似为织女的下凡觅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似乎是“奉旨”行事。尽管这一笔与下文的天帝命织女永诀人间相互矛盾，但就叙事效果看，已经构成对天帝的意志的一种反讽。此外，结局也有明显变动，原文说，郭翰与织女分别后，“复以继嗣，大义须婚，强娶程氏女；所不称意，复以无嗣，遂成反目。”^⑦在这里，郭翰的形象没有多少光采，他与程氏反目的原因是妻子“不称意”，且无所出，使郭家“断后”。显然，这个郭翰受儒家正统的观念影响甚深。而在《醉翁谈录》中，上面的引文被删去了；郭翰自与织女分离后，心中只有织女，不复以“人间女色”为念，认为人间没有一个女子能与织女相比，其形象因而显得多情、纯洁。他不再结婚的举动，一方面反映出他对织女的深情；另一方面也表明，他是把“无后为大”的观念置诸脑后的。总之，在这类“越轨”故事中，作品流露出对敢于挑战封建礼法的男女主人公的同情与赞赏。

一是描写有失人格的负心故事与心志坚定的重圆故事。这方面的作品有《王魁负心桂英死报》、《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这两篇故事都是广为流传的，《张生负李氏娘》的故事被编进话本《张舜美元宵得丽女》（《古今小说》卷二三）中的头回；《王魁负心》的故事在“说话”中、在舞台上都是“热门节目”（现存话本有《王魁》，见路工等编《古本平话小说集》，剧目中有《王俊民休书记》等）。故事中的王魁与张生，都在落魄时得到情人的无私帮助，但他们都背弃盟约，另觅新欢，反映出他们心志不坚、人格低下。作品对这一类人作出了严厉的谴责。与此相对照的是，《醉翁谈录》中有不负心的

故事，即《李亚仙不负郑元和》，还有夫妇心志坚定、重圆复合的故事，如《乐昌公主破镜重圆》、《无双王仙客终偕》、《张时与福娘再会》等。其实，就故事形态而言，《李亚仙》写男女主人公的先离后合，也可以纳入“重圆故事”一类。

还有一篇作品相当特别，即乙集卷一的《林叔茂私挈楚娘》。这是一篇赞赏一夫多妻的作品。略谓：林叔茂与妓女楚娘相好，其后，林应试高中，携楚娘归里。回到家里，楚娘不能见容于林妻李氏，屡受冤屈。后来，李氏良心发现，与楚娘冰释前嫌，一夫二妻和睦相处。篇末有一段“醉翁曰”的文字，先说“忌克者，妇人之本性也”，然后赞扬李氏能悔过，最后称：“若李氏，可谓贤乎哉！”这是全书唯一一篇有“醉翁曰”文字的作品，而此醉翁是赞赏的一夫多妻的。

总括来看，《醉翁谈录》的旨趣、内容比较复杂，在男女风情的问题上，编撰者既歌颂坚贞的爱情，谴责负心的行径，又流露出对“齐人之福”的向往，对花衢柳巷的依恋。在民间俗文学的土壤中孕育生长的“说话”与“合生”，作为当时社会的非主流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交织着多种思想因素，有进步的，也有落后的，这与后世的同类作品如“三言二拍”的情形几乎一样，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①此文收入《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10月版，改题为《重估话本的时代》。

②此文收入《话本与古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4月版。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第131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④《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第77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4月版。

⑤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第1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⑥见《说郭三种》第四册，第15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月版。

⑦《先公谈录》、《贾氏谈录》，均见《说郭三种》第一册。

⑧本文引书中原文，均据罗烨《新编醉翁谈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⑨参见宇野直人《柳永论稿》，第130、1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⑩见《夷坚志》第二册，第84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⑪见欧阳健等编订《宋元话本集》上册，第302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版。

⑫《醉翁谈录》中的“花判”，试举一例如下：

《判和尚相打》：一日，光华院僧为奸情相妒，已行和议；又因酒座上，和尚复行言气，遂成闹唤。后投于郡衙，奉判云：“和尚永圆、妙圆，二人出家经年，吃酒结袈跣坐，相打偏袒右肩。造恶恒河沙数，犯罪无量无边，各决黄檀十二，押出三千大千。”

而《醒世恒言》第39卷《汪大尹火焚宝莲寺》也是写和尚“贪淫奸恶”的故事，其结尾有一段审案官员的判词，写法与《判和尚相打》相似（文较长，不录）。《醒世恒言》第8卷《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结尾也有一段“花判”。可见，“花判”是话本小说中的一种体式，《醉翁谈录》中专门列出“花判公案”一类，是这种体式的一些“范例”，供

说话艺人或编写话本的人参考。

⑬《醉翁谈录》中，其编次体例不大严谨，有同一类而分散在各集者，如乙集卷一为“烟粉欢合”类，而己集卷一又是这一类，其间，相隔数集。也有一类之中仅存一篇者，如甲集卷二“私情公案”类，只有《张氏夜奔吕星哥》一篇。就此情形看，《醉翁谈录》似是一部尚未最后编订的书。

⑭《宋元词话》，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2月版。

⑮见《宋元词话·序引》。

⑯附带提一下，《醉翁谈录》中的“花衢记录”，凡7则，都是关于妓院生活的一些记录，似是给未能熟悉妓院生活者提供参考的。这7则，亦见于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卷七、卷八，文字略有出入；而其最早的出处是唐孙棨的《北里志》。这若干则文字，屡被转录，可见它们已经成为描述妓院生活者的必读材料。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以妓院为背景的风流故事是相当盛行的。

⑰见《太平广记》卷六八，第二册，第421页，中华书局1994年4月版。

责任编辑：呼 韩

（上接第101页）付出的惨痛的代价，都在城市文学中得到了鲜明的展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乡土文学标志出人类文明起步的地方，它为人类美好而纯真的一面留下许多弥足珍贵的记忆，为人性的纯朴与善良唱着永恒的赞歌。而在城市文学中，我们则可以看到人类在其文明进程中走过了怎样的历程，到达了何方。因此，对于城市文学，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其本身，而必须在乡土文学的参照下，在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进程中去研究。也只有把城市文学纳入人类文明历史的进程去考察，才能够真正认识、理解城市文学存在的巨大价值与意义。

①见曾镇南《“都市文学”琐谈》，《芳草》1987年第12期。

②见雷达《关于城市与文学的独白》，《天津文学》

1986年第10期。

③见王干《老游女金：90年代城市文学的四种叙述形态》，《广州文艺》1998年第9期。

④《激战秦淮状元楼——'94中国城市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话题》，《贵州日报》1994年8月31日。

⑤幽渊《城市文学理论笔会在北戴河举行》，《光明日报》1983年9月15日。

⑥张韧《现代都市意识与城市文学》，《开拓》1988年第1期。

⑦戎东贵、陆跃文《新时期都市文学的发展和走向》，《当代文坛》1990年第1期。

⑧司徒杰、钟晓毅《圆梦都市文学》，《广州文艺》1995年第2期。

⑨李洁非《城市文学之崛起：社会和文学背景》，《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3期。

责任编辑：呼 韩

从书坊到书斋：乾嘉时期通俗小说的人文化及其文化内涵

李明军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98 级博士生, 北京 100875)

[摘要] 乾嘉时期通俗小说, 特别是文人独立创作的通俗小说, 关注焦点有了很大的变化: 即由书坊转向书斋。把这些文人创作的小说与 16、17 世纪的通俗小说和乾嘉时期的通俗故事以及文言小说进行比较, 就会发现这种变化的意义。只有深入了解乾嘉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 才能理解文人小说及其感伤情调的内涵。

[关键词] 书坊 书斋 文人小说 关注焦点 感伤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1)03-0108-05

一、从书坊到书斋

从物化形态来说, 常把唐代的俗讲变文作为通俗小说的源头。宋元时代的说唱艺术促成了白话通俗小说的诞生。因此, 通俗小说从诞生之日起就有了浓重的、无法抹除的商业色彩、市民色彩, 就与书坊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存最早的话本、讲史平话皆为瓦子所刻。明代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的兴盛, 书坊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冯梦龙受书坊主之托编辑了“三言”, 凌蒙初在“二拍”的序言中表示书坊主请求无法推脱, 只好编改当代故事。^①像余象斗、余邵鱼为代表的余氏家族, 熊大木为代表的熊氏家族, 都经营书坊, 也都编写了许多通俗故事书。明代后期话本小说、历史演义、神怪小说等的成批刊行, 书坊间的仿效和竞争当是重要的因素。明清之际的时事小说繁盛, 而这些小说又多文

字粗糙, 相互间的抄袭, 改头换面的重刻(如《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和《魏忠贤轶事》写魏忠贤事;《新史奇观》、《新世弘勋》、《顺治皇过江传》与《铁冠图》、《铁冠图分龙会》等皆写李自成事), 无疑为书坊主操纵的结果。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也应作如是观, 如烟水散人在《赛花铃》的题辞中述说了书坊主请他作美人书的情况。

从某种意义上说, 有许多通俗小说是书坊制作出来的。也许可以举出独立于书坊运作系统之外的例子。如蒲安迪就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和《金瓶梅》称为典型的文人小说,^②把《醒世姻缘传》也称为“文人小说”。^③实际上它们是由传统的民间说唱素材演化而来, 不是文人的独创。作品中的不少意蕴其实都是素材本身所固有的。

高素质文人的参与, 如李贽、汪道昆、金圣叹、

毛宗岗等人在通俗小说完善化的道路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真正的文人小说必须由书坊回到书斋才有可能诞生。因为文人小说应是个人的创作，或称作密室创作。明末清初这一转变已经开始，如《西游记》、《水浒后传》和李渔的某些白话短篇小说，都有了较为鲜明的文人品格，但直到乾嘉时期才形成大的趋势。乾嘉时期最著名的通俗小说如《儒林外史》用了十多年时间（乾隆四至十四年）才完成，《红楼梦》据作者说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瑶华传》在完成后又反复修改了四年（嘉庆四至八年），另外如《绿野仙踪》、（乾隆十八至二十七年）《歧路灯》（乾隆十三至四十三年）、《野叟曝言》等用了作者十年、几十年，甚至一生的时间。用如此长的时间显然不是为了赢利，不是受书坊主之托而写作。实际上，许多小说创作完成后并未立即付印，而是藏于家中，或仅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于亲朋间，如《儒林外史》于乾隆十四年前后定稿，至嘉庆八年才有卧闲草堂本问世，《红楼梦》乾隆十九年前后完成，直至乾隆五十六年才有程甲刻本问世，《歧路灯》乾隆四十二年定稿，至清末民初才有印本，《希夷梦》完成于乾隆五十一年，至嘉庆十四年才有刊刻本，而《野叟曝言》的作者甚至不愿将此书付梓。

不急于刊刻行世，不是由于不够重视，恰恰是由于作者将小说创作当作个人的事业，当作可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著述。如《雪月梅传》的作者镜湖逸叟表示要以此书而“立言不朽”：“惟念立言居不朽之一……予虽不克如名贤著述，亦乌能尸居澄观，噤不发一语乎？”^④李荔云为《西湖小史》写序说：“仆与蓉江厚交十余载，知其词赋文章终非沦落者，今有《西湖小史》一书，已足以藏之名山，传之来世矣。”^⑤虽然以前也有人将通俗小说和史传相比，但有的出于愤激之言，有的仅仅抱着欣赏的态度，而且毕竟呼应者了了。相比之下，乾隆时期的文人小说家真正意识到了通俗小说独立存在的价值。如果说书坊推动了通俗小说的发展，那么可以说是

从书坊到书斋的转变促进了文人小说的产生和繁荣，促进了近代小说意识的产生。无论如何，小说创作应为“创作”而不是“制作”，是个性化的事业，而个性化只有在书斋中才可能实现。当然，从书坊走向书斋只是近代小说产生的第一步，因为只有小说再一次从书斋步入书坊时，近代意义的小说才可能真正诞生，但这一步却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二、从外到内

所有的文学创作都应是心灵的创作，但初期的通俗小说，由于书坊的介入，更多的是关注外在的社会现实：历史的循环，王侯将相的荣衰，英雄的传奇经历，才子佳人的艳遇，危机四伏的商业冒险，小市民的悲欢离合等等。明末清初的话本小说作者把小说当作教化的工具（所谓醒世、警世、喻世、醉醒石、清夜钟等），最终流于外在化、现象化。清初的话本小说作家如李渔、圣水艾衲居士把话本小说转化为个人抒写媒介，显示了通俗小说由外向内的转化趋向。

乾嘉时期的通俗小说文人化、个性化的转变是非常缓慢而稳重的；它们相对于同期仍很流行的通俗讲史小说来说，显得结构单纯、意义明了，解读它们似乎不需要高深的哲学素养，而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些文人小说家并不想把小说写成隐奥的形象化哲学讲义，他们渴求的仅仅是个人抒写；个人的怀抱、个人的事业功名梦、个人的才华。如：夏敬渠“足迹遍天下，抱负奇异，郁郁不得志，乃发之于书”，^⑥即为《野叟曝言》。《绿野仙踪》是“呕吐生活”、“笔代三挝”，作“衲衡之骂”。^⑦乾嘉时期文人小说关注的焦点也因此有了明显的变化，对与个人紧密相关的问题的关切掩住了对社会问题批判的热情。对士人来说，科举功名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通俗小说从开始即关注市民问题，文人参与通俗小说的写作后，科举在通俗小说中得以反映，如冯梦龙编写的“三言”中即有《老门生三世报恩》、《赵伯升茶肆遇仁宗》、《钝秀才一朝交泰》、《李公子救蛇获称心》等篇，明清之际的话本小说《清夜钟》

第五回和第十三回,《鸳鸯针》第二卷等。但这些小说或充满功名从天而降的侥幸,或着眼于阴德报应,或侧重于道德批判。乾嘉时期的通俗小说才集中地对科举制度本身进行反映批判。这一方面是基于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等对八股考试制度的批判,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清代的士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现实。有清一代,士人入仕之途异常狭窄,三年一乡试,五年一会试,士人的青春年华于等待中逝去。即使中式也并非即能入仕,国家官职位数有限,许多职位又为满人世袭,另外又有各种捐纳、恩荫之例,这就必然造成雍滞之弊;^⑧对汉族士人来说,还有一重无法消除的民族樊篱。在这样的形势下,比较清醒的士人站在科场之外,对之进行较为深入的反省批判。其中当然也有对科举功名的热念,如《跻云楼》中柳毅为科举功名而跋涉;但更多的是失望以至绝望,如《桃花扇》中侯、李二人不求功名,只愿安居乐业,《镜花缘》中唐敖对科举入仕心灰意冷,林之洋更视科举为畏途,《梅兰佳话》中的梅生在状元及第后也马上上表辞官,等等;也有对科举制度的更为深刻的否定与批判,如《儒林外史》揭示了科举制度对士人心灵的腐蚀,对人格的玷污,《红楼梦》把否定科举功名作为宝黛知心的关键因素,等。

但人人都有自我实现的愿望,士人否定了科举功名,也就只好将胸中抱负化为纸上事业。乾嘉时期的文人小说虚构了形形色色的事业成功的主人公形象。与以前的通俗小说相比,乾嘉时期的文人小说家不仅仅渴望功名富贵、佳人美酒,他们最迫切渴望的还是才华的发挥,事业的成功,个人价值的实现,《绿野仙踪》中的冷于冰学道成仙后,凭法力斩妖除魔,劝人向善,又充当总兵府幕僚,出谋划策,平定叛乱,摄取府库赃银,赈济灾民,救护朱文炜,帮助他建立不朽的功业,助林润得中进士,终于了结严奸一案;《希夷梦》的作者虚构了浮石岛国,让韩速、仲卿于岛国治河理砂,除奸平叛,安邦定国,使浮石大治,“文德端淳,武备整暇”;《雪月梅传》中的岑秀历经磨难,终于成为文武全才、

智勇兼备的抗倭英雄。……这些小说主人公无疑为作者的化身,作品中的辉煌事业是他们的白日梦。这种积极用世的精神,固然与清前期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也不应忽视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特别是乾嘉考据学以恢复儒家经典的本来面目为己任,原始儒家的济世理想再一次被张扬。不少学者反复表示,他们从事考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用世,如汪中说:“中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⑨戴震说:“君子或出或处,可以不见用,用必措天下于治安。”^⑩卢文弨说:“盖圣贤当其不遇时,则瞻一身而犹不足,然其具固在,我实足以拯一世而有余。”^⑪……值得注意的是,通俗小说的作者和考据学者一样,多为科举不第,怀才不遇者,如吴璿、李百川、丁秉仁、张南庄、汪寄、黄瀚、黄耐庵、陈天池、夏敬渠……相同的境遇,相同的抱负,使学者和小说家获得了强烈的共鸣。

文人小说中女子形象也有了很大的改变。自小说诞生以来,女子就一直是小说中的重要角色,在文人创作的小说中,女子或为文人表现自己风流的媒介,或为文人怀才不遇的寄托。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佳人开始由才美型转为胆识型,但她们的胆识仍多表现在与破坏阻挠她们的爱情的坏人的斗争中。乾嘉时期的文人小说中仍有对不幸女子的同情,但更多的是对她们文才武功的赞美,如螭娘和虬儿帮助柳毅申明冤狱,斩捕妖孽,诛灭叛逆,屡建奇功(《跻云楼》)。《镜花缘》设置了一个男女位置颠倒的女儿国,又让才女参加科举考试,对女子倾注如许多的关注,难怪有的论者把它称为张扬女权之作。《儒林外史》中的沈琼枝不满于小妾的卑微地位、寄生生活,靠自己的能力谋生,走出了解放的关键性一步。对女子的同情、理解和赞美,固然是明代以来个性解放思潮的沿续发展,更为重要的应该是小说作者在女子身上寄托了自己无法施展的抱负,发觉了士人走出书斋,改革社会,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女子走出闺阁,步入社会的相似之处,

同样迫切，也同样艰难。

比起以前的才子佳人小说，这一时期的小说更突出了男女的平等，在男女才貌相悦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相知的因素，如《红楼梦》中宝黛的爱情已有近代爱情影子，《儒林外史》中庄征君、杜少卿两对夫妇相亲相爱的婚姻生活，一改以前的虚幻的浪漫，显得朴素而真实。爱情婚姻是人生的一大主题，由爱情婚姻而诞生的家庭是艰难跋涉后的憩园，更是士人治国平天下理想破灭后最后的避风港湾，这也许是文人小说对婚姻如此关注的原因，是《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对爱情倾注那么大心血的原因。

当然，这一时期的文人小说也注意到了其他社会问题，如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对官场腐败的诅咒，对道德堕落的警示等等，但这一些比起与文人切身相关的问题来，远不重要，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作为背景来使用的。

科举、事业、才华等问题也为普通大众所注意，但无疑在他们关注的焦点之外。文人小说家的创作动机即决定了他们的作品不是大众读物，有的小说家甚至在序跋中作了明确说明，陶家鹤为《绿野仙踪》写跋，就指出“此书与略识几字并半明半昧人无缘，不但起伏隐显穿插关扭，以及结构照应，彼读之等于嚼蜡；即内中事迹，亦未必看得透也”。^⑫

三、从激情到感伤

通俗小说本是市民文学。如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既表露了市民大众对历代帝王秘史、英雄征战的好奇，也表现了编著者评价历史、供现实借鉴的雄心。早期的话本小说把生活本身作为欣赏对象，表达了市民对生活的关注和热情，也反映了编写者的乐观信念。

然而中国文学有感伤的传统，也有以感伤为美的审美习惯。通俗小说兴起后，正统诗文中的感伤也涌入小说中，特别是在文人参与编写修订后。如《三国演义》卷首对历史虚无的慨叹，有浓重的历史幻灭感，自不待言；小说中魏的胜利，蜀的灭亡，也意味着正统道德的失败，有的论者就认为体现了

道德悲剧意识。^⑬但以前的通俗小说中感伤情绪的流露是偶见的，乾嘉时期文人小说中的感伤情绪、幻灭意识则较为普遍，如考虑到康乾时代是清王朝最为繁荣的时代，这一现象更值得注意。

《希夷梦》中韩仲二人一心反宋复国，梦入浮岛，后知宋又为元所灭，顿看破历史循环的空幻，抛弃尘世修道成仙；《锋剑春秋》中齐国被灭，诸神离去，孙膑痛哭：“为臣非不欲尽忠报国，奈天命已定，臣亦不能逆天行道也。”《瑶华传》中瑶华知明朝气数已尽，感叹“天命使然，难以回迨”，流露出时势不可逆转，人力无可奈何的感伤，这是一种深沉的历史幻灭感。《红楼梦》的作者虚构了人间天堂大观园，汇萃了凝天地精化，成为人间美好象征的女子，演出了超尘绝俗的爱情故事，但大观园不久即随着贾府的没落而败落，大观园中的女子或死或散，作者借石头的历练将富贵荣华归为一梦，而一僧一道的倏忽而来、倏忽而去，更加强了人生虚幻、万缘皆虚的感觉；《儒林外史》，在小说临近结尾处，感伤色彩渐趋浓厚，“三山门贤人饯别”，虞育德对杜少卿说的话平淡的语调中蕴着浓浓的悲凉，最后作者以一曲《沁园春》结束全书，“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这是作者儒家理想主义破灭后的深沉无奈的叹息。在更多的情况下，感伤是一种余韵，在小说主人公的人生归宿选择上透露出来。比起前一时期的小说，这一时期的小说更多地写到主人公最后绝意仕进，归隐田园，优游卒岁，如《歧路灯》中谭绍闻在黄岩县令任上一年即借母病辞归。《梅兰佳话》中梅生状元及第后即上表辞官，敲棋赋诗于林下……。

用感伤主义的文学传统无法解释在号称盛世的乾嘉时期中如此普遍的文学现象。文人的穷愁不遇当是原因之一。文人小说的作者如李百川过着“风尘南北，日与朱门作马牛”的生活；^⑭丁秉仁一生游幕各地以求温饱；^⑮张南庄“身后不名一文”；^⑯汪寄死后不久，子贫为佣；^⑰曹雪芹晚年绳床瓦牖，食粥度日；吴敬梓家财散尽后穷困潦倒……他们把对个

人身世的感伤与对乾嘉时期由盛转衰的社会现实的直感结合起来,转化为小说中的历史、人生的幻灭感。更多的文人小说中充满的是壮志难酬、理想破灭的伤感。如《九云记》中杨少游建功立业,出将入相,经圣僧点化,才醒悟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春梦;《儒林外史》对儒林丑类的批判,对泰伯祠祭祀场面的不厌其烦的渲染,对汤镇台、萧云仙政绩的描写,都流露出作者对儒家理想主义的向往、憧憬和执着,而断垣残壁、斜阳、凄清的琴声,还有青灯古佛,在结尾处融成感伤的尾音。这些小说中前半部的用世激情和后半部特别是结尾处的幻灭感伤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也就在这对比中可看出作者思考的深刻、探求的执着、选择的艰难,因此文人小说中的感伤中蕴含着无奈,是无奈的感伤。所以,这些感伤小说既是对士人命运、对儒家理想的哀挽,也是对社会现实的委婉的批判。“我意先秋感摇落”,他们或许只是将个人的身世之感写入小说,而后人却能从中体味到盛世的末路气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感伤小说是时代的挽歌。

这种挽歌情调只有文人小说才会具有,因为只有文人小说家才脱离了书坊的操纵,回到书斋,对社会人生进行冷静深入的思考。“小说这种散文艺术是密室工作的产物。”^⑪“作者在密室里写小说,读者通过印刷媒介在密室里阅读它,当作者和读者一对一关系成立之时,即是近代小说形成之日。”^⑫这种创作和阅读的一对一关系在《金瓶梅》上已经初备,因此中野美代子把《金瓶梅》称为近代小说的先驱,但她否认《金瓶梅》是近代小说,进而否认中国有真正意义的近代小说。^⑬实际上,虽然由于印刷出版技术和资金的限制,乾嘉时期通俗小说传播的速度和范围远比不上近代,但毕竟文人在书斋中创作的小说已通过印刷或以手抄的形式,被人们在密室里阅读,里面的故事是不适于在喧闹的都市公

开宣讲的,因为它们讲述的是个人的故事,倾诉的是个人的心声,表达的是富于个性色彩的感情。因此,如果把乾嘉时期的文人小说称作近代小说的开端,也不能说是夸大其辞的。

①《二刻拍案惊奇序》,《二刻拍案惊奇》,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

②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

③见乐黛云、陈珏《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第31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④镜湖逸叟《雪月梅传自序》,《雪月梅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⑤李荔云《西湖小史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3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⑥西岷山樵《野叟曝言》序,《野叟曝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⑦李百川《绿野仙踪》自序,传抄本。

⑧刘兆琛《清代科举》,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8年版。

⑨汪中《与朱武曹书》,《述学》卷六,道光光绪间伍氏刊本。

⑩戴震《戴东原集》卷九,第12页,民国年间上海涵芬楼影印经韵楼本。

⑪卢文弨《与陈立三书》,《抱经堂文集》,乾隆乙卯年刊。

⑫⑭李百川《绿野仙踪》自序,传抄本。

⑬齐裕焜《明代小说史》,第59-7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⑮参考张俊《清代小说史》第26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⑯海上餐霞客《何典跋》,《何典》,工商出版社1981年版。

⑰《南游两经蜉蝣墓并获〈希夷梦〉稿记》,《希夷梦》,辽沈书社1992年版。

⑱⑲⑳参见中野美代子《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第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责任编辑:呼 韩

记明黄君蓐刻本《水浒牌》

王贵忱

(广东中山图书馆研究员, 广东 广州 510055)

[摘要] 本文对木刻版画《水浒牌》的版本源流作了辨析, 认为黄君蓐刻本是第一刻, 黄肇初本为后出, 而郑振铎所藏本则又翻自肇初本。

[关键词] 黄君蓐 水浒牌 木刻版画

[中图分类号] G25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1)03-0113-03

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醉耕堂刻本《评论出像水浒传》七十五卷, 附翻刻陈洪绶绘本《水浒叶子》。其后重刊《水浒传》, 间有依此图像传刻者。相沿翻造, 鲜有精品, 故《水浒叶子》向称无善本。长乐郑振铎(西谛)先生获单刻本《水浒叶子》, 初以为明季原刊本, 收入郑氏所编《中国版画史图录》。吴县潘景郑(承弼)先生别藏一本, 书口以《千家文》“天地玄黄”至“寒来暑往”记叶码, 凡二十叶, 半叶一图像, 共四十图像, 朱武一图下书口处镌有“黄肇初刻”四字。两本图像相同, 仅以郑本无叶码, 无刻工姓名为少异。承弼先生藏本后亦归郑氏。^①经西谛先生对勘, 谓以潘本为胜, 其自藏本是清初翻刻, 潘本为原刊, 事见郑著《劫中得书记》。其后郑氏重印《中国版画史图录》, 即采用潘本替换初版底本, 以此图录本流传较广, 诸家引述明清木刻版画者, 率多举郑本或潘本为原槧云。

余藏此帙为白鹿纸(此种纸自明万历后始多见, 色泽类棉纸, 有厚薄之分, 唯纸质纤维短, 拉力差)初印本, 版框高市制五寸四分, 宽二寸七分五, 图像与郑、潘本同, 二十叶四十图像俱全, 刻印极为

精美。卷首有张岱(宗子)序文《缘起》二叶, 王鏊《陈章侯画水浒叶子颂(有引)》一叶, 总二十三叶。此本无江念祖《陈章侯〈水浒叶子〉引》一文, 宗子序文、王氏颂文亦为他本所未见。查张岱《缘起》一文, 已收入其文集《陶庵梦忆》、《柳塘文集》二书中, 而题目作《水浒牌缘起》为少异。径以两种文集之文与此本《缘起》对读, 三种文本间有异同, 盖宗子为老莲《水浒牌》作《缘起》乃鼎革前之旧事, 而《陶庵梦忆》、《柳塘文集》二书则为结集旧作新著成书于入清之后, 晚年手订文集致有异文耳。查周亮工所著《读画录》称老莲有“《水浒牌》行世”语, 适与敝藏本书名相合, 原作《水浒牌》可知。王鏊颂文谓之《水浒叶子》当是别称, 要以著述家张岱、周亮工文中所举《水浒牌》为初刻本书名, 《水浒叶子》则为翻刻本书名。王氏颂文为初刻本原有, 江念祖引文乃为翻刻本之新作。顾翻刻本之改书名、易序文, 为书林重刊旧本之常例也。

余藏本以《千字文》记叶码与潘本同, 唯朱武图下书口处则镌“徽州黄君蓐刻”六字与潘本异。

据郭味渠先生考证，黄君蓍名一彬，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参与刻《程氏墨苑》，万历年间又刻有《王李合评北西厢记》、《闺苑图说》、《青楼韵语》，天启间则刻有《彩笔情辞》及《西厢》五剧等书插图，为以徽派版画著称之黄姓族中之佼佼者。其弟名黄一中，字肇初，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崇祯至顺治间刻有《水浒叶子》。^②是则黄氏昆仲皆为徽派著名版画家。见于著录和传世之黄君蓍版画，未见天启以后作品。就其传世作品纪年推之，其弟黄肇初当小于君蓍二十岁上下，从事版画创作应在崇祯中期之后。周亮工《读画录》卷一称：

陈章侯……初画《楚辞》像刻于山阴，再刻《水浒牌》行世。及崇祯间召入为舍人，使临历代帝王图像，因得纵观大内画。画乃益进，故晚年画《博古牌》略示其意。

所云刻《楚辞》像者，盖指老莲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为萧山来钦之所著《楚辞述注》五卷一书作插图，即《九歌图》一卷。唯万历原刊本《九歌图》似无传本，仅知有崇祯十年（1638年）刊本及康熙三十年（1691年）重刊本，可知周氏之说信而有征。所称《水浒牌》初刻成于崇祯之前，则与黄君蓍从事版画年代相符，亦与笔者在《跋明黄君蓍刻本〈水浒牌〉》一文中谓“一彬本或为天启年间所刻者”^③相合，而在稍后出版之王璜生先生著《陈洪绶》一书附录《陈洪绶年表》，更明确提出老莲“作《水浒图卷》，凡四十人”，是天启五年（1625年）的事。^④余谓《水浒牌》刻于天启年间乃推测之说，璜生先生称《水浒图卷》成于天启五年，乃属引述学者考证之说，是可信者。至于郭味渠先生称老莲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作《水浒叶子》，疑即肇初翻刻其兄君蓍本，即潘景郑先生旧藏之版本。郭氏谓顺治年间刻本《水浒叶子》者，当属再次覆刻者，抑或为西谛先生初次收入《中国版画史图录》之版本亦未可知。味渠先生作古已多年，不得求教请益矣。笔者尝取敝藏本与影印之郑、潘二本对比，三种版本图像相同，而君蓍本刻画精细，毫发入微，

影印本则相形见绌，非但白描线条较粗率，且间中有作省笔处，不逮君蓍本远甚。考史验物，可知君蓍本是第一刻，肇初本为后出，度郑氏本又翻自肇初本者。

言明清木刻牌画，必不遗《水浒叶子》、《博古叶子》二书，然于《水浒叶子》刊本源流虽版画史专著亦未能明辨，博雅如西谛先生者犹未能详检《陶庵梦忆》、《读画录》诸书，更不及目验黄君蓍原刻本，是以物之显晦莫测，固非学识所可力致。原刻本湮没无闻300年，竟得之一旦，往获天水古本无此之快！窃以为天启刊本《水浒牌》久已不见公私书目著录，原以为是传世仅存之本。近见严宝善先生编录《贩书经眼录》一书，收录有《明末刻本陈章侯水浒叶子》存三十二叶，并称：“明末刻本。棉纸一册。据郑振铎《劫中得书记》云，乃黄肇初刻。此本首张岱序，缺前一页。”^⑤案严氏著录者，应是张岱序初刻《水浒牌》本，非全帙也。据此可知原刊本《水浒牌》，至少有两部留存宵壤间，特一全一残耳。于是乎参考诸家旧作新著，率尔成此小文，得毋为明珠投暗之讥否！

后记：

我旧藏的这本黄君蓍刻《水浒牌》，原是广东顺德严邦英氏故物，往承一位书友见赠的。25年前，由我转赠给李一氓丈。李老为此书写了一篇论证精详的跋文，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79年6月影印出版了宣纸线装本，随后又出版过玉扣纸普及本。

我的上述这篇小文，原是在70年代初草成，其后经过修改，正式发表在1996年3月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学土》创刊号。刊出后发现原稿错误，也有误置之字，尤以近年发现了新资料和新研究成果，深感有必要改写一过。但也仍如初衷，意在说明这部颇有名气的晚明木刻版画杰作却是在广东发现的。还需要说明的是，此书确是原刻初印本，但由于虫蛀较多，加上原裱工不善，也未描补虫蛀处，从影印效果上看好像是版片断裂的后印本，其实是蠹鱼所蛀的结果。再者是，此书前有张岱

《缘起》一文，张氏是明末清初著名散文家，无须介绍，而本书《颂文》作者王璠则须作简要介绍。王璠表字予安，别署菌阁主人，活动于明末清初间，浙江山阴人。崇祯举人。尝客袁崇焕幕。王氏与广东番禺屈大均友善，唱和诗见《屈翁山诗集》。屈大均撰有《王予安先生哀辞》一文，略纪其行谊和袁崇焕蒙冤事，并将崇焕遗文授托给大均，俱详康熙刻本《翁山文钞》卷十。

我的这篇拙文成稿后，曾持请已故广东著名老书画家卢子枢先生审阅。卢老曾协助过藏书家莫伯骥先生编制《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娴熟古籍版本目录之学，是我在广州时常请益的老学者。先生对小文多有鼓励辞，1977年尝为之写过一篇题记，录下：

余于木刻版画一道，向鲜问津。然曩昔所见刻本刀法，皆未有如是本之精细绝伦者，人物须眉毕肖，线线存神，巧夺天工，深得老莲三昧，非名工巧手，安能为此！昔郑西谛先生得明末清初覆刻本，便惊喜若狂，叹为人间孤本，并妄定为原刻。设若得睹是本，则又不知作何话语耳。贵忱先生得此，考据甚详且精，定为原刻，诚可信也。丁巳大暑，有幸获睹此人间秘本，叹为观止，因题此以志眼福。七十八翁子枢于羊城不蠹斋。^⑥

其后，于80年代初将这篇小文分别寄呈周叔弢、潘景郑两位先生。弢翁是德高望重的著名藏书家、古籍版本学者，我在50年代初与先生邂逅于津门，是我初涉版本学的启蒙业师。其后因循未尝通候20余年，自1980年初才又得向先生请教，承老人家不弃，在其晚年犹时赐教言诱学不绝。潘景郑先生是文史学界名宿、黄肇初本《水浒叶子》原藏主。我少时尝读先生书，也是近20余年中时常叩教的老师。在我致力学习古文献的过程中，周、潘两位恩师时赐教言，对偶有一得之见，便给以鼓励，即如对《水浒牌》版本问题探讨时，他们在来信中则时致策励辞。现将周、潘二师来信中有关《水浒牌》

部分摘录出来，以见老辈学者对后学寄期望之诚。

附一：周叔弢先生书札摘录

贵忱先生惠鉴：昨奉手书，诵悉一切。图书馆学刊^⑦收到，谢谢。陈章侯《水浒牌》跋文拜诵一过，分析入微，钦佩之至。《水浒牌》与《水浒叶子》之命名有先后之分，《水浒牌》之模刻，又有黄氏兄弟之别，非经目验无从辨别，版本之学殊不易也。……周叔弢上言，五月二十七日。^⑧

附二：潘景郑先生书札摘录

贵忱馆长大鉴：月前颂到大著《水浒牌》论文。拜诵之下，深仰阁下探索版刻精析入微，藉开茅塞。敝藏曩时以为最初刻本，当时西谛初刻履本，即举以为赠。今读邨架藏本，更在其先。知书囊无底，非如公之真知灼见，不能达此深微也。敬佩，敬佩。

西谛遗札与弟者，尚存十余通，今年已经登载《社会科学战线》矣。尚有希白先生遗札数十通，亦拟陆续刊诸杂志中，俾故人遗痕留得此鸿泥也。专此布谢，顺颂公绥不具。弟潘景郑手顿，五月一日。^⑨

①⑨《潘景郑先生书简》，可居室影印线装本第8页，（1981年5月1日来信）1995年5月，广州。

②郭味渠编著《中国版画史略》第三章第四节《徽州版画的发展》和第四章第五节《陈洪绶和他的版画创作》，朝花出版社1962年12月。

③苏晨主编《学士》第一卷载王贵忱《跋明黄君蒔刻本〈水浒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3月。

④王璠生著《陈洪绶》附录《陈洪绶年表》，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年12月。

⑤严宝善编录《贩书经眼录》第37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

⑥《卢子枢书画集·序》，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5月。

⑦此指广东图书馆学会刊物《广东图书馆学刊》，创刊于1981年1月，办公地址设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内。

⑧《周叔弢先生书简》，可居室影印线装本第9—10页，（1981年5月27日来信）1994年，广州。

责任编辑：呼 韩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评李文初教授《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徐国荣

(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32)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1)03-0116-04

相比于隋唐及其后的文学而言，汉魏六朝文学有其特殊性，其一，“文学”的概念由朦胧到清晰，但具体过程还需要论证；其二，汉魏六朝 800 年间，各种学术思潮交杂其中，道教和佛教两大宗教也从诞生和传入到逐渐发展壮大，与文学的关系始终纠缠不清；其三，许多文体开始孕育并发展成熟，文体彼此之间往往有交互的关系，但由于资料的匮乏或残缺，若要对当时某种文体作深入的研究并不容易；其四，800 年间战乱频仍，许多典籍遭到破坏，或毁于兵燹，或坏于人为，致使今天的研究常常遇到资料上的困难，地下实物也由于掘墓之风和魏晋六朝之薄葬而于文学研究少有帮助；其五，一系列牵涉到文学的“文化”问题需要清理，如六朝家族与文学，文学自觉的标准与概念，玄学与文学的关系，儒道玄释的合流，情与礼的争端，等等；其六，由于 20 世纪文学研究从古典转入现代型态，文学研究常受先验理论的影响或意识形态化，而汉魏六朝文学中的许多问题恰好比较敏感，因而常常容易受到主观意识的干涉，如汉赋曾被作为“死文学”和“贵族文学”的代表，骈文成了“形式主义”的代名词，玄言诗与“现实主义”相悖，宫体诗被冠以“色情文学”的帽子，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复杂性，而对于研究者——特

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学人来说，除了自身的学养之外，如何保持平静的学术心态，出以尽可能客观的描述与判断，往往成了能否取得成就的关键之一。从近年来这方面卓有成就的几位学者的文集来看，如曹道衡先生《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汉魏六朝文学论文集》、《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周勋初先生《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刘文忠先生《中古文学与文论研究》，陈庆元先生《中古文学论稿》等等，无不体现出专与博的兼善、文与人的合一。同样，本文所推介的李文初先生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①一书，能够于平实处现风华，于沉静中见尊严。孔子云：“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既可论人，亦可论文。

汉魏六朝文学，时间跨度较长，值得研究的问题固然不少，但若能扣住几个重要的环节，亦可纲举而目张，见出整个中古文学的风貌。综观《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可以看出，虽然作者研究的视域较广，而中国文学的自觉问题、陶渊明和陶诗、山水诗和山水文化这三者是最为着意关注的，而这三者又恰好是中古文学研究中的兴奋点。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的自觉问题是鲁迅先生 1927 年在广州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时提出的，尽管有论者认为，鲁迅此说可能得

之于日人铃木虎雄的观点，而且鲁迅的行文未必是认同这个结论，只是对他人意见的描述，^②但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者来说，他们无疑是从鲁迅这里接受影响的。况且，即便鲁迅真的不认同这个结论，但此后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基本上认定此说是鲁迅所发，并认同鲁迅的看法的。时至今日，对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究竟始于何时，仍然还在争论，其中一种最强劲的声音是“汉代说”，如北京大学张少康教授认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是从战国后期《楚辞》的创作开始初露端倪，经过了一个较长的逐步发展过程，而到西汉中期就已经很明确了，这个过程地完成，我以为可以刘向校书而在《别录》中将诗赋专列一类作为标志。”^③张先生进而将文学独立和自觉的标志规定为下列几个因素：一、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是文学观念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二、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是文学独立和自觉的重要标志；三、多种文学体裁的发展和成熟是文学独立和自觉的重要佐证；四、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新特点表明文学已经独立和自觉。同样，詹福瑞先生也从文士和经生的文士化等角度认为汉代人对于文学已经有了自觉意识。^④龚克昌先生则以《西京杂记》中所载司马相如赋论为主要依据，认为汉赋是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⑤

对此，李教授一连有三篇论文专门谈这个问题。他认为，所谓文学的“自觉”，其涵义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独立发展；二是按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进行创作。而文学的“自觉”又绝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为先导的。若没有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肯定，没有尊重人的个性人格的观念的形成，就不可能有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而之所以把“文的自觉”与“人的觉醒”联系在一起谈，李教授指出，是因为它们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内在的因果关系，或者说，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对于文学的独立、自觉的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引导作用。作者在行文中不仅从理论上给予论证，更

用许多文学实践的具体事例来说明这一点。这样的研究，先是把问题限定在可以讨论的范围之内，使得探讨时能够有的可依，不至于汗漫无际，从而才能得到较为公允平实的结论。因此，他抓住“人的觉醒”这个纲要，使得讨论的标准尽可能客观化。而他对“汉代说”给予分析的时候，也同样对其标准把脉，使自己的立论更加谨严。由于文学自觉牵涉到文学观念及自觉标准等问题，所以，李教授在用具体事例小心求证的同时，又纵横捭阖，揭示了许多文化史的背景，用以证明自己的论点，还对此进行理论审视。其实这是针对具体情况而不得不然的，作者的兴趣和长处未必在于高谈大论，而恰恰在于“小题大作”，于细微处见精神，见微而知著。这在陶渊明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的重镇，出现不少大家，如古直、王瑶、逯钦立等先生，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此，且成就斐然，李教授亦曾于 1986 年出版过《陶渊明论略》一书，对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而在《汉魏六朝文学研究》中有关陶渊明的研究却以考释为主，尤以陶渊明享年研究最见功力，同时在考释中可见出作者的艺术感悟能力。

关于陶渊明享年，历来有 63 岁、76 岁、51 岁、56 岁、52 岁、59 岁诸说。陶渊明死后，其友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只说“春秋若干”，没有说具体岁数，但几十年之后的沈约却在《宋书·隐逸传》中明确说享年 63 岁，不知何据。这个说法到南宋时才由张缜提出质疑，后来则歧见纷呈，莫衷一是。袁行霈先生在《文学遗产》1996 年第 1 期上发表《陶渊明享年考辨》一文，对传统的 63 岁提出了坚实的怀疑和否定，而又重新标举 76 岁说，从而又引起了新一轮的论争。李教授对此写了好几篇论文，认为梁启超的 56 岁说最为可信。在《关于陶渊明的享年问题》一文中，他首先肯定了袁行霈先生为怀疑和否定 63 岁说所作的充分论证的功绩，同时，也正是顺着袁先生的思路，又联系陶渊明诗文的内证，

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袁文主要是从版本的渊源上进行考察，从中提示出历史上人们为维护沈约的63岁说，是如何篡改陶渊明《游斜川序》中的“五十”为“五日”的具体行迹的。李教授对这种思路表示赞同，却更进一步用“理校的方法”来揭开这种妄改行径的种种破绽。其云：

《游斜川》诗的序明言“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辛酉”（年）、“正月”（月）、“五日”（日）即“时日”；若诗作“开岁倏五日”，全诗及序不交代作者“年纪”，与序文所言不符。若诗作“开岁倏五日”，从修辞上说，明显与序文“五日”重复。“开岁倏五口，吾生行归休”即序文所谓“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是慨叹年华易逝的；“吾年”即“吾”之“年纪”，“五日”指具体的五天，“日”不是年的概念，一年过了“五日”，有什么值得悲悼的呢？只有作“开岁倏五十”才既切“吾年”的语义，也在语境和情思上真正触动作者的心弦。故改“五十”为“五日”实为弄巧成拙之举。

理校虽是推论，然正如前辈学者所论校勘学方法一样，这是最危险同时也是最可靠、最直接的方法。像这样基于事理的推论，可谓鞭辟入里，恐难以翻案。接着，李教授又从“关于《与子俨等疏》的写作时间”、“关于《自祭文》中的‘老’”、“关于《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中的‘老夫’”、“陶集中关涉陶渊明年龄的数字问题”等“内证”中立论，或释典故，或溯语源，将问题引入深处，既补充了袁文，又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再谈陶渊明的享年问题——梁启超五十六岁说续论》中，李教授支持梁启超的56岁说，认为梁启超《陶渊明年谱》中所提八条证据中至少有三条是难以推倒的。在这些平实的叙述和论证中，既体现出作者良好的文风，又可见其扎实的功底，如从颜谏中“痼维痼疾”一句引出线索，以《左传·昭公二十年》、《说文解字》、《春秋左传正义》、《颜氏家训·书证》等书中的例证，

说明陶渊明最后死于“痼疾”，而且不会超过60岁。他又继续阐述了三个为梁启超未曾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对此作了进一步申论。在《陶渊明享年研究：历史的回顾与审视》一文，李教授不但对学术界的有关论点给予了总结，也对自己的立场作了确定。关于陶渊明享年问题，也许还会有争论，但无论如何，李教授的观点均能自圆其说，至少可以成一家之言。

如果说，上述关于陶渊明的研究可以体现出李教授的文品的话，那么，对于山水诗和山水文化的研究还能够体现出李教授的人品。

左思《招隐诗》云：“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山水作为大自然的象征，历来受到文人雅士的钟爱。晋宋之际山水诗和山水画的兴盛，更使山水文学和文化揭开新的一幕。李教授出于个人的秉性和兴趣，对山水文学和山水文化情有独钟，曾出版过《中国山水诗史》和《中国山水论》两部著作。与他的陶渊明研究一样，这其中蕴含着自己对研究对象浓烈的情感认同和共鸣。李教授早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师从著名学者游国恩先生，游先生的道德文章深深地影响着他。体现在为文中，是不尚浮华的平实文风；在为人中，则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反过来，为人又影响着他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思路。但即使是在这类易于赏析的文章中，李教授仍然固守着以小见大、不尚浮言的优良研究传统，我们举其中《“园柳变鸣禽”的版本异文及鉴赏问题》一文可略见一斑。

众所周知，谢灵运《登池上楼》诗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二句尤为人所激赏，谢客自己亦谓得之如有神助，不似人间语。但近有论者忽出歧见，根据北宋末年唐庚从《文选》辑录的《三谢诗》中的本句为“池塘生春草，园柳双鸣禽”，认定“园柳变鸣禽”一句乃是“后人以讹传讹”，实际上应是“园柳双鸣禽”，而且若作“园柳双鸣禽”意义更胜。这种以孤证而下武断结论的作法本是学术研究之大忌，由于牵涉到对这首名诗的理解，所以李

教授用了不少笔墨来为之剖析。他先从《文选》版本系统出发，又纵横古今，引用了《艺文类聚》、《百川书志》、《太平寰宇记》、《诗人玉屑》、《冷斋诗话》、《石林诗话》等古籍中的例证，说明“园柳双鸣禽”作为孤证之不可取。考证精而且博，不得不令人信服，无怪乎日本冈村繁教授见到此文后深表赞同。接着，作者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出发，说明“园柳变鸣禽”的优点以及作为“诗眼”的作用，与谢灵运当时心境的关系。文章有考证、有辨析、有欣赏、有理论，文质彬彬，灿然备矣。

书中若此之胜义，自是不止一处。细读有关山水文学的篇章，往往能感受到李教授冷隽笔调下对山水自然之美心驰神往的澎湃激情。正如他借《超世之想与诗境开拓》一文所说：“中国山水文学（尤其是山水诗）在晋宋之际勃兴，乃是人们超脱现实苦闷所作的‘适性’之求与大自然的山水之美彼此契合的结果。其积极的意义，不仅大大拓宽了文学的题材和作家的视野，而且自然山水本身所展示的广阔天地和无限丰富之美，也为我国诗人的艺术追求提供了永无止境的‘用武之地’。这或许是我国山水诗源远流长，诗境宏廓渊富，艺术生命历久不衰的根源所在。”若此之言，岂止写文，据笔者之了解，此亦写人也！

作为一部论文集，记下作者多年来这方面辛勤

笔耕的心得，内容自是不免庞杂，但能够集中在上述三个方面来写，说明作者发挥了自己的学术特长，又兼顾了自己的研究兴趣。同时，无论写什么样的内容，作者固定的路数基本上是不变的，那就是从事实出发，从能够掌握的材料出发，有多少材料便说多少话，即便是作具体作品的艺术欣赏，也能够紧守藩篱，不作无的放矢之空谈，这样做，反而比热衷于“方法论”者更能接近作品的艺术真谛，若读过其《〈西洲曲〉通释》一文，相信明眼人一看便知。也许，这样的研究已经有些“古拙”了，但这样的“古拙”或许正是我们最需要的。古人云：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或可况此也。

①《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38万字。

②参见孙明君《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③《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载《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第4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④参见詹福瑞《文士、经生的文士化与文学的自觉》，《河北学刊》1998年第4期；《从汉代人对屈原的批评看汉代文学的自觉》，《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5期。

⑤参见龚克昌《论汉赋》，《文史哲》1981年第1期；《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文史哲》1988年第5期。

责任编辑：呼 韩

字族层面的方言本字考

钟 奇

(暨南大学中文系讲师,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 本文考证几组方言字族, 试图通过确认各方言相关字族的方式, 来消解方言本字考中的歧见。

[关键词] 方言 字族 考释 本字

〔中图分类号〕H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326 (2001) 03- 0120- 03

方言本字考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正本清源才能理清语言演变的规律。但是, 方言本字考的结果又极易受非议。其中主要的非议之一是: 对于同一方言词 y , 张家考证其本字为 x_1 , 李家考证其本字为 x_2 , 王家考证其本字为 x_3 , 孰是孰非, 各据其理, 争论不休。在这种情况下, 与其强说 x_1 、 x_2 、 x_3 之一为 y 的本字, 强求一矢中的, 还不如说, x_1 、 x_2 、 x_3 为 y 的本字族, 减低误断的风险, 从更广、更高的层次看待同一问题。

这种特别需要从字族层面进行方言本字考的情况又可细分为如下几种。

1. 考释出来的一族字 x_1 、 x_2 、 x_3 、…… x_n 中个个都与方言词 y 音义接近但又不是完全同音, 即 x 族字各自从音义的不同方面围绕着目标 y 打转转。这种情况表明方言词 y 的本字可能属于 x 族字, 尽管我们对 x 、 y 之间存在差异暂时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 或举出有类似差异的平行例证。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仅仅抽出 x_1 、 x_2 、 x_3 、…… x_n 中之一作为 y 的本字, 就会大大降低考释的可信度。请看以下释例。

(1) “蹲”, 梅州说 “ $ku^{阴平}$ ”, 厦门、南昌、武

汉说 “ $k' u^{阳平}$ ”, 株洲说 “ $ku^{阳平}$ ”, 成都说 “ $ku^{阴平}$ ” 或 “ $k' u^{阳平}$ ”。该字可能的中古音是见母模韵平声或群母模韵平声 (但《广韵》、《集韵》系统中的模韵没有群母字)。

“北大中文系 1995” 考证其本字为 “跼”: 《广韵》溪母模韵平声苦胡切 “跼, 蹲兒。” 义、调、韵合, 但声母不符。“潘悟云 1995” 认为本字为 “跼”: 《广韵》见母虞韵平声举朱切 “手足寒也。” 《集韵》群母虞韵平声权俱切。“《说文》: 天寒足跼。” 举朱切的 “跼” 与梅州等的 $ku^{阴平}$ 、权俱切的 “跼” 与南昌等的 “ $k' u^{阳平}$ ” 都是声、调合, 义、韵不合。

类似情况的字, 在《广韵》、《集韵》中还有许多。以下仅列举古见组字中有 “蹲” 义的音近字。

居: 《广韵》见母鱼韵平声九鱼切, “当也, 处也, 安也。” 《说文》: “居, 蹲也。从尸, 古者居从尸。踞, 俗居从足。”

踞: 《广韵》见母御韵去声居御切, “蹲。又踞踞大坐。” 《说文》: “踞, 蹲也。”

跨: 《广韵》溪母暮韵去声苦故切, “踞也。”

上面这群字 “居踞跼跨” 是梅州等 “蹲” 义词的本字族。其中, “居” 出现的时间最早, 见于《说

文》。“踞”虽见于《说文》，却是以“居”的俗字出现的，应是晚起字。“跨”也见于《说文》，但意义不是“蹲”：“跨，渡也。”“蹲”义的“跨”和“跼”迟至《广韵》才出现。

(2) “藏”，梅州说“paŋ^去”，株洲说“paŋ^{阴去}”，广州说“peŋ^{阴去}”。该字可能的中古音是梗开三帮母去声或梗开四帮母去声。“李如龙、张双庆 1992”认为本字为“𨾏”：《广韵》并母劲韵去声防正切，“𨾏隐，僻也，无人处。”义近，韵合，但声、调不合。“李新魁等 1995”认为本字为“屏”：《尚书·金縢》“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孔传“屏，藏也。”《广韵》帮母静韵上声必郢切，“蔽也。”义近，声、韵合，但调不合。“北大中文系 1995”认为本字为“摒”：《广韵》帮母劲韵去声界正切，“摒除也。”音合，但义不合。

上面这群字“𨾏屏摒”是梅州等“藏”义词的本字族。这族本字各自从音义的不同方面接近欲求本字的方言词。

(3) “铁锈”，梅州说“lu^{阴平}”，株洲说“lai^{阴平}”。该字可能的中古音是来母模韵平声。“李如龙、张双庆 1992”认为本字为“黠”：《广韵》来母模韵平声落胡切，“黑甚。”音合，义相关。“王力 1991”中还有类似情况的字，兹引两例。

卢：《书·文侯之命》“卢弓一。”《传》“卢，黑也。”《广韵》来母模韵平声落胡切。音合，义相关。

垆：《书·禹贡》“下土为垆。”《释文》引《说文》“垆，黑刚土也。”《广韵》来母模韵平声落胡切，“土黑而踈。”音合，义相关。

上面这群字，“黠卢垆”是梅州等“铁锈”义词的本字族。

(4) “潜水”，梅州说“mi^去水”，株洲说“瓮mi^{阳去}子”，广州说“mei^{阳去}水”。该字可能的中古音是止开三明母去声。“李如龙、张双庆 1992”认为本字为“泐”：《集韵》明母队韵去声莫佩切，“潜藏也。”义合音近，舒促相符，但开合不同。类似情况的字还有：

没：《庄子·列御寇》“其子没于渊，得千金之珠。”《集韵》明母队韵去声莫佩切，“沉溺也。”义音近，舒促相符，但开合不同。

泐：《集韵》明母质韵入声莫笔切，“潜藏也。”义合音近，开合相符，但舒促不合。

上面这群字“没泐 (莫佩切) 泐 (莫笔切)”是梅州等“潜水”义词的本字族。

2. 考释出来的一族字 x_1 、 x_2 、 x_3 、…… x_n 中个个都与方言词 y 音义俱合。

(5) “合 (资)”，梅州说“kap^{阴入}本”，广州说“kap^{中入}份”。本字族为“合伶故”。

合：《广韵》见母合韵入声古合切，“合集。”音义俱合。

伶：《广韵》见母合韵入声古合切，“并合聚。”《说文》“伶，合也。”音义俱合。

故：《广韵》见母合韵入声古合切，“合会也。”《尔雅》“故，合也。”《说文》“故，会合也。”音义俱合。

(6) “孵 (小鸡)”，梅州说“p‘u^{阴去}”，厦门说“pu^{阳去}”。本字族为“伏孚”。

伏：《广韵》奉母宥韵去声扶富切，“鸟菹子。”音义俱合。

孚：《集韵》奉母遇韵去声符遇切，“育也。”音义俱合。

(7) “口水”，株洲说“tsan^{阳平}”。“动物身上的黏液”，广州说“san^{阳平}”。本字族为“𩇛涎” (参见李新魁 1994、李如龙、张双庆 1992)。

𩇛：《集韵》崇母山开韵平声栈山切，“鱼龙身濡滑者。”《国语·郑语》“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𩇛而藏之，吉。”韦昭注“𩇛，龙所吐沫，龙之精气也。”音义俱合。

涎：《集韵》邪母仙开韵平声徐连切。《说文》“慕欲口液也。”《玉篇·水部》“涎，口液也。”《素问·咳论》“肾咳之状，咳则要腰背相引而痛，甚则咳涎。”李贺《昌谷诗》“潭镜滑蛟涎，浮珠噉鱼戏。”音义俱合。山开三、四字在株洲话中读 an/a 者

还有：啗 [ŋa^{阴去}]。山_{开三}、四字在广州话中读 an/at 者还有：啗 [ŋat^{阳入}]，研_{研磨} [ŋan^{阳平}]，列_{量词} [lat^{阳入}]。

3. 考释出来的某个字与方言词 y 音义俱合，但却是生僻字。将该生僻字所属字族中的常见字列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古代汉语词与现代方言词之间演变关系的认识。

(8) “捆扎，系”，梅州说“t‘ak^{阴入}”，株洲说“t‘ia^入”。该字可能的中古音是透母锡_开韵入声或定母锡_开韵入声。有后者的可能是因为“少数古浊入字（梅州）读阴入调，如‘剧’k‘iak^{阴入}（群母陌韵），‘寂’siuk^{阴入}（从母锡韵），‘蜀’tsuk^{阴入}（禅母烛韵）。”（袁家骅等 1989 年）。“黄雪贞 1995 年”、“练春招 1998 年”认为本字为“纆”。《资治通鉴·唐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契丹设伏横击之，飞索以纆（张）玄遇、（麻）仁节，生获之。”《古今韵会举要》透母合韵入声托合切，“以索罨物也。”义、声、调合，但韵不合。

音义俱合的字是“仵”：《集韵》定母锡_开韵入声，《说文》：“约也。”但“仵”生僻，同族的常见字有近音的“约（的）”。《文选·枚乘〈七发〉》：“九寡之珥以为约。”李善注“字书曰：约，亦的字也。的，琴徽也。”“琴徽”即系琴弦的绳子。的：《广韵》端母锡_开韵入声都历切。

也就是说，梅州等“捆扎、系”义词的本字是生僻字“仵”，所属字族中的常见字是“约（的）”。

(9) “瘦肉”，梅州说“tsiaŋ^{阴平}肉”，株洲说“tsian^{阴平}肉”。本字为“腍”：《集韵》精母清_开韵平声咨盈切，“肉之粹者。”音义俱合（李如龙、张双庆 1992）。“腍”生僻，同族的常见字有同音的“精”。

也就是说，梅州等“瘦肉”义词的本字是生僻字“腍”，所属字族中的常见字是“精”。

主要参考文献

白宛如《广州话本字考》，见《方言》1980 年第 3 期。

北大中文系《汉语方言词汇》第 367、407 页，语文出版社 1995 年版。

汉语大字典编委会《汉语大字典》（缩印本），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5 年版。

黄雪贞《梅县方言词典》第 99、286 页，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李新魁《广东的方言》，第 222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李新魁等《广州方言研究》，第 239–240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客赣方言调查报告》，第 487、494、499、509 页，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练春招《客家方言词汇比较研究》第 147 页，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 年。

潘悟云《温、处方言和闽语》第 108 页，《吴语和闽语的比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第 164 页，文字改革出版社 1989 年版。

王力《同源字典》第 150 页，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

责任编辑：陶原珂

• 书 评 •

以哲理的眼光分析和观察世界

——喜读《邪教〈法轮功〉百问》

温宪元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10)

《邪教〈法轮功〉百问》(广铁集团公司梁伦般编著, 张磊任总顾问) 近日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本写得很有新意、读来很有品味的好书。许多地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尤其是书中极富哲理性的分析和判断, 更是十分值得颂扬。

林语堂先生有句名言: 一个民族产生过几个哲学家没有什么稀罕, 但一个民族都能以哲理的眼光去观察事物, 那是难能可贵的。这句话警醒我们, 要实现社会进步, 民族振兴, 需要由全民族都能做到依据哲理的眼光去观察事物, 观照世界。而要做到一个民族都能以哲理的眼光去观察事物, 首要的是每一个个体在观察世界、观照事物的时候, 都必须要有哲理性的分析和判断的眼光, 做到这一步, 同样是难能可贵的。李洪志的“法轮功”为什么能够有市场, 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与我们当中还有不少人不能以哲理的眼光去观察世界、分析事物有关。

如何才能以哲理的眼光去分析、观察、判断事物? 我觉得《邪教〈法轮功〉百问》这本书中有许多的篇幅, 以哲理的眼光对“法轮功”的歪理邪说作出了透彻和独到的剖析。比如, 书中用科学的理性态度来揭开李洪志贩卖“法轮”时的心理暗示手法这一段, 就写得非常好。按照李洪志的宣称, 他的“法轮”是一种“旋转的高能量的物质体”, 而且是“有灵性”的“高级生命”, 既能“吸收能量”,

又能“发放能量”。照这么说, 是可以现代科学技术来测定的。但是, 他没有可测定的证据。只能无条件地接受他的心理暗示, 才能感受得到“这个法轮是旋转的”。如果你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不接受他的心理暗示, 你就不能感觉到“法轮”的存在和旋转。那么, 这个“法轮”不用经过外科手术, 是如何装进人的身体的呢? 这个轮子放入身体后, 会不会干扰人体内部的器官? 用现代医学的 X 光透视, 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科学是依靠怀疑态度而得以不断进步的, 对于一个科学主张, 特别是当这个主张受到质疑时, 便要求有可重复的证据, 科学进步依靠的就是这个。但是, “法轮功”的信徒对“法轮”进入人的身体这种谬论很少表示怀疑。而且李洪志还不能演示他的这种让法轮装进人的身体的魔力, “因为这种‘卖弄’损害法轮的精神”。这样来阻止客观评价的企图, 正是伪科学的一个共同策略。

又比如, 书中在回答“‘法轮功’是佛教的一个‘法门’吗?”这一节, 对“不二法门”的理解, 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出发, 分析了事物存在的矛盾性, 把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统一起来, 并超越这种对立, 达到佛教的真理, 这种方法称为“不二法门”。书中运用禅宗六祖慧能在《六祖坛经》中对“不二法门”的生动解释, 驳斥了李洪志歪曲佛教中

• 学术动态 •

广东省党校系统第四次邓小平理论研讨会观点综述

广东省党校系统第四次邓小平理论研讨会于2000年10月17日—19日在佛山市委党校召开,与会代表110多人,会议共收到论文100余篇,与会代表就会议中心议题“邓小平理论与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若干问题研究”展开热烈研讨,现简要介绍其中的主要观点。

一、关于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

1. 邓小平的发展观。有的同志认为,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有机整体运动思想,形成了邓小平整体发展观。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是有机整体发展观最集中的体现。有的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则是邓小平经济发展观的核心,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的部分。2. 邓小平的“三农”

思想。农业、农村、农民(即“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在这方面的重要思想是邓小平科学理论体系中重要的内容。3. 邓小平的金融思想。邓小平的金融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的金融思想主要表现为:强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指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主张充分发挥证券市场的作用;提出要敢于利用外资,认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持货币的稳定。4.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论。

二、关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主要观点有:1.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全面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2. 第三代领导集体把可持续发展观念这一思想成果与

“不二法门”的真实意义,为自己的欺世行为寻找依据,诱骗信徒们追随他的“法轮功”的鄙劣行径。“法轮功”并不是什么佛教的一个法门,而是一个披着佛教外衣的地地道道的邪教组织。这样的说理、评述、透析,文字虽然不长,但是读来令人心服、信服,解气、解渴。

在这本书中关于哲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还有其他许多地方,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今天有这样一本好书面世,对于我们继续深入揭露批判李洪志的歪理邪说,提供了一部很好的教材。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我国经济建设得到快速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我

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有的问题还很严重。在不少地方,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犹如毒菌滋生,唯心主义、封建迷信、愚昧活动泛滥,而且还大有市场,呈愈演愈烈之势,令人触目惊心。“法轮功”邪教组织的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的反动本质的特点,决定了它对于国家政治号召力与社会凝聚力的严重影响和破坏,现在,它又进一步沦为国际反华势力的政治工具,更具危害性。因此,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宽广眼界观察世界,要倡导以哲理的眼光去观察事物,要大力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素质。

责任编辑:童 轩

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与邓小平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是一致的。3.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丰富的决策实践中，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浓厚时代气息的决策思想。江泽民注重对决策经验进行科学的理论总结，提出一系列治理国家的战略方略，推进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4. 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功地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方面有了新的发展。

三、关于邓小平理论与西部大开发战略

主要的观点有：1. 适时开发西部是党中央一贯的战略思想。1988年邓小平在谈到西部发展问题时，讲到“两个大局”思想，就已阐明了东部与西部的关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认真贯彻了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思想，提出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战略方针。明确开发西部，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是关系我国跨世纪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2. 邓小平区域发展理论集中反映在“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上。“两个大局”战略构想是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允许部分地区先富、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区域发展理论的三个主要方面。邓小平区域发展理论运用于实践，形成的是一种非均衡的中国区域发展模式，效率先行，兼顾公平。3.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需要“东西部互动”，达到“东西双赢”的局面。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西部大开发，东西部之间的合作方式必然是以互惠互利的市场合作方式为主，双方必须按规律办事，由市场的主体——企业或企业集团来充当主角，政府可以为企业的这种行为提供信息服务。4. 西部大开发要注意保护生态环境，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做到经济的持续性、社会的持续性和生态持续性的统一。5. 西部大开发，法律先行。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广东省，中央的开放政策与相应立法是经济发展之本，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经济的大发展，法律所起的引导、促进和保障作用功不可没，广东地方立法的经验，可资西部地区借鉴。

四、关于邓小平理论与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大家一致认为，广东要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至于具体的策略步骤，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广东应在贯彻执行党的十五大精神基础上，以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总任务、总目标，总揽全省工作全局，继续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实施外向带动、“科教兴粤”和可持续发展三大战略，依靠体制创新、科技创新，促使经济繁荣、结构优化、法制健全、社会文明，从而达到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第二种观点认为，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关键在于全面落实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切实有效地实施“科教兴粤”战略，大力发展科技教育，以科技进步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第三种观点认为，信息化也是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第四种观点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还是抓好“两个文明建设”。

五、关于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与“三个代表”思想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仅体现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党建理论认识的深化与创新，而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党建学说的重大发展，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基本纲领和行动纲领。在这个问题的研讨中，与会者主要有以下观点：1. “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具有内在联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论断与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有不同的角度和要求，不能简单等同，但在理论和实践上却是一脉相承的。首先在理论基础上是相同的，都是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前提；其次具有相同的价值目标，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根本的利益要求；再次具有相同的实践取向，都是着眼于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2. “三个代表”是辩证统一的整体。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 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是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 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保证;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不断实现和发展人民群众利益, 是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3. 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体现了党始终代表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先进部分, 体现着社会各阶级的共同利益, 并能广泛地动员各阶级、阶层和各民族致力于共同的事业。4. 深刻领会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思想, 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先进文化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 能够顺应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 揭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 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有

力的思想保证, 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是凝聚和激励全国人民的重要力量。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其前进方向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的结晶, 反映并引导中国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5. 用“三个代表”的思想指导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按照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 当前抓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 必须遵循党的十五大精神,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指导方针, 紧紧围绕深化农村改革, 确保农业和农村发展、确保农民收入增加来进行, 全面、深入、扎实、持久地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戴燕艳)

责任编辑: 何蔚荣

公民教育课程化

——粤港第一届公民教育研讨会述评

姚冬琳 黄甫全

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我国当代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 给我们提出了“怎样将公民教育落实到课程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了加强内地与香港的学术交流, 促进公民教育课程化的进程, 粤港第一届公民教育研讨会于 2000 年 9 月 9 日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研讨会由华南师大课程与教学系和香港 Sathya Sai 教育学院联合主办, 来自香港大学、香港教育学院、香港公开大学以及华南师范大学的学者近 40 人与会。研讨会围绕“深化课程改革, 加强公民教育”这一主题, 通过六个主题报告、提问和回答、公开讨论等形式, 分别就“公民教育与课程”、“课程的伦理取向与公民道德教

育”、“课堂氛围的营造与公民意识的培养”、“公民教育与课程相结合的形式”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研讨, 现将研讨会取得的成果简要综述如下。

一、公民教育与课程的关系

考察国内外公民教育与课程的关系, 可以概括为三种模式: 一是专门开设“公民”课程; 二是将公民教育整合到有关课程之中; 三是既专门开设“公民”课程, 又将公民教育贯穿到有关科目的教学之中。针对大陆的实际情况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有学者提出了公民教育发展的五种基本策略, 它们分别是“教育宗旨”的更新策略、“终身教育”策略、“权利本位教育”策略、“活动教育”策略、“课程

化”策略。前四种策略主要是建立现代公民教育的新理念、新体制和新模式，构建起公民教育的一种新视野，侧重于理论导向；而“课程化”策略，是把公民教育具体化、现实化的行动策略，侧重于实践导向。对于以上策略不能偏颇任何一方，二者在公民教育中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公民教育课程化中，香港学者提出了重视人类普遍价值的教育问题。价值教育是当代全世界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 and 核心课题，当代人类面对各种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的心态的种种危机，需要培养新的价值观，以帮助人类克服人类中心和个人中心偏向，重建和谐的自然、社会和生活。有学者通过探索和研究提出，在课程中渗透由“真理 (truth)”、“和平 (peace)”、“仁爱 (love)”、“正当行为 (right conduct)”和“非暴力 (nonviolence)”五种价值构成的价值观教育。

二、课程的伦理取向与公民道德教育

在课程内容选择和加工过程中，典型的伦理取向有两大类：一类是相对主义的伦理取向和绝对主义的伦理取向；另一类是理想主义的伦理取向和现实主义的伦理取向。当前我国内地的课程伦理基本上表现出理想的政治伦理倾向，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正逐渐向现实的经济伦理取向倾斜。这是两大类伦理取向的结合，从对公民道德教育的影响来看，既有利也有弊，令人们难以取舍，这样两难场景，源自于这两大类伦理取向本身固有的矛盾与弊端。

什么样的课程伦理价值取向才能更好地引导公民道德教育呢？有学者提出，当前中国大陆的课程改革应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伦理取向，培养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公民道德品质。民主和科学这两个口号自五四提出以来，就扎根在人们的心里。新的时代赋予了它们新的含义。民主与科学的伦理取向的基本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相统一。科学精神强调的是课程改革与发展应体现时代精神，符合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遵循

科学规律，从而保证课程的质量和效益。民主精神强调的是课程建设应立足于人民群众的利益，体现大众的社会权利和教育权利，体现社会公正、平等的思想。课程伦理基础的设定，应坚持走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相结合的道路，由此得出的伦理规范将具有较大的现实合理性，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社会代表性。二是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相结合。课程建设应自觉地坚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相结合的基本价值追求，这是教育事业的内在要求和努力方向。课程的伦理价值取向不应再出现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分野。三是进步文化和思想开放的统一，课程应该尽量全面反映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让学生接触到人类文明的精华内容。为此就必须有开阔的胸怀，努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努力建构和完善课程伦理体系，是今后课程改革和创新的重要任务。

三、课堂氛围的营造与公民意识的培养

有学者指出，近几十年来国内公民教育有一种重大德轻小德的倾向，对公民意识的重视甚于公民行为的养成，出现了一种“情景性公民行为”的现象，即公民意识与公民行为在不同情景下表现出不一致性。针对这样的问题，需要开辟多种途径加强公民教育，其中应该重视通过优化课堂氛围来加强培养公民意识。一是通过静态的课堂环境设计影响学生的公民意识。通过举行升旗仪式、在教室里张贴国旗、国徽的图案培养学生奉献社会的意识；通过学习一些爱国志士的事迹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意识；通过科技制作、设立学科活动室来培养学生的科学意识和竞争意识；通过班级讨论社区问题、班风建设、道德问题来开发学生的民主意识；通过让学生自由选择班级、选择免监考权来萌发学生的自由意识。二是通过动态的课堂活动影响学生的公民意识。通过开设影响学生社会意识的课程，如思想品德课，来培养学生的公民权利意识、利他主义意识等；通过渗透思想性内容，在各科教学中影响学生的社会意识，如渗透“天下为公”、“死而后

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师在教学方法上透过情感等因素影响学生的态度，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

在我国的公民教育发展中，应充分重视借鉴国外优秀的公民教育成果为我所用。国外在课堂氛围营造方面有一些新的观点，其中的满足学生个人正当的心理需要、建立积极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这两点很有现实意义，而且是我国公民教育课堂中所缺乏的。

四、公民教育与课程相结合的形式

经过深入的讨论交流，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同公民教育的课程化具有三层涵义。

第一层涵义是思想、观念形态上的公民教育课程化。长期以来，公民教育主要停留在一般性的和泛化的“教育”思想和观念上，缺乏深入到“课程与教学”的层面丰富公民教育思想和观念。只有把公民教育与实践结合起来，公民教育才会获得长足的发展，即把公民教育课程化。但是，如何把公民教育具体贯彻落实到课程中去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层涵义是指公民教育的课程化不局限于教学内容或是教材，而是反映在课程编制的各个方面以及教学的方式方法上。课程的编制有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课程目标的确定，即是把公民教育的目的转化为公民教育的课程目标，从而用它来指导公民教育课程的具体编制。其次是课程内容的确定。在公民教育课程内容的取向上，应兼顾到学科体系、学习活动和学习经验这几方面的因素；对于公民教育课程内容组织的原则，应遵循一定的逻辑顺序和心理规律，应贴近社会生活，与学生和学校的特点相适应。再次是课程的实施，这是把设计好的公民教育课程付诸实践的过程，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最

后还有一个课程评价，即进行公民教育课程的诊断和修正，使公民教育的课程变得日益完善。在教学的方式方法方面，宜采取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如以引导学生解决各种问题的方式帮助学生实现全面发展；方法要求灵活多样，如作报告、讲座、社会实践等。

第三层涵义是指一些国家不局限开设公民教育的课程或综合课程，而是把公民教育渗透到各门课程中去，即是在各门课程的目标、内容和教学中，分别落实公民教育的有关部分，从相关方面去探讨和培养公民的责任与义务，进而获得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许多国家的公民教育不单独设科教学，但科科有公民教育，如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等。这种公民教育课程化的方式有很多的优点，不仅涉及知识的学习，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态度、能力和行为习惯。这种渗透各学科的方式能够充分调动全校师生共同致力于公民教育，可以充分利用学校各种资源，大大增强公民教育的效果。今天教育界存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如教师不关注孩子的个人发展，反而只专注于科目上。其实，任何一个科目，都是为了培养品格，灌输基本价值观。如果教师们形成了这样的思想和观念，且身体力行，他们就能将此教育原则普遍运用。

内地和香港均在中小学各个学科中，开展了渗透公民教育的研究和实验，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在数学课堂中，可以通过编写文字题的方式来实现人文价值的灌输，如让学生编写分享、团结、环境保护方面的文字题等。在组织语文教学时，选择有启发性、榜样良好的故事，如在小学选用“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等，这样的故事，既形象生动，又贴近儿童的生活实际，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责任编辑：叶金宝